陈伯达遗稿

——狱中自述及其它

是理论权威、大笔杆子，还是叛徒、托派分子和政治骗子？

陈伯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陈伯达遗稿

——狱中自述及其它

陈伯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陈伯达著
－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5
ISBN7－204－04044－9

Ⅰ.陈…
Ⅱ.陈
Ⅲ.遗稿－自述及其它
Ⅳ.F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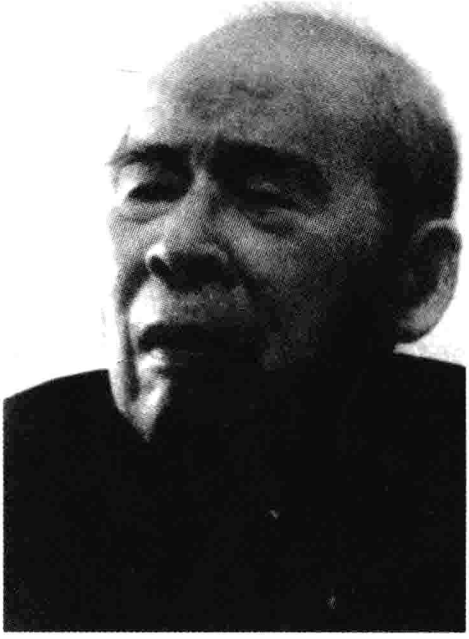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责任编辑 吕超文 **封面设计** 王伶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内蒙古赤峰市光华印刷厂
经 销 者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298千
版　　次	1999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1999年5月第一次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22.00元

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七一年陈伯达在“九大”选举投票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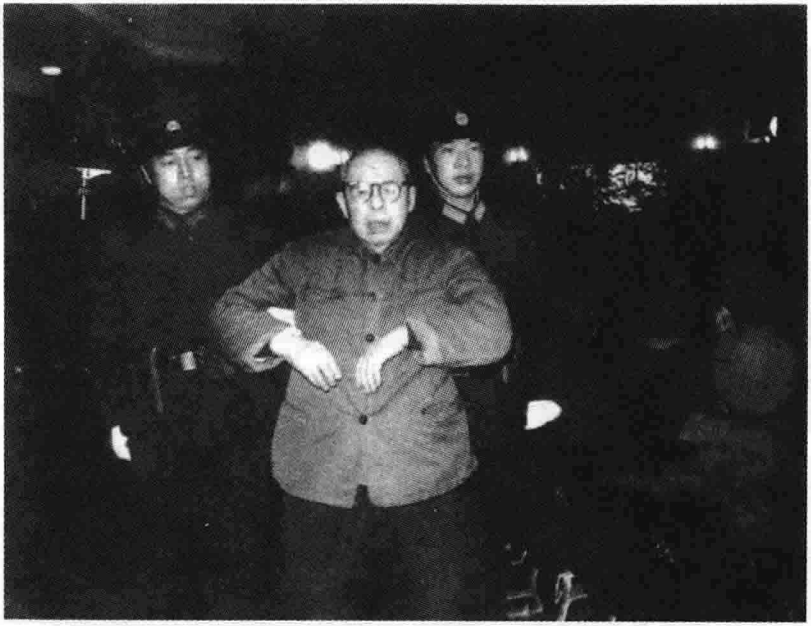
陈伯达遗像　　王东升摄

家属及亲友送别陈伯达。　王东升摄

陈伯达遗体告别式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王东升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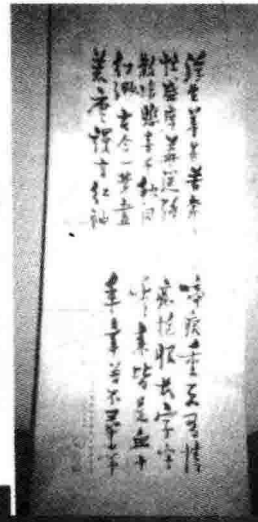
陈伯达生前的亲友参加告别仪式。 王东升摄

家属与陈伯达泣别 王东升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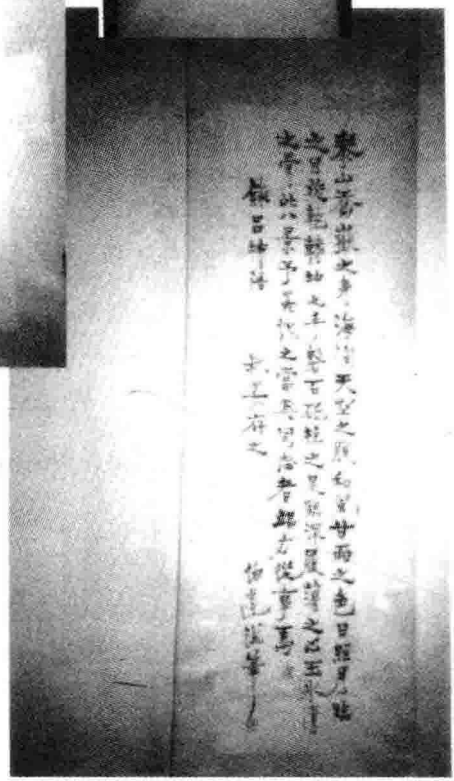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林彪、江青集团主犯陈伯达被押上法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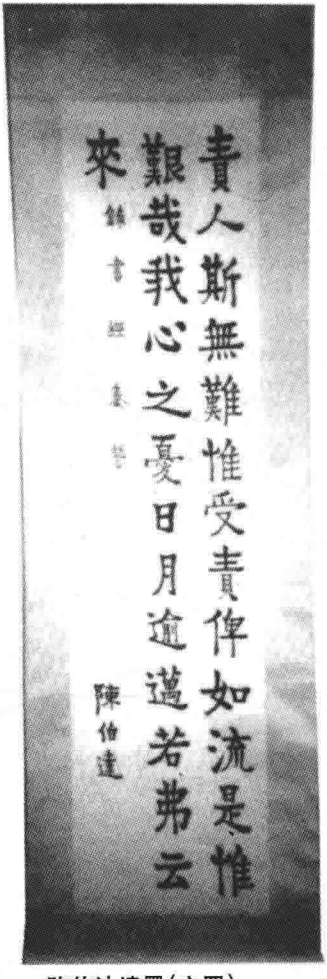
陈伯达遗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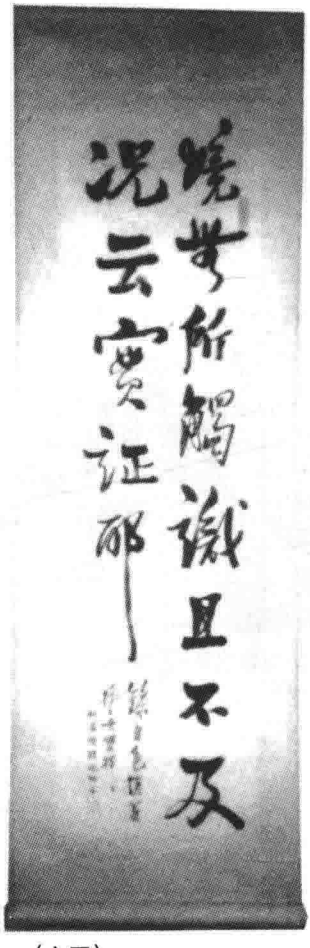
(之二)



(之三)



陈伯达遗墨（之四）



（之五）

目　录

著者简介 …… (1)
说　明 …… (4)

自述部份

关于所谓“历史问题”的说明 …… (9)
记两件公案 …… (13)
附录一：陈晓农致胡绳的信 …… (28)
附录二：陈晓农《专安组的证据不能成立》 …… (30)
谨答一个“调查提纲” …… (35)
我所了解的的中共北方党的情况 …… (42)
关于《毛泽东选集》 …… (45)
《毛泽东选集》出版问题补记 …… (47)
关于“百家争鸣”的事 …… (49)
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 (52)
周扬同志去小站的经过及其他 …… (58)
我与刘少奇关系的几点情况 …… (60)
文革小组成立的经过 …… (62)
工作组问题 …… (63)
关于制止武斗的一些情况 …… (64)

文革小组二三事 …… (65)
“学术权威”问题 …… (68)
“文革”中若干重要事情 …… (70)
我所知道的“杨、余、傅事件” …… (74)
答复关于解学恭的调查提纲 …… (75)
“文革”中江青等人的一些情况 …… (79)
有关华北问题的线点答覆 …… (81)
从九大到庐山会议 …… (82)
附录一：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 (94)
附录二：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关于批判陈伯达的部份 …… (96)
九届二中全会忆记 …… (97)
对自己问题的几点归纳 …… (102)
校正一份材料 …… (103)
关于起诉书第二项 …… (104)
关于“批斗刘少奇”问题的材料补正和更正 …… (107)
关于冀东问题致特别法庭 …… (110)
一份陈述提纲 …… (111)
致胡耀邦等领导人的信 …… (112)
致叶剑英的信 …… (116)
散稿拾零 …… (118)
一篇未写完的手稿 …… (122)

学术部份

文艺评论类

《石头记》里的一件公案 …… (127)
求知难 …… (130)
《儒林外史》杂记 …… (137)
“青州兵”与曹操 …… (143)
一部历史悲剧——《水浒传》 …… (147)
文艺的魅力 …… (155)
试说但丁 …… (171)

哲学类

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圣经》看中国佛学
中的顿、渐两派 …… (181)
黑格尔反对绝对化 …… (192)
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 (198)
科学·假设·实践 …… (206)
论《易》初稿 …… (212)

经济类

试说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 (223)
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普遍化 …… (226)
劳动时间问题和苏修帝国主义 …… (229)
马克思论机器体系 …… (230)

马克思列宁劳动生产率……（232）
恩格斯论工业发展和城乡融合问题……（234）
记塘沽工人的话……（236）
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237）
评美国人的两本书……（251）
“改革问题”等等 ……（270）
长思……（273）
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275）
工业问题……（295）

陳伯達·一九八八年十月在醫院。 王東升攝

著 作 简 介

本书著者陈伯达，一九〇四年生于中国福建省惠安县。曾先后在集美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七年初参加北伐军，任第一军独立第四师秘书、东路军军官学校教官。四月，因反对国民党清党并掩护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而遭通缉，旋离军赴上海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〇年底回国。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二年初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得以因病保释。一九三三在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一九三五年参加领导了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曾主编《实话报》、《华北烽火》、《国防》、《人民之友》等救工刊物，并先后在天津法商学院、北平中国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秋发起文化界“新启蒙运动”。宣传抗日和民主，出版过文集《真理的追求》、《在文化阵线上》，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

一九三七年秋赴延安，曾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同时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延安期间，他发表过《三民主义概论》、《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和《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哲学思想》、《墨子新论》、《近代中国地租概说》等学术论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发表过《论毛泽东思想》等论著，并是《毛泽东选集》的主要编辑者。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七年曾两次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分别同斯大批和赫鲁晓夫会谈。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主要起草人，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他曾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主张以发展电子新技术为中心带动中国新的工业革命，但均受到批评和否定。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经周恩来推荐，由毛泽东提名，中共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在由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与部份群众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他提出撤销工作组，主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而与刘

少奇、邓小平当时的主张相分歧。在运动之初，他曾率先反对以人们的阶级出身定是非的作法，指出那是一种“血统论”。同时，他执行了毛泽东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针。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在起草九大报告时，他提出应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但被否决。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之后，全国开展“批陈整风”（即“批修整风”）运动。报刊上称他为“刘少奇一类骗子”。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指责他曾一再提出“唯生产力论”，大会并以所谓“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将其永远开除出党。自一九七〇年十月起他即被关押，一九八〇年年底他又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受到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八八年十月刑满释放，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工作。

一九八九年九月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编 者

说　明

本书汇集了著者在生命最后十年中所写的文稿，共五十七篇。这些文稿中除《求知难》与《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两文曾分别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被友人和有关方面在未告知著者的情况下以笔名发表于国内刊物外，其它各篇均是第一次正式发表。

著者晚年因受条件的限制，可以阅读和利用的资料甚少；而且他写作时年事已高，有些自述部份的文稿原系回答审问的草稿，属匆促写出，来不及推敲文字，内容亦不免偶有重复之处；有些学术文稿则仅属初草，曾拟充实修订，却未能如愿；这些情况是应当向读者说明的。这次将著者遗稿汇编成书，编者遵照著者嘱托，仅对文稿中的脱字衍字之处和标点做了一些校订，对部份无标题的稿子补写了标题，并将少量零散残页加以合并整理，对原稿内容未加任何改动，以保持历史原貌。书名的副题为出版社责编所加。

文稿篇目排列，按内容分为《自述部份》和《学术部份》两大类。《自述部份》因有些手稿未写明写作日期，且为阅读方便计，大体上以稿中所述事情的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内容跨时代的，尽量以稿中侧重的事情为主，参照排列。《学术部份尽量按学科分类编排，则是著者生前表示过的意见。还应说明，文稿分类只能是大概的，著者没有专门写作“回忆录”，而学术部份有些文稿也间或述及了著者的某些重要经历。

著者的这些遗稿不仅为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

中共党史提供了十分重要和稀有的史料，有助于廓清许多历史迷雾，而且对于有兴趣研究文学、哲学和经济问题的人们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这是无须编者赘言的。至于其中一部份文稿带有较明显的时代印记，一部份自述中含有一些自诬之词（著者生前说过："有许多事，我都自己一人吞下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这对于了解现代史并深知历史复杂性的读者，也是不难理解的。

著者作为与毛泽东共事最久的知识分子，已为中外研究者注意，然而过去有些论述他的文字使用了一些错误的材料。本书向世人提供了有关著者经历、思想以及毛、陈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仅就此而言，本书也是值得出版的。

编　者

自述部分

关于所谓“历史问题”的说明

毛主席在世时，除了关于“天才”问题（我在庐山会议时已读过，并且多次表示接受他的批评，愿意认真改造自己）的文件外，听说还有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一些批示，那些“历史问题”都多次在报上指点过，记得我对公安部门曾经多次作了说明。

关于所谓“国民党反共分子”一事

我曾有几年，狂想在文学界出点头，因此，跟郭沫若、郁达夫都通过信，并不知羞耻地选些稿子就正。其中，只有在上海时选篇题目叫《寒天》的稿子给在北京的郁达夫，他给我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并写了封勉励的信给我。后来，创造社办《洪水》杂志，我也投过稿，那些都匆忙写出，又因我当时难于再住上海，思想文字都很消沉，也缺乏革命精神。其后到广州，因个人生活无着，情绪更消沉，回厦门后，就想在当地找个教员做，混饭过日子。当时，有一个广东大学生叫黄振家要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硬要我代起草一个宣言，我不愿意他们写出“反共”字句，就给代写了，这当然是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我很后悔，就给当时在厦门工作的罗明说了这件事。当时我虽然思想糊涂，盲目上当，去写那篇东西，但我并没有写“反共”字句，并且在犯这个错误后，不作任何掩饰，向党坦白。从此，我不再同组织

这个反动“学会”的黄振家辈有任何来往。

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北伐时在张贞部队工作，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内的任何会议。在福州时，我同陈少微同志共办一个杂志，我的思想是激烈的，是为党工作的。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徐琛同志要我当工会纠察队顾问，我是服从的。党中央的特派员王荷波同志特别接见过我。当反共逆波开始时，我因穿军装，保护过一些同志和左派人员出境。我是在南京方面电告张贞，要他就地处置我，才匆匆离开福建。我是当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大屠杀时，在上海请求入党的。党因为我是在那样的关头请求入党，所以就免去了候补期，经陈少微的介绍，就直接承认是正式党员。

关于所谓“特务”一事

一九三七年春间，我回乡探望母亲。回来时，到上海。本即将回京，遇见林林，忽记起他的同乡张贞，就想路过南京时找张谈一下统一战线在福建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北伐时，我在张贞部做过工作，清党时南京要他捕我，张匆急派他的部下林学渊雇船送我出闽江口，坐船到厦门转上海。后来我在北方被捕后，因病，承陈原道同志要我找关系出狱（见以前材料），王雨亭来北京时，张贞给他几百元，且说，如不够，可再向他要，王雨亭北来就以此作为我出狱的赎款。我看到林林时，因此想到党如在福建搞抗日游击战争，同张贞谈

谈，要他不要和我们作难，或者不无益处。那时，我们正在同蒋介石谈统一战线，张贞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小支系，一个早已失掉地盘的小军阀，但同他谈谈也可以。因此，我要林林同我一块到南京。

原约，经过南京时，我在下关寄住一小客栈，林林去找张贞来客栈，我谈几句便搭火车北上。

林林去不多时，张贞便同他坐汽车来，要我到张的住处。我问张，你不害怕吗？张说，我负责保险。我根据过去的事，估计他不会有意害我，就同他一起坐车去，林林也同车。到后，知道他只看过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话”，并不知道我党同蒋介石谈和停战和搞统一战线这些事。因他不是蒋的嫡系，又无实力，所以蒋介石并没有给他知道这些秘密。我把这些说开，对他似乎是件新闻。他留我住一夜，陪我去观看中山陵、雨花台等地。我说的一件具体的事，即：我们如在福建搞游击战争，他们不要阻挠。他也没有反对。

我记得第二天我就坐车北来。这就是全部经过。后来在延安，也曾对毛主席说过。

张贞已经没有军队，政治也无能力，我要林林找他来下关谈话，这是不必要的，也算是错误的，我承认这个错误。但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就使我变成了“特务”。

一切都听凭伟大的党的判断。

陈晓农按：

“文化大革命”中期，“批陈整风”运动中的中央文件给陈伯

达戴上了“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这些帽子除“修正主义分子”近几年较少提及外，其他仍长期延续使用，即使已经“彻底否定文革”，可“文革”中的这一大案却历二十多年而“一切照旧”，彷佛“实事求是”词也须有应用的范围和场合似的。

陈伯达自一九七〇年十月被监禁后，看不到任何中央文件，仅从允许阅读的报纸上看到给他戴上的各种帽子，至于案是怎么定的，文件的具体内容是甚么，他都毫无所知。因此他后来按自己对文件内容的猜测写的申诉材料，很多地方与文件内容对不上号，例如他针对“特务”的帽子写的材料就属于这类情况，他当时想像不出有甚么理由可以把他和“特务”一词连在一起。

关于所谓“叛徒”问题的历史真相，因陈伯达在《记两件公案》的长文中有更详细的记述，为避免重复，本书就不收录其他零散材料了。

关于所谓“托派”问题，陈伯达没有写过材料（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因为他认为那不值一驳。在我询问这方面的情况时，陈伯达说，他在苏联留学时并没有参加过托派组织，只是不同意当时苏联对托派的那种作法，因此曾被定为调和派、学院派，给了党内劝告的处分，仅此而已。他说，当时苏联清党搞得那样厉害，都没有定他为托派，想不到四十年后却在中国被定为托派，这在世界上都是笑话。

记两件公案

从报上读到薄一波副主任在大连讲的一次话：

他在谈到有关的历史经验时说，陈伯达、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就叛变了党，成了叛徒，这是有案可查的。但是，他们混进党内，并爬上很高的领导岗位，就是因为他们会伪装，会逢迎，能写几篇文章。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我作为一个人，似乎不可以不辩。

姑分作三个部份来写：

第一部份：关于历史；

第二部份：关于“伪装”、“逢迎”、“写几篇文章”等等；

第三部份：概说几条。

关于历史

一九三一年春天，福建省委鉴于厦门认得我的人很多，不便在当地久留，派我回上海另任工作。

到上海后一些天，看到中央一些文件，曾经提过一些不同的意见。中央通知我到河北省委编《北方红旗》。我随党的交通到天津，暂居旅馆。因当天刚到，人地生疏，没有出门。但就在当天，有位同志把我从旅馆接出，说是住招待所。那是一个大楼，河北省委有些机关都在里面。当晚见过准备参加编辑《北方红旗》的一个女同志。不记得当时还见过谁。半夜有人叫醒，看是几个彪形大汉，觉得是侦探。那些人问话；你是甚么地方人？叫甚么名字？我音很重，只得说出福建。本来没有准备要叫甚么名

字，临时回答：叫王通。那四侦探已叫起睡梦中的许多人，知道这里住的人来自不同地方，都得意相视而笑。第二天清早，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同志（省委的实际负责人，省委书记许兰之（名义上的省委书记，原来是铁路工人）先后到这个大楼来，当然也落网了。

特务们把我们这一群人先送英国工部局，再全部移到天津市公安局。

到公安局约一两月，才开始审判。所有的人，都单独过堂。第一次，法庭对各个人简单地问了一阵。实际上，这次过堂，除许兰芝外，都不过是一个形式。许兰芝回来，他说，他向公安局法官叩头，说他是做生意的，那天走错了路，窜错了门，请求释放，法庭要他取保出去。

许兰芝是有点像做生意的，他这样说，大家都信以为真，给他揍些钱，有甚么社会关怀的，也给他介绍社会关系。总之，大家都太老实了。其实，他业已出卖了自己，出卖了他所知的组织。后来知道，因为敌人还需要他，他还继续关在公安局里面，并没有放出去。

在审判之前，陈原道曾经有一个错误的布置：凡是有人证明，法庭已知道的，都只好承认。

陈原道过第二堂回来告诉大家：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当时担任的职务，写了一个供状，说明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出路。（记大意）

各人陆续过第二堂。

由于在狱的人都已被许兰芝出卖，过第二堂时，法庭对于陆续过堂的人，都能说出他当时的职务，因此，原先过堂的各人就

都承认了。只是有一个同志回来后悄悄地给我说，“我的职务在被捕前一晚才定下来的，为甚么法庭也能知道呢?”这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其后，也轮到我过第二堂。

在第二堂审问过程中，法庭说我是从上海来天津做宣传工作的。我怀疑法庭怎么可能这样快地知道这样秘密的事。我是在被捕当天到津的，除了陈原道这样的省委负责人和接触有关的人可能知道外，我并不认识其他人，别人肯定也不会知道。我拒绝承认法庭的提问，因此，我挨了酷打，两手满是血。

我从法庭回到拘留所后，告诉陈原道我在法庭的经过。我说，我要坚持不承认的事。陈原道表示同意。

后来，全案只有我一个人过第三堂。法庭说，你身体不好，你随便承认一点就行，甚么左联、社联都可以。你承认，我们就放你。这些全是诱供的把戏。

我在苏联学过党的建设一课，读过：在法庭上不给敌人口供，可以迫使叛徒露面，暴露叛徒。这个教育给我印象很深，一直不忘。我还是不承认，我说，我甚么都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果然把案中的大叛徒暴露出来，这个叛徒就是许兰之。

许兰芝的叛变，是秘密的，大家并不知道，并完全相信他所作的怎样能够“获释”的欺骗。法庭要我承认是“左联”或“社联”，显然是因为不想让许兰芝露面出证。但因为我继续不承认。法庭就把许兰芝叫来了。他站在我的后面旁边。我心中想，真有人出来证明了，这样，可达到暴露叛徒的目的。我心中想，或许是带我来津的上海交通吧？有了叛徒，我终究心很难过，迟迟不回头去看。法庭催回头看看，我只得回头看究竟是个甚么人，看

到的，是许兰芝。“呵，竟有这等事！”我不承认我认得他。法庭大声叫打。特务看了我的两手都淤着血，不好再打手，于是特务就向我的身上乱打一顿。最后，我想，已经使叛徒不得不暴露，有了这样的结果，总算是一个胜利，就承认是由上海来做宣传工作的。

我离开法庭，回到监狱，把我另关一间，跟一些贩毒的人在一起，但还是有机会把许兰芝叛变的事传给陈原道和其他同志。当然，大家都原来没有想到，大吃一惊。后来我的鼻孔出血，记得血流九碗，监狱把我送医院，派两个特务日夜监视，时间或许是一个月左右，那个医生很年青，态度好，工作认真，总算终止了出血。回到监狱，过些时，就同大家一起，送北平，随后进了草岚子胡同的监狱。

到北平，风传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监狱里没有报看）。

待遇比天津好些。

过些时日，由东北军军法处审问，情况比天津宽多了。记得审问的，是一个军官，还有一个记录，像谈话的样子，不过，我们被审的人只能站着。有些同志乘机翻供，竟就翻了，放了。我跟陈原道同志说，我在天津过第三堂才给口供，显然是被迫的，敌人强加的，我可以只承认第一次、第二次的口供，因而无罪可定，能够获释。陈原道不同意，说，你有许兰芝作证，全翻不可能。监狱内的斗争是严肃的斗争，问题要服从党的领导。我同陈原道同志商议，可以承认加入过互济会。过堂时候，记得那个问托的东北军官也问过我是否认得许兰芝，我说，我不认得。他说，但是，你已承认加入过互济会，还是要判刑。最后，宣布我是判刑两年半或两年。

我在狱中生长的淋巴腺结核病一天天肿大起来，监狱找天主教医院修女们给我开刀，于是，淋巴腺结核不但不能收口，反而更加蔓延了，脓流得更多了，是个可怕的样子。陈原道同志给我说，你外面有甚么关系没有？可以想法找关系，设法出去。我给他说，我在厦门鼓浪屿遇到张贞底下一个老会计，他给我说过："如果遇到甚么意外，可以写信来，当给你想办法。"陈原道同志即促我写信，信的内容，写：我现住在北平＊＊＊，得病，如有便，请找人来看我一下。收信人一看信的内容，便认为我被捕，找一个当时厦门泉州一带的名人，也曾经是华侨的王雨亭（后来是共产党员），此人我过去见过面，但没有来往，据说有些豪侠气，跟张贞也认识，他们去找张贞，说我被捕事，要他拿钱帮助赎出。在北伐时，我曾经在张贞师部里当过秘书，当蒋介石在南京反革命时，福建反革命大头目宋渊源从南京打电报给张贞，要他就地处理我（意思是处决，即枪杀），张贞就匆匆忙忙，秘密把我送走。王雨亭找他，他就拿几百元给他，并说，如不够用，还可以来要。王雨亭北来，路过上海，找了陈文总同行。（陈文总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了。）王雨亭等来平后，经过陈文总在东京的一个同学，姓邰的（据听说，是个共产党员），请他的父亲（张学良的副官处长）帮助，进行活动。王等到平，第一次来探监。据记忆，他们第二次来，就要我出狱。这些事情经过，陈原道，还有在狱的其他人，完全清楚明白。

出狱时，王雨亭要我同他们到一个地方办理出狱手续。我当时并不知道是甚么一回事。（我想，王雨亭等也不会知道。）到了那里，管监狱的人拿出一张条子，记得大意是："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等话（只记大意是这样）。管监狱的要我盖个指印。我

看了单子，不肯盖。管监狱的人说，这是手续，不盖指印，就不能出去。就这样相持了一阵。王雨亭同志说，你的病严重，出去才好治疗，还是要盖，我当时想过，我早已翻供否认了党员身份，只承认是互济会会员，办互济会员身份的出狱，不会有损于党的荣誉，所以，最后我给盖了。

当然，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互济会，出狱后，也没有加入过互济会。盖这个指印，不过是说，我“年幼无知”，所以“加入这个互济会”，以后不再加入了。其实前者是编造的，没有过的事，后者也没有人曾经要我加入互济会，所说的，都是骗监狱的无的放矢。

事情经过就是如此。我就这样被因病保释了。如果这样的出狱经过，也可以称作“叛徒”，那么，人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怒，主观地、随意他编来编去，忽而指这个是叛徒，忽而指那个是叛徒。“文革”中康生、四人帮所谓“抓叛徒”，就是这样搞的，结果就搞得“叛徒如麻”。这个教训是够深刻的。康生、四人帮对人的定案方法似乎不宜再继续下去。

关于“伪装”、“逢迎”、“写几篇文章”等等

薄一波副主任说我“会伪装”，“会逢迎”，这就不知何所指了。我“会伪装”了甚么呢？又“会逢迎”了甚么呢？是指我到过毛主席处工作吗？我到毛主席处工作，是因为我“会伪装”、“会逢迎”而“爬上”去吗？我到延安以前，毛主席并不认得我，也没有甚么书信来往，我如何去“逢迎”呢？

我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毛主席，是洛甫同志和凯丰同志召集一次会议讨论孙中山问题的时候。当然，我敬仰毛主席，他来参加

会，使大家（我在内）都高兴。在讨论孙中山两重性的问题中，当时，我说，孙中山思想带有两种两重性，即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和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毛主席当时在会上表示，我的意见是对的。会后毛主席请参加会的同志在“机关合作社”吃饭，我也参加了。吃饭时，毛主席问我关于北京的一些事，我没有觉得毛主席喜欢我“伪装”去“逢迎”些什么。此后，我也没有甚么机会可以“伪装”去逢迎他。更后一点时间，多次见面，是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会一结束，他喜欢留下谈谈学术的事，很随便，我也无从“伪装”去“逢迎”他；或者是，我也无从为了“逢迎”，就设法“伪装”去达到自己“逢迎”的目的。

那么，你如何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做点工作呢？当然，这只能是由组织考虑的事了。几十年中，一直认为，在用人的问题上，毛主席从来都是把事情放在党的会议桌上，没有私相授受的事。我记得，我的事首先是洛甫同志通知我的，预先我并不知道。

所谓“秘书”，其实只是从当时国民党地区的报刊中编一些材料。一个“画报材料员”，当然，也可说是爬上去了。一个人不行，我还是请了几位同志帮助。现在能记的，这些材料就是：《九一八以来的国内形势》、《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经济》、《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文化》，都经毛主席看后才付印。

此后，毛主席又建议搞一个“政治研究室”。他仍然不是先找我谈，我现在记得，这事是由王若飞同志先找我谈的。

研究室工作也只在搜集、研究国民党区的各种材料，也鼓励大家写文章。记得七大之后，这个研究室由洛甫同志主持了。

不过，薄一波副主任的讲话指示，也有对的地方，我是曾经

"写几篇文章"的。勉强可说的，大约是：《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

《评〈中国之命运〉》，因为极大义愤吧，大概写过三天三夜（当然也要吃饭，也略有休息。或者如过去中国文人说过，笔泪俱下吧。文人无用，于此可见）。写完以后，即送毛主席处，记得他在休息，稿就留下。毛主席起来后，就原稿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并写上我的名字，找我谈，即送《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的同志提了一点意见，毛主席即于当天下午召集了一个小型的中央会议，讨论发表问题。记得周恩来同志刚从重庆回来，用内部电报拍发重庆。此文发表后，蒋介石发出一个通令，严禁这个小册子，叫我做"陈逆伯达"。

这可算是一篇"文章"吧？有些外国人也翻译、传播，好像也有点评论。因此，我就"爬上"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地位。不过，附带说一下，在提出候选名单后，我曾经找任弼时同志，请求不要选我。

《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是毛主席去重庆时，我陆续写下的。等毛主席平安回来，才发表。据我看过一种上海报纸，国民党内合也通令禁止。此篇文字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但很清楚，说的是袁世凯，实际是说的蒋介石。

《中国四大家族》写作中，经常找毛主席谈。其中有一段话，说：四大家族集中的庞大财产正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做准备（原文不在手，听说各图书馆也都借不到，因四人帮主张焚书坑儒，已查禁了）。毛主席主张加的这个意见，历史证明他的马克思主义远见，是很正确的，很好的。前面的（题记），也是毛主席提出加写的。为这个小册子帮找不少材料的同志，以及提过一

点两点有可采纳的意见的同志，我都在书处写明。

《四大家族》印后，感谢当时在国民党地区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南京）和叶剑英同志（北京）等许多同志的指示和努力，因得以传播。

《人民公敌蒋介石》是在西柏坡写的。原来准备的材料由延安带来。那时毛主席还在陕北。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主持工作。稿写完后，我请刘少奇看，他因忙，说，你陈伯达骂蒋介石，还用得审查吗？拿去印好了。为出版事，我到了阜平印刷厂。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前一部份和最后一部份，曾经由新华广播电台广播过。

当然，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些文章外，几十年中，我还拉杂写一些别的，其中包括“学术”等等东西，也会有不少错误，虽则没有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再去看它，但我心怀耿耿，想作些校正。有没有可能补过的机会呢？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人”之辈，也可以谈谈“补过”吗？薄一波副主任允许不允许我在“写几篇文章”上去做些补过呢？这些，我都是不能自主的。

至于说“写文章”的事，我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很少很少，读懂得的更少之又少，少之又少。但我的微小感觉，似乎马克思并不反对人可以学“写文章”，但看他写的是些什么文章。马克思似乎没有认为只“写文章”的就可以加罪，也没有认为凡“写文章”一下笔了，就不能再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就是在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极其浩瀚的最伟大文献，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

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

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

我曾经想学点马克思主义，已学了几十年，时间不能说太短，但何曾摸到马克思的毫末呢？说到这点，我是无地自容的。

不过，中国民间的话："天无绝人之路"。假如一个人想经过不断自我批评，从而去学点马克思主义，学写点文章，而又不断批评自己，该不算是有罪的吧？

再说"写文章"的事。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是最"能写文章"的文章。

李大钊、鲁迅、郭沫若是中国"能写文章"的文章豪杰。

另外，还有很多中国人"能写文章"，其中，社会科学界就有很多能写文章的。

当然，薄一波副主任可以说，这些我都知道，不需要你多说，我并不反对"写文章"，只反对你陈伯达"能写几篇文章"。

我做的"文章"不好，很蹩脚，是铁的事实，这是没有可说的，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我还没有这样无耻，竟会夸耀这种蹩脚的铁的事实。可是，当时，只要蒋介石一看会不高兴，我就想写。蒋介石越会不高兴，我就越想写。或许可说，你这样不过是阿Q精神。你不写，别人不会写吗？我并没有愚蠢地想过，说过，也毫无可能阻止任何别人去写反对蒋介石的"文章"。而且，事实上，反对蒋介石的好文章是很多很多的。在"文化人"中，我的反对蒋介石的文章也不过是大海中的一小勺。当时没有听到

有人指示我不准写。而且，伟大的党的领导人当时是鼓励人写的。因此，我就居然敢于冒昧写起来。我这样遵党之命，难道就是为了“伪装”，为了“逢迎”吗？

我实际上并不会写文章，但又写了一些，即使不三不四，但业已成为事实。现在听了薄副主任这次大喊一声，我应当自悔冒昧。虽然去日已多，悔之已晚，但还是要引以为戒，不敢再写就是了。

记得我常对一些同志说过这个真相：我没有什么文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文化人”（我读过两年半师范，开始学期，名次丁等，这大概是有案可查的）。到现在，人更老朽不堪，看书难，写字难，能说上什么“文化人”？感谢薄一波副主任，使我从此彻头彻尾地清除了我曾经沾污“文化人”的名义

。

至于张春桥“能写几篇文章”这事，我不知道他写过一些什么。我看的东西之少，这也是一证。据我所知，林彪在九大念的“报告”是他写作有份的。我被四人帮押在监狱的时候，看到《人民日报》有一篇横贯第一版的大篇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没有细读，似乎其中点了刘少奇同志和我的名字。这是我知道张春桥“能写文章”的唯一的、独立署名的一篇。当然，文章不在多少，有“好”的一篇，也就可以独树一帜，独立千古。唐朝一个年纪轻轻的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不是到现在还可吸引人一看吗？但张春桥的“文章”能算得什么呢？即使他写得再多，也不过是一堆狗屎。

我愿意有人批评我，而且批评从严，可促我进点步。不过，如果摭拾四人帮骂我的馀调，给我重戴上四人帮给戴的帽子、什

么“叛变了党”，“成了叛徒”，“有案可查”，等等，只要我还有点喘息，也就不能默然。

我所“写文章”的重要部份，既然是关于蒋介石的，蒋介石已死，但历史的公案并不会消失，犹如袁世凯虽死得很久，但袁世凯历史的公案并不会消失一样。蒋介石将永远钉在历史的最可耻的柱子上，如孟子说过的，“名之曰幽历，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在揭露蒋介石这件事上，或许可算是我在党领导下做了一点很微小、很微小的事。或许可说，我虽然也做过一些错事，但在这点上，我或者可算并没有白白地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

至于四人帮查禁我这些文章，总算是替蒋介石做了蒋介石自己也做不到的一点事。蒋介石已死了，不然，他如知道，或许会对四人帮感谢的。

概说几条

第一、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搞“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大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的队伍，因此，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第二、一九三一年春，我由上海派到天津编辑《北方红旗》，到津当天，就接到招待所，半夜被特务叫醒，特务把所有住在那里的人都逮捕了。

第三、先由特务送到英租界工部局，后由特务全部押送国民党公安局。

第四、第一次过堂时，当时河北省委书记许兰芝（据同狱的

同志们后来告诉我：他是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又是青年团的中央委员，同狱的人叫他是“双料中央委员”）秘密叛变，暗中给敌人提供了全部秘密。

第五、我读过苏联共产党编的“党的建设”，记得其中一条，大意是：“在法庭上不给敌人口供，可以暴露叛徒”。我相信这条，终于暴露出隐蔽的大叛徒许兰芝，我觉得，这在法庭上是一个胜利。

第六、到北平后，我同陈原道同志商量，在天津的第三次过堂的最后口供，即由于叛徒许兰芝出证而承认是共产党员的口供，可以完全翻掉，照用我在天津第一次、第二次的口供，但陈原道不赞成这样做。他认为我有许兰芝的证明，全翻办不到。因为陈原道是党的负责人，只好听从，结果承认是互济会会员。在审判时，张学良的审判员说，你承认是互济会会员，还是要判刑。其时，日本占领东三省，影响了张学良对政治犯的态度；如果我全部翻供，还是可能放的。有些同志这样做了，结果都放了，就是事实。因陈原道为人的态度比较厚道，后来他出狱，听说他英勇牺牲了，我一想起就悼念他，并没有怪他。

第七、我的淋巴腺给核病发展蔓延。陈原道同志建议，要我想法找外面的旧社会关系，活动出狱。

第八、因我翻供，否认叛徒许兰芝出证的共产党员身份，是以互济会员身份出狱的，并没有损害党的荣誉。

第九、出狱后，曾经住过西山疗养院大约七、八个月。该院大夫卢永春，在北京是个有名的痨病科专家，治疗得法，我的淋巴腺结核渐渐消下去，因此，认为我可出院。可是，我还欠住院费很多，无法交还，蒙该院宽大，说，“你将来能做事时给盖一

批房子好了。”这是当时该院无可奈何的话，北京解放后，我找过卢永春大夫，可惜他已去世。

第十、我出狱后，开始只得依靠闽南在北平的学生生活。不久，带病工作。张家口事变时，我几乎是躺在床上给《老百姓报》写社论的，后来。办天津的河北省委《实话报》。又陆续办《华北烽火》、《长城》、《国防》、《人民之友》等等党的刊物和统一战线的刊物（如吉鸿昌欧出残创刊的《民族战旗》。

第十一、做过一点文化工作。一九三六年起，陆续一边工作，一边在一些学校当教员，以维持生活。

第十二、抗战后，到延安。

第十三、在“文革”中被四人帮逮捕送监狱，至今已十四年，不是因为别的，只是我违背康生、四人帮，因而成了万恶不赦之徒。他们定我为“国民党特务”，“反共分子”，“叛徒”，“托派”，“尊孔派”等等，听说，还在他们下达的文件中说，“陈伯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面人物”……如此等等。四人帮给我戴的帽子之多，罪名之众，可谓如山，叹观止矣。

对“文革”运动的事，感谢薄一波副主任指出，我“犯了滔天大罪”。

关于我怎样爬上“文革”的位子，好像以前谈过一点，这就不用再提了。

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本来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严格态度，应有的严格义务。十四年来我一直在思索我的“滔天大罪”。

罪已判了，是否还判得不够呢？当然，还可以再判，判得使薄一波副主任能够满意。

古人说，人生七十复何求。我年已八十，大大超过了七十，

又复何求呢？有生必有死。古人不是也说过“士可杀”吗？

似乎也有人说过，“有来必去，理亦当然”。

事情究竟是不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的。

一九八四年八月

补写一：

说到我“会逢迎”的事，我想起，在延安时，我写过《关于十年内战》。在北京，为纪念党的三十年诞辰，我写过《论毛泽东思想》。或许这些都可以叫做“会逢迎”的吧？这些稿子付印前，都是经过毛主席和几位中央同志先审定过的。

补写二：

我曾送过所写的一个材料，因为时间已搁下很久，就在稿子前面附写了一些事，其中说及一段关于陈云同志在解放初期的经济工作的成就，因看到《陈云文稿选编》的编者提到薄一波副主任，我也就跟着写有薄副主任的名字。我现在领会，或许这就是我这一个犯人对薄一波副主任进行“逢迎”的大不敬事件。我知罪了，以后再也不敢这样胡来了。

附录一

陈晓农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胡绳同志的信（节录）

胡绳同志：

最近我读了周国全、郭德宏著《动乱中的陈伯达》一套（安徽人民出版社九三年三月第一版，发现该书除后半部份有个别段落有可取处外，存在的问题很多，现仅谈几个主要的问题。

一、该书使用了一些文革时期专案组搞的虚假材料。书的开首有关陈伯达被捕情况的部份引用专案组搞出的解方等人的口供，其内容是很荒谬的。我在一九七二年底看了传达的中央二十五号文件（即专案组对陈伯达的审查报）之后就写了一篇分析文字，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交当地党组织转报党中央。专案组搞的解方的。供是经过多次更改的，较早的一份大概因过于明显荒谬，在一九七二年二十五号文件的正式审查报告（包括附件）中已弃置不用，现在也被作者重新翻了出来，上了正式出版物。在党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的今天，出现这种事是令人惊讶的。

现将我当年写给中央的分析文章的主要部份随信寄上，希望阅后能转交有关党史、现代史的研究部门。

还须说明的是，专案组搞的这些材料从来没有与当事者陈伯达本人见过面。陈只是到了一九七三年才从报上刊登的党的十大的公报中看到自己已被定为“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等等，此后他曾就自己的历史情况多次写过申诉材料。当年专案组搞的材料为了把陈伯达定成叛徒，实际上是

把陈原道同志（我党著名烈士，从北平出狱后到江苏工作，一九三三年再次被捕后在南京牺牲）、刘宁一同志等同案人都当成叛徒看待的，反而掩盖真正的叛徒许兰芝的罪行。现在，这些同时诬陷了许多人的虚假材料居然继续被当作信史来引用，这就不是一件只关系某一个人的小事了。

附录二

专案组的证据不能成立

陈晓农

一九七二年十二日我写了《对二十五号文件附件的一点分析》，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交党组织，请组织转送党中央。我在文中对当时专案组审查报告（即一九七二年中央二十五号文件）所附的证据进行了分析，说明陈伯达天津被捕案的定案证据是不能成立的。因原文较长，现将主要内容抄录出来，请与陈伯达本人的陈述相参看。

材料第三部份关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天津被捕问题，存在明显的矛盾，应予分析。

一、从各供词看，可初步判断，侯天铎参加过此案的复审。陈新亚参加的是特务一队的初审。解方所述王通的具体情况，都是听说的和从供词中看到的，所以他并未亲自参加逮捕审讯陈伯达。侯天铎和陈新亚也说王通（陈新亚只记得是姓王的）供出了其他人，但被供出的人的姓名记不得，而解方却清楚地记得王通供词上写著“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善（?）殴、史连甲等人”。一个没有直接参加审讯的人，对于暗隔四十年前的一篇供词，能够记忆得比审案人还清楚，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其实，解方不过是简单他把他所能说上来的被捕人统统列为是王通供出的人）。是否解方也能把其他那么多同案人（按解方说，包括在法租界逮捕的，共为三十余人）的供词内容都说上来呢？是否能把他在公安局任职期间所看到过的所有被逮捕人的供词内容都说上来呢？解方居然还能“模糊地记得”侯天铎转述的（侯的

供词中所没有的）别人关于王通（这个他未见过，当时也没有什么理由特别重视的人）的话。这样离奇的超人记忆力是否诚实？这样仅凭离奇的记忆就可以确定四十年前的供词内容，就可以定案的做法是否同“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完全一致？似值得考虑。

二、如果说，解方的供词有些过于清楚，那么侯天铎的供词又在清楚中存在着不合逻辑的含糊了。既然侯天铎能记清担任宣传的名叫王通，这个人供出了其他担任组织、担任联络、担任缮写等工作的同案人，并在复讯他人时证实了王通供词属实，那么为什么就记不得担任组织的叫陈原道、担任联络的叫史连甲、担任秘书长的叫刘亚雄（按解方交代，还应加上担任书记的叫许兰芝），而却要说“供出的人名字记不得了”呢？须知王通并不是个显要的人，而许兰芝、陈原道、刘亚雄、史连甲这些人在当时职务要比王通重要得多。如果要说，由于时间太久记忆不清吧，为什么单独对王通的情况记得这样清楚，而对其他更重要的人物（按照特务们的供词，恰也是王通所供出的人物）的名字反而一个都说不上来呢？

三、三个特务的供词都没有讲出是许兰芝首先叛变并出卖全体同案被捕人这一重要情节，也没有讲许兰芝同王通对质的情况，（须知道些情况对了解陈伯达被捕后的表现是十分重要的，绝不应被忽略）。这又是为什么呢？是由于记忆淡漠了吗？如果连这样重要的情节都忘记了，那么他们的供词怎么又都能写得那样“具体”、“确切”呢？这三个特务的供词表现出他们的惊人强的记忆力中所存在的惊人的模糊，而且恰恰是对最重要的情节记忆模糊，以至竟然完全忘记了，真是令人奇怪！特务们这些情节

不通的文章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确实让人难解。

四、文件正文说，陈伯达供出了从莫斯科回来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但作为证据的刘宁一的交代中，仅仅是提出疑问，并没有进行肯定。既然敌人知道王通是从苏联回来的，而王通又已“乖乖投降，全部交械”，“供出了从苏联回来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那么为什么王通不供，而敌人也不问他自己的真实姓名呢？从其他材料看，敌人并没有把从苏联回来的同案人的假名字都改掉。如敌人结束审讯后的报功请奖表上写的张任秋的名字，从材料看，张任秋不是真名，而是假名，真名是蒲秋潮。所以，文件正文的那种说法显然是讲不通的，是背离实情的。

五、刘宁一在交代中认为，王通承认了自己所知的组织关系。王通究竟知道哪些组织关系，刘宁一不会一点不知，为什么不写出来供调查时对证情况参考呢？（既然刘宁一把从莫斯科回来的同案人的姓名都一一写出来供参考）据我所知，刘宁一在一九六八年初写的一份有关此案的材料中，丝毫没有提到陈伯达的情况，连被捕人名中也未写王通。陈伯达为此写了一篇批评刘宁一的文字，明确说明他和刘宁一是同案人，刘宁一不应当在叙述中不提他。刘宁一前后这两份不同的交代，内容上的差距如此之大，追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六、本来，陈伯达是刚到天津的当天晚上就被捕的，由于时间太短，省委的绝大部份人他还不认识，连刘宁一都是在被捕后才认识的（这些情节，文件只字未提，但陈本人以前多次讲过）。他初到这个生疏的地方就被捕了，还没有进行一天工作，根本还来不及搞清楚哪些人“搞通讯”，哪些人“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又怎么可能像文件中特务们的口供说的那样，

把那些他还没有条件搞清楚的情况都供出来呢？而且按照特务们的描述，似乎党的地下工作竟可以没有一点纪律，没有一点秘密工作的规则，任何被捕人都几乎知道所有的组织情况，这也太违背常识了吧？事实上，只有省委书记许兰芝和组织部长陈原道才有资格知道整个的组织情况。

七、远锐一九三二年九月的报告书，作为一份可靠的旁证材料，本身就否定了只参加过初审的陈新亚的供词和解方所说的“一问就供”等等说法。报告书影印件下面所加的说明把报告书中“有些人在看守所的供词……”一句中的“有些人”直接解释为“王通”。“有些人”和“王通”成了同义词。但王通既然连自己的负责姓名都没有供出。他的供词，何以就能当传记来读呢？

通过以上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文件关于陈伯达供出其他人以及供出从莫斯科回来的同案人的其实姓名的结论，其证据都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情节，文件正文或者回避，或者一字未提，这似有碍全面正确地了解案情。

第一、陈伯达过去多次说过，在其他人已承认身份之后，他仍未承认自己是党员，所以才迫使敌人拿许兰芝来对质。对质后因身份已经暴露，他才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对质一事在刘宁一的交代中可以得到证明。这就清楚地说明，是担任省委书记的许兰芝供出了包括王通在内的其他所有同案人，而并不是其他人或王通供出了许兰芝。因此，王通和其他人都被判了刑，唯独许兰芝未经判刑即被释放。文件回避这一关键情节，无形中对许兰芝这个真正的叛徒做了袒护。

第二、陈伯达多次说过，被押送北平的同案人，在九一八事

变之后，趁局势的变化，曾集体约好一起翻供。他翻供以后，不久被保释（陈本人说是因病保释；据闻一九六七年底或六八年初，一些群众组织贴出过调查此案的大字报，其中也说到“王通因病保释”）。关于翻供一事，文件只字未提，似应加以查明。因为如果曾经翻供，那么出狱时的身份就不会同翻供前一样。

谨答一个"调查提纲"

(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间，在北方所知道的一些事以及我自己工作的苦干经过)

(一)

在北方局时，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普通的党的宣传工作者。因此，北方局上面的组织演变的情况，我没有可能做有条理的叙述。最近看到高文华同志一篇《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见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辑)，我觉得高文华同志是当事人，或者是主要当事人之一，参考他的文章是适宜的(在北方时，我不知道——当然也没有见过高文华同志，仅在延安党校时才看到他)。

我读了高文华同志的文章，对他所叙述的"卖掉孩子"以维持同志们的生活一事，深受感动。他在同志们艰难条件下所作的高度的共产主义的自我牺牲，一切共产党员都可以从他这种牺牲精神里面吸取力量。这是共产主义所以能战无不胜的一个高尚例子。那时，我大概在北平吧，因投稿关系，同几位进步文化人(吴承仕先生等)有些往来，假如我知道这件事，或许有可能设法奔走，力求避免出现这种痛苦，但现在说来，这都算是后话了。

(二)

在一九三四年间，我编辑过《实话报》(油印的，记得是小

连刻印的)。随后，因为《实话报》提出“武装保卫华北”，北方局（或河北省委）有不同意见，认为：那时华北已经是百分之百地沦亡了，跟“满洲国”没有不同，差别只是“旗子”。于是，定我为“右倾机会主义”，做出决议，撤消我的工作，另提“武装收复华北”的口号。决议把当时宣传部负责同志（李华生同志）也纳入在这有关右倾机会主义的框子里面。看来，这个决议是当时朱理治等同志主持做出的。(在延安党校时，遇见李华生同志，他对这件事，想找中央组织部，记得当时我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去麻烦组织部了。)

因为对我的工作的新安排似乎不安，我请求到北平做文化工作。

(三)

原来在天津和我联系的一个交通员被派到北平当市委书记(似乎姓吴，后来叛变了，时间太久，他的名字我一下子记不清了)。我没有让他知道我住的泉州会馆（福建的地方会馆很多)，总约他在一些地点边行走边谈事，地点没有固定。为避免被敌人注意，比较多的，是约他在东交民巷来回的道路上。

我介绍过一些闽南在北平读书的人参加过“社联”或“左联”这类组织。有些人是住在漳州会馆的。有一个住在龙溪会馆，因为是普通组织的成员，所以让市委这个家伙知道，以便于组织上联系。

市委这个家伙叛变的事实经过，后来我到天津时，柯敬史（庆施）同志曾经和我比较具体地谈过。

现在我说一说在市委这个家伙叛变后，我自己的一段困难经

历。

（四）

市委书记叛变后，特务们先抓了住在龙溪会馆的那个人，并带着他到漳州会馆，要他指认其他参加“社联”的人。漳州会馆那些青年学生算有革命骨气，张着眼睛盯着看那个要来指认的新叛变者，使他迟迟不敢开口。漳州会馆的长班原来会打拳，那时看到有些人进到里面去，没有先告诉他（按照普通规矩，生人进内，要先告诉门房），又听到里面发生什么事，他就进去大声问：“你们是流氓或土匪？为什么不经门房就自己进内来？”特务们因为还没有抓到人，发了火，就和他对打起来，那几位同乡青年就都趁机跳墙走了。后来这位长班告诉我：他当时实在不知道来的人是国民党党部特务，如果知道，他也不敢同他们那样打起来。

有一位从漳州会馆逃出的青年，在上午较早时间，匆匆到我处，告诉我昨晚发生的事。我立即迅速转移。铺盖全都卷起，把家人（诸有仁）和我最早的孩子（已逝世）立即送到会馆的长班住房，求为掩蔽，并告诉长班说，如有人来问，就这样回答：我因母病，已于前几天回老家。长班，人很老实，又因住会馆的我的一个同乡对他常有好处，就欣然接受了这样安排。后来，我听说，我走出会馆不久，特务来，长班完全按照我这样的安排说话。说时迟，那时快，我由会馆同乡的介绍，马上离开会馆到清华大学两个同乡处暂住。因彼此生疏，他们也害怕连累的样子，住了两天，进城找吴承仕先生（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请他和他的两个学生帮助。齐燕铭同志（蒙古族）把我介绍到北京大学教授罗膺中先生（也是蒙古族）处，住的日子不少。那时报上登

"何梅协定"的消息，因此，每天都有话谈。诸有仁和我最早的那个孩子，我记得是住到张致祥同志处（张致祥同志人还在，如我记错了，请他纠正）。经过这样转折后，我和全家都移住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公寓，吴承仕先生来看，并给一百元做生活费，当时真感激不尽。

（五）

"何梅协定"规定撤走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国民党一时手忙脚乱，顾不上继续抓人，才给了我们脱身的机会。经过一种社会关系（小连的家），我与天津的党的关系联系上了，到天津先见到柯敬史同志，他给我说了这次北平党组织被破坏的事实经过，就同我商谈以下的工作问题。

（六）

柯敬史要我寻找过去和吉鸿昌同志（在张家口事变时，我认识他，后来我在天津工作时，又得到过他的帮助）有关系的人，弄些钱，办一个刊物。我找到了南汉宸同志，把办刊物的事告诉他。他答应承担筹款的事，并担负我在天津工作的生活费。当时在天津市委工作的李铁夫同志（朝鲜人）帮我找到跑印刷厂的人。刊物开始叫《华北烽火》，事实上由我主稿、主编，兼任校对工作。因为校对工作不好，所以错字很多。

刊物的发行，由南汉宸承担上层关系方面。记得他承担的数量是相当大量的，特别是西北军方面（大家知道：南汉宸同志过去当过杨虎城的秘书长，各种关系较多）。李铁夫同志和我，主要是向北平和天津的学界（主要是学生）散发。但为时不久，保持发行的工作逐渐困难。国民党特务已有人在邮局从事查禁。因

此，刊名改了几次，例如《长城》、《国防》、《人民之友》等等名字（是否还用过《中国人》的名称，已记不确了）。

当时，李铁夫同志爱人的一位亲属、大学生张洁清同志每次来津，总带回一批刊物到北京去，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打破国民党查禁的作用。（此事如果是我记错了，请原谅！）

（七）

过了一些时间，柯敬史同志忽然来说：“这个刊物，我们不管了，归特科管了”（即归南汉宸同志管）。我听了，有点惊讶和生气，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我又不是机会主义，为什么总给打击？”他说：“我们对机会主义的打击还不够。你知道：‘南汉宸为这个刊物弄到多少钱？’”我当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印刷费和我的初期生活费是南支给的（南后来介绍我到天津法商学院兼课，生活费就自给了）。

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但是，据柯说，刊物归特科管，总算工作有个着落。

那时北方局生活有困难，当然可以同南汉宸同志和特科其他同志商量，将筹得的钱尽量帮北方局。但看柯跟我的谈话，我也弄不清他们之间究竟怎样。

（八）

又过了一些时间，据李铁夫同志跟我说：有一位新来的中央代表注意这个刊物，以后刊物将由北方局管。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不久，就时常有新气息的文章送来，思想、文风都和旧的那种党八股大不相同。有一篇署名“陶尚行”的公开信。后来送到的文章，署名多种多样。有署名“凯风”的，我就误会是何凯十

同志，因为凯丰同志在莫斯科和我同班。也有署名“莫文华”的，如此等等。如果我现在能看到那些刊物，或许能够分别哪一些是刘少奇同志的文章来。事隔四、五十年，我人也衰老，不能多记，或者记错，请原谅！

（九）

“一二·九”运动后，姚依林同志来津参与这个刊物，刊物有他写的一些文章，林铁同志也参加过这个工作，也刊有他的文章。

（十）

根据党的决定，刊物移到北平出版，又改名为《人民之友》。由于党的照顾，校对、跑工厂这些事，另有同志担任。记得彭真同志到过我处，说：“中央代表认为我可专心办刊物，不必在学校兼课。”（“一二·九”运动后，我在吴承仕先生主持的中国大学国学系兼课，别名“陈志梅”。在天津住时，每星期有两天来北平，课后又回津。）党认为我的生活费可由党筹措，不过，因为兼课有些好处，我好像留恋不舍，没有同意。

记得在《人民之友》上有彭真同志写的文章。

（十一）

刘少奇同志、彭真同志等到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大会。北平失守时，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同志、林铁同志和我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他自己往延安去了。没有多时，黄敬同志建议，我还是到根据地工作为好，林铁同志也同意。于是，我到了天津，准备转道去根据地。李大章同志在天津把我留

下。不久。据李大章同志告我，北方局来电报要我去根据地，担任北方局“宣传部长”的工作。于是，坐船到青岛。黄敬同志随着也来了，从青岛起，一同到了西安。黄敬同志由此到华北根据地，我因为要送小孩到延安，没有和他同走。一路曲曲折折，进入了中央根据地——延安，中央没有让再走。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

我所了解的中共北方党的情况

——与党史工作者谈话纪要

一九三五年，中共北方局的成员有高文华、孔原、朱理治、李大章、柯庆施等。高文华任书记，李大章是宣传部长，柯庆施是组织部长。当时北方局领导西北、华北等他。我到北方局不久，朱理治等人就到西北去了，他们在处理西北问题时有些不安当的地方，把高岗、刘志丹等人都关起来了，后来红军到陕北，当中央、毛主席把这些人都给放了。

我在天津时，主要工作是编北方局的机关刊物《北方红旗》，同时还编辑过一些抗日救亡的刊物，如《长城》、《华北烽火》、《国防》等等。出版印刷的经费是南汉宸给的，由南负责筹集，他说是西北的一些熟人及杨虎城的部下捐的。刊物通过李铁夫的关系在一个印刷厂印刷。李铁夫是朝鲜人口在天津曾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刊物有一部份由张洁清从天津带到北京：姚依林在天津参加过办刊物的工作，彭真在这些刊物上也发表过文章。柯庆施对办杂志不支持，说花钱多，盘行工作危险。其实主要原因是南汉宸直接把经费给了我，没有经过柯庆施，所以他很有意见。发了脾气，对我说："刊物北方局不管了，交给特科办得了"。刘少奇来了以后，肯定了我办抗日宣传刊物的作法，认为应该继续办下去。我到北京后，刊物也迁到了北京，改名为《人民之友》，后来成为党的一个机关刊物。这些刊物上的文章大部份是我自己写的，部份是其他地下党员写的，刊物的校对、发行全是我

人。到北京后，增加了一个姓杨的，后来可能去山西工作牺牲了。

一九三五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二·九”运动的开展开始是自发的，后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我在天津看了《大公报》，知道学生运动的爆发。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竟出现了这样英勇的示威游行，我心情很激动，大哭了一通，马上买车票赶到北平。中国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根大的作用，这一时期我为学生们起草过一些文件、宣言和宣传大纲。“一二·九”运动后，刘少奇到北方来主持党的工作，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的倾向，从此工作走上了正轨，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从“一二·九”运动到“七七事变”这一时期我主要从事了党在文化界的工作，领导了党的特别小组，开展了新启蒙运动。我当时在吴承仕等人办的《文史》杂志上发表了《从老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并在《文史》杂记上写过其他文章。吴承仕对我的文章比较赏识，便请我到中国大学授课，我当时使用的名字叫陈志梅，讲课内容是先秦诸子。李达也曾在中大讲过课，但他那时对政治活动不大参予了。吴承仕爱下棋，有时请我们在鸿宾楼吃饭，在接触中发现吴承仕思想比较进步，就请示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决定把吴等进步的文化人吸收到党内。当时考虑到这些人不可能同一般人一样过党的组织生活、建立组织系统，便经李大章同意成立了一个党的特别小组。我想这也可能不是李大章一个人的主意，而是北方党领导机关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特别党小组的组长是张致祥，成员有吴承仕、齐燕铭、曹靖华、孙席珍，由我负责直接与北方局联系，

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开展文教方面的工作。

关于新启蒙运动，我主要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另一篇是《论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张申府起了很大作用。张申府后来在重庆，我写了《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新哲学”问题及其他》在《中国文化》上发表。当时毛主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至此，新启蒙运动告一段落。如果没有“七七事变”，拥护新启蒙运动的人很多，规模可能要发展得更大一些。

“芦沟桥事变”后，柯庆施指定我、林铁、黄敬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北平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没有明确谁是书记。八月份日本人占领北平，已经无法开展工作了。日本人进城第二天，我们三人商量，决定离京。我与黄敬一起，经青岛、西安，最后到了延安。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五日

关于《毛泽东选集》

——答文献研究室问

一、一九五一年开始由中央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我认为第一卷的（本书出版的说明），全是真实的历史。

二、所谓“出版委员会”属于出版的名义。主编当然是毛主席本人。那时他身体很康健，他亲自处理出版事宜，是没有困难的。

三、毛主席在哲学著作方面，看来比较用力，做些重要的补充。

四、徵求大家的意见，有的意见采用，有的意见没有采用。这本是党内的正常生活，毛主席对《选集》的出版，也正是这样。

五、有些重要的题解，是毛主席自己写的。

六、当然，“出版委员会”也要有人工作。记得其中有胡乔木同志。有些注解，或许还请范文澜同志及其他同志帮忙过。我担任过出版的具体工作。

七、毛主席在苏联时，记得是：斯大林对毛主席谈过出版《选集》事，毛主席提出请苏联同志参加此事。随后，尤金同志来。中央有一次开会，谈到派谁和苏联同志接洽，记得是：彭真同志在会上提过我。担任翻译的，中国方面是师哲同志，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苏联方面是费德林。

八、尤金来华后，经过翻译，读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记

得，他很欣赏《农村调查》，认为此事材料丰富：一些普通人，普通农民，一谈起来，就提出人所疏忽或不知道的知识。他提议将此调查编进《选集》。不过，毛主席还是要另行出版。尤金还提过一些意见，但好像不甚重要，现在我也想不起来了。

九、尤金回苏后，专门写一篇介绍《实践论》的文章，在苏联报上发表。

十、印字校对的一些技术事，我对印刷机构的同志说过："不能错一个字。"

一九八六年四月

《毛泽东选集》出版问题补记

一、用中央名义统一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九四九年在西北坡，我向毛主席提议的，因为当时有各地的不同样的版本，尤其是不按年代编辑，对读者有些不便。毛主席当时同意我的提议，但因为忙于处理革命的胜利中的问题和准备到北京，出版事情就搁下来。一直到毛主席从苏联回来，才开始工作。

二、“出版委员会”，我认为，这只是个名义，中央并没有提出“委员会”的具体名单。如果说“委员会”，或可以说，是指中央委员会。我也不算是“委员”，不过是做些具体的出版工作的人员。

三、出版工作上用的人，可以说，我先考虑过要有人帮助做些注释工作。似乎记得在中南海旁边，原有一座楼，请过些年青同志住在那里帮忙。人名我都记不清了（请原谅我已八十几岁，老了善忘）。关于董仲舒的注解，似乎是范文澜同志做的。

四、出版的最大劳绩，当然是主编毛主席，再者只能归功于新华印刷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人。因为新华工人和校对者认真工作，在印刷方面丝毫不苟。

五、或许历史上有不少出版事项，不会不作某些校订。举一个例子，如列宁的名文《论我国革命》后面就记有下列文字；“按报纸原文刊印，并根据列宁对速记记录的指示作过补充修正。”如此等等。可见，补充，修止，在出版事业上是会有的，但《列宁选集》上并没有注明这个工作是由哪个人做的。

六、以上我所说的是毛主席在世的事，不涉及毛主席逝世后

馀下的编辑工作问题。

七、毛主席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工作和建立的业绩，将永远刻画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其影响大大超过自己的文字箸作。

一九八六年五月

关于“百家争鸣”的事

《调查提纲》敬悉。谨就回忆所及，写出供参考。

（一）关于“百家争鸣”问题，《提纲》（4）中记载的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讲话，我认为，这个记载是属实的。毛主席说：“……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不要拿一种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你的人势必就会越多。”毛主席讲了历史，而且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问题的实质。毛主席是党的领导人，他第一次在党的重大会议上提出这个方针。

（二）康生在怀仁堂的一次包括许多党外人士的会议上说到这个问题，时间是在上述党中央会议之后。毛主席既正式宣布和解释了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党中央的方针。康生要说这个问题，就应当用毛主席的语言，阐明问题的实质；但他不然，却说什么“陈伯达提出‘百家争鸣’”之类的话，我当时也在会上，认为他那样说法不对，徒乱视听，就写了一条子给他。

在此之前，根据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我有时也用过“百家争鸣”这个老成语，但止此而已。毛主席不同，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随后陆续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来探索它，解释它，给予崭新的内容，崭新的意义。

（三）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可见任何一个群众，任何一个党员，在各种问题上，见到什么，想到什么，就提出来，会有对和不对，或者即使是对的意见也可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得来的，而是偶然的兴会

所至，甚至只是片言只语，但不管怎样，只要是对的，党就应加以采纳。个人，或许算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吧，绝大多数人是无名之辈，但是党把群众的涓涓不息的意见集中起来，而且作出慎重的比较，就能够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毛主席就是这样做的，从而领导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

（四）全国解放初期，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和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由胡乔木同志负责回，历史研究委员会由我负责。

历史问题研充委员会开第一次会时，谈了一些工作。当时我觉得年少时读过的《纲鉴易知录》通俗易懂，对青年和初学者似乎有益，因此建议标点出版。会上没有人反对，并且随后很快就标点出版了。此事美中不足的，似乎原来书内附有历来人们（史学家）的一些简短评论，或许因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都删略了。其实，也可以不必这样做。或许这件事启发我想起百家争鸣的事。

《调查提纲》上说到办刊物问题，记载我对刘大年、尹达二同志所说的话，我想那些话的内容和语气，都很像是我的，但没有商量的样子，其实倒有点官气、阀气。

像历史类问题，当然不会有经常要讨论的事，开过这第一次会，不记得是否后来又开过，或许因为我的十足官气，虎头蛇尾，而且人事匆匆，就未再开会。不过，在长期间内，我同郭老、范老是保持个人接触的。

（五）同志们年纪较轻，记忆力较好，将他们的回忆加以对校，会较妥当。虽然有参差，但一经对校，便容易得到校正。当然，年轻者有时也会遗忘，也会记错。

以上我所写的，也仅是个人的一时回忆，年老易忘，而且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错误之处，敬希指正！

陈伯达

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

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一）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在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后出现过。《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收集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这样记载：

“……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组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第一卷，一一七页）

在选集编辑时，毛主席写了如下的注释：

“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是当时红色区域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以便进行生产所建立的劳动互助组织。加入这种劳动互助组织是自愿的，而且必须是互利的…劳动互助社除了社员互助外，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帮助孤老做工的只要吃饭，不要工钱）。因为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于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热烈的拥护。”（同上，一二一页）

抗日战争中，在陕北，似乎当时政治研究室农业组曾经有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安塞农民出现互助合作性质的文字。似乎这篇文字引起过毛主席的注意。（此事仅凭记忆，如记错，当然是我的不是。）

（二）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演讲，闻名于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他。其中说：

“……在边区，我们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

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劳动互助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毛主席在这个演说中，除了列举一些事实外，还对一些问题做了阐释，原文还在，这里不复述了。

（三）一九五一年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章案》关于两个积极性的论点，是在起草过程中我向毛主席请示时，毛主席提出的。这个草案是集合了当时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同志充分认真讨论的意见而拟成的。当时其他各地区在解放后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或土地改革正在完成的过程中，来不及请这些地区派出代表参加。

（四）记得有要求“收缩合作社”一事。对此事，似乎毛主席当时是直接知道的。我不记得农村工作部给我打过电话。记得，当时毛主席是不赞成此事的。

（五）根据当时接触过的一些材料（例如湖北），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办起了工业。又搞农业，又搞工业，这件事启发我想起恩格斯的一种著名的论点。例如，恩格斯说：“……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再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二一二页）我想，既然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同时又搞农业，又搞工业，（即“亦农亦工”，或可说，“亦工亦农”。当时，这纯粹是自发的，这些工厂自认只是“小小工厂”），而仅署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似

乎不完全反映这种实在发生的情况，所以，我冒昧在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短文中，说这“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原来的设想就是这样。

毛主席实地考察了河南七里营，据报导，当时他在那里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好”这句话就这样传开了。

（六）一九五八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发表了《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我预先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章程》。这个《章程》做了不少“规定”，“公共食堂”就是其中之一。在是年，似乎是当时领导农村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持起草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记得，我没有参这个决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七）毛主席历来提倡各种工作都要实事求是，进行调查研究，从试点开始，稳步前进，有错必改。

可是，当时从河南一个省区、一个乡区“大办公社”开始，许多地方却不顾条件，不顾工作的具体步骤，也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竞放“高产卫星”，以至竟有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说法。“大炼钢铁”在有些地方也变成了行动。头脑发热，违背了毛主席平日教导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一个时候，（当然，时间短），到河南参观那个首先开始大办“公社”的各地人络绎不绝，大家看的集中地点是早已收割的那块“高产”麦地。麦早已收光了，可是听说不少的参观热心家却在那块地里挖了一把土带回去，作为纪念，或想作为回去的“科学的试验”物。（据调查：那块所“特型高产的麦地是那几个爱作假的人在夜里大家睡觉的时候，搬运其他许多田亩的大量麦子堆

上去的。）

这样的事，从好的方面说，这是中国农民“穷则思变”的一种主观梦想，如马克思所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十页。由于毛主席的教导，中国农民这种主观梦想很快地觉醒过来了。

（八）本来我没有想到查岈山去参观。因为毛主席要我同张春桥去一趟，就去了。当然，受到当地一些招待。好像我对公社提的意见，是从那些干部对我们伙食的“特优”招待开的。前面说的那块所谓特型“高产”麦田，似乎是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位老头子泄露出来的。那里的干部可能觉到我的态度并不如他们原来设想的那样高兴。他们一个负责人曾经问我有什么意见，是否有不对之处。当然，那时我还能说出什么。没有几天，毛主席来电话指示：不要住太久。我们一些人在短短几天就离开了。到县那天晚上，一个会计（似乎很年青）说了这样一件事：“我们这里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汉交换机器，这是‘产品交换’。到郑州后，我和同去的人（有张春）见毛主席，当还没有正式汇报之前，作为闲聊，我说了那会计把“沙子换机器叫做‘产品交换’一事。毛主席一听，就马上插上我的话，说，“你主张‘产品交换’，不要‘商品交换’呢？

其实，这是毛主席一时误会了。当时还没有开始正式汇报有，我在那瞬间只是闲说那个“会计”的说法，并没有表示我主张什么。当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我也看过 但是，对这样极端复杂的问题，直到现在，我顶多只能开始进幼稚园长期刻苦学习，当时怎么可能信口开河呢。不知怎样的，毛主席当时对我说的话竟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参加郑州

会议的人那传遍了，我觉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确处于很狼狈的状态。有两位地方同志或许知道我当时说话的经过，到我的住处看一下我，那时真使我感激不尽。

（九）在四清运动期间，毛主席提议一些文化人去参加四清工作，接触实际。一位同志的身体不算好，我建议他到天津郊区去，以便有时可进市休息。天津市同志派他到就近小站地区的一个生产队。管理那个地区的人可能出自好意，派他住在一个女生产队长的家里。一回，我去看他，建议他移到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以便能了解情况，因为住在女生产队长那里，群众说话或有顾虑。这位同志接受我的意见，迁移到一个普通农民家。当时同他一起下乡的，还有别的同志。这样一个变动，当地群众反响很快。记得，大家说那个女生产队长一家过得很舒服，就小孩玩的东西也够像个小杂货店，打碎一个又换一个。她是靠上头有一个干部支撑她的。她每次到天津市，也是住在普通农民住不起的饭店……等等。后来四清运动波及小站地区其他的点，包括小站市区。天津市有几位同志也来参加了，如王亢之（市委宣传部长）、江枫（市公安局长），并对群众举发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对。以上说的两个同志，在“文革”中，被江青一个有密切来往的女人（叫王曼恬）逼得自杀（王亢之），或长期监禁而死（江枫）。有一年，我到天津去，顺便看着小站个别地点，打听一下原来这个“女队长”的情况，据说，四清后劳动还不错。当然，四清运动是为要人学好，或许这样的结果是不错的。

事情已过得很久，毛主席对小站地区的“四清”是否有评论，我不记得了。

前些年份，我在秦城禁中看报，知道原来那位“女队长”已

提升，她对记者说，她是被“国民党特务”陈伯达迫害的。

（十）我到过北京郊区多次（地点叫什么，我已忘记了），只是接触个别社员，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活动。记得到一农家，看到屋前屋后，地是荒废的，我建议可以种些蔬菜、庄稼。那老汉问：可以吗。我回答：可以，并没有取消自留地。我也建议：养猪有根多好处，比如增加肥料，可以养。

（十一）因为年已久远，我又衰老，承垂问，拉杂写些。如所记有欠实之处，或自己护短，请原谅！

陈伯达记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四日

补记：

一九六一年，在广州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八十条》，是征得毛主席同意，由我起草的。起草后，我到些乡村询问群众关于取消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家热烈地赞成完全取消。后来即根据各地的经验，对取消公共食堂问题作了完全取消的新肯定。这个修改过的六十条也是毛主席要我同各地方同志商议后写的。

周杨同志去小站的经过及其他

毛主席希望周扬同志下去，因为毛主席从来就是希望搞文化工作的同志多接触群众。毛主席距我那次谈话，无非就是希望很殷切，所以说了些厉害的话，例如："如不肯下去，可以派军队让地下去。"我觉得，这类话完全是一片好意。随后周扬到了天津。我跟天津市委说，周扬同志身体不好，给他找一个近郊的地方，有事进城方便些。

周扬同志去了小站以后，我去看他。那时他是住在支部书记那里。记得我跟他建议过，可以不住在支部书记家，接触群众要方便些。周扬同志同意，搬了另一个地方。群众陆续发表了对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问题逐渐激化。一次公开斗争的场合，我去看过。这个支部书记是个女的，丈夫当供销合作社干部（会计?）。两个劳动力都是干部。据老农民跟我说过：她丈夫很精，"天上多少星星，他都数的出来"。她的小孩也很特殊。农民说，他们的玩具可以随便打掉，再要一个。在四清运动中，农民在她原来的住宅中搞一个展览，我未去看，后来听说，四周群众去看的人很多，按乡下人的眼光，说是像个"小百货商店"。

不久以前看报，知她翻了案，集体对她退赔，现在还欠她四千多元（这当然是四清时的货币）。他们两个人都是乡下人，都是"干部"，都没有劳动，哪里来追么多钱。就这点看，我想，这整个案件未必完全错误。农民建议逮捕她的丈夫，我同意了。这是我的责任。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会议后。我到天津，跟公安局长和王亢之同志商量，她的丈夫和小站被关的一个人，因为

都搞过展览会，教育过群众，可以放了，让他们回去过年。我说，对被关的人，对群众，两面都应做工作，主要是说服群众，放了好。结果，大家都同意放了。我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抓人容易，放人难。

“文化革命”初期，北京有些学生跑到那里，调查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九七〇年，我到过这乡村，据群众说，当时学生到这里是说要到井岗山，路上经过。农民倒是很清楚的，说，下面就是海，要到井岗山，怎样到了这地方来？好像学生见过张风琴一次。农民把学生说了一顿，学生就走了。这些都是我一九七〇年往常地听说的。

在四清时，毛主席很关心小站的问题，在“文化革命”中，我看到了小站的材料，就送毛主席。送去以后，毛主席就批了那么一句。有人到福建我的家乡，是另一回事。

给毛主席送的材料，是在文化革命初期，别人采访的记述。送这个材料，仅因为毛主席知道过这里四清的情况，同“二月事件”无关。

我与刘少奇关系的几点情况

鉴于团结的重要，文革前多次想扭转毛主席对刘的印象。有一事大家都不知道，在四清运动时，我曾向毛主席建议，由刘总管四清运动，毛主席表示高兴、同意，说等一下就找他谈。不知谈了没有，谈的结果如何，或许谈的结果并不好。我就不再问，不知道了。在搞“二十三条”时，矛盾突出了，这事见我前交代。在文革时间，一般说来，我是在路线问题谈，力求不越出这点。

农村问题，(是批山西省委的)

通货问题，物价问题。

他是同毛主席直接谈的，并没有同我谈过。我知道，是毛主席跟我谈的。解放初期，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料理国民党遗下财经的烂摊，通货、物价的稳定，是一件很大的事。可能是一九五一年，毛主席要我去参加陈云同志主持财经的会议，给我很大的教育，使我知道通货、物价这样的事，我说过要稳定货币、物价，毛主席就指定我搞一个文件，xxx 参加过起草，还有 XXX 也参加。

刘少奇同志曾经有个时候要我给他推荐秘书。我知道毛主席已积了一些不同意见，可能在文化革命前，我在闲谈中说过，我可以去给他当秘书，在文革时，江青就说，我愿意去当少奇同志的秘书，不愿意当毛主席的秘书了。

五二年？到杭州要我同去，我因工作未能去。

五三至五四年？要我一块参加组织部会议，我也同时在搞一件事，也没有去。

总理如在，很多事会给我证明，现在哪里去找呢？因此，这样下去，我对自己并不存在希望，只好不明不白死去。

档案是好事，是可靠的，但是，问题并不是所存的档案能够完全说明。否则，就不需要历史科学了。

文革小组成立的经过

“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文革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所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在顾问，江青列在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姐的成员，写成名单交给周总理。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仪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工作组问题

《人民日报》工作组事，记得是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宣布的，但却没有就《人民日报》工作问题向邓小平同志请示，自己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第一篇出场的文字，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没有认真请示，甚至没有向宣布派《人民日报》工作组的邓小平同志认真招呼声，造成一个又一个的大恶果。

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我凭毛主席在杭州说过的有时间限制的一句话，在中央会议上，不尊重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慎重态度和正确意见，也不把当时工作组的问题一分为二，也不求先搞搞试点再看看，要求一风吹散。这是时特大的问题，是关系化革命健康发展的问题，是关怀党的领导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同“十年浩劫”有关的问题。

关于制止武斗的一些情况

“文化革命”初期，一次在北京政协礼堂，看到一个工厂被打的女工，遍体血痕，我当即起草一个“禁止私设公堂、拘留所”的布告，并请当时北京市的负责人来，把这布告印出张贴。随后，这布告经过毛主席批准，转发全国。

有几晚，我约当时北京市负责人到北京市区附近一些地方，发现有私设公堂和拘所的，立即解散这些私设公堂和拘所，立即放人。我还到过一些学校、机关处理这类事件。

记不清有批从哪里来的人，占了宣传部，我即加驱逐，限即搬出。

天津两派大学生对打，断水断电，中央接到电报，叫我去解决，我一到津，就到当场，解除这个令人悲痛的局面。

……这些事已经过十四、五年，未曾记忆，事车有些也可能没有记清，但因兴起诉书所列内容有关，只得如实作一些说明。

文革小组二三事

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是学习，是到些学校、工厂、或一些居民地点，看看谈谈。根据毛主席规定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知道哪里有打砸抢的事，我是要去制止的。有时染了一些打人的武器回来，为的是要告诉小组的人知道有这些事，江青便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开，搞这些干什么。”

我的最大罪恶，首先是极端狂妄他提所谓路线问题。这是永远无法宽恕的。同时，我又胡乱随便接见一些人，乱说瞎说，让一些同志蒙受大难，这也是无法宽恕的。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姐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他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能，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可能是在一九六八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江青提

出："你要迫死《人民日报》一个文艺编辑"。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主意，怎么会是我要迫死他？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我说："我没有看到那个绝命书。"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为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怨。我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藉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这些事只是当时听说，没有做任何事实查对。）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藉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踏。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合，另住其他地方。我同XX（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

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座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

“我看不起你!”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人民日报》有一个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张家片,又找到江青一张,就拼凑成一块。据说,这是那个文艺编辑授意的。我原不知道这事,有一次开会后听说过,也没有再去询问。但在一次会议时,江青忽然对这张像片事发言,大意是:“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XXX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迫死他,谁敢给你说?”江青大声说:“你造谣!”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放,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怀,谁理她呀?”这样的话,后来我也跟别人说过。

此事之后,我才通过宣传联络员去了解这张像片的制作的经过,也才看到这张假照片。

“学术权威”问题

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很落后，所谓“学术权威”，在资产阶级营垒里面，寥寥可数。在历史学、哲学、文艺这些学科的学者中间，解放时，有的逃跑了（如胡适），有的是爱国者，留下来了（例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金岳霖、朱光潜、俞平伯等人）。其中，陈垣以垂暮之年入党，感谢他送我一套著作，我曾去看过他一次。其他各位对党的态度也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文化革命时受攻击最激烈并且一开始就成为箭靶的是吴晗，或许吴晗在明史方面可算是一个权威吧（我看过他在解放前关于明史的若干文字）。他写过一本《朱元璋传》，我略略翻过一下，进城后，他跟我说，那是仿我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而写的（不知是否他的客气）。我说，这两人不能并提，朱元璋是农民战争领袖，并且是民族英雄。以后见到他，他说，那本传记已改写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看过他写的东西，他的《海瑞罢官》，书没有看过，上演的戏也未看过。翦伯赞是以左翼历史家为人知晓的，我进城以后，看过他的一本论文集，当他面谈过一点意见（好像未对别人说过），以后在历史学会上开过会，他的所谓“让步政策”或许是受我的影响吧。在“文化革命”中，我对这些“权威”没有作过任何分析，提出对他们的政策。

吴晗和翦伯选受到的遭遇，都是应由我负责的。因为不论如何，那种斗争方式是可以避免的。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的感觉，权威远较历史学方面多得多了，并且不少是真正杰出的权威。但是，对这方面，我连初等小

学生的知识都没有。因为完全无知，好像没有和那一个直接冲突，有些来往时也只能完全执弟子礼，自愧连当他们的学生也还不够（如同叶渚沛）。

“文革”中若干重要事情

一、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会议上的讲话，横蛮无理。或许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在会上讲话。他这个讲话，是由康生自动负责整理的。康生整理后，我也许看过，是否改过，已记得，请参考原件。

二、林彪一九六六年十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记得他是按稿子念的。我原来不知道他讲话，他讲完后，我给毛主席说过，我的讲话可以不要，毛主席说：“还是要。”

林彪的讲稿，或许会后，他叫叶群给我看过，我也可能改过，因为记不清楚，请参考原件。

三、在去年审查我的过程中，谢谢审查同志接受我的请求，让我看了一本《文件汇编》，因为审讯同志问我替林彪写过哪些讲话，所以我把那本所载的林彪的讲话都看了一下，我当时觉得，那些讲话都不是我写的。或许我看得不够仔细。

四、戚本禹给林彪整理他讲所谓绝对权威的讲稿，久放在我那里，后来戚本禹发了脾气，我才能看。有没有改了什么、也记不得了。

五、有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文革小组”的生活：当北大“校文革”给红旗杂志发出“勒令”的时候，江、王、关、戚并不要求开会讨论一下，就一致签字接受“勒合”，而后才送到我这里。当然，他们以为既是“多数”，一切都要按他们的意志进行。

六、我的记忆，专案的事，都是江青总管，有时，她在形式

上也开过一些会，但她说了算。我管的陆定一的案子，就是江青分配的。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都是康生专管，除了江青对他有发言权外，据我了解，没有人知道他在那些机构中组们非为一些什么。

七、对刘少奇同志所加的三顶帽子，记得是我在大会堂小礼堂一个群众会议上听江青公开宣布的，这对我太突然，使我感到惊惶，因为在此以前，这是从来没有在中央会议上议过、听过的。

八、包围中南海事件中，对刘少奇同志的种种侮辱、迫害的罪恶行动，这是在一九七〇年上半年听一位领导同志给我说的。

九、林彪老婆开始因部队中有人失踪的事，到过我那里多次。后来又藉口要我写的字，从江青那里转回时，路过我住处，多次无聊索取。她看出我跟江青的矛盾，经常给我翻来履去打电话谈江青，几乎成了她的习惯。

十、我到河北，是中央派遣的，但到那那时，突然来了叶群电话，说有事，要我回。回来时，江青说她的秘书要陷害她（其实是另有一个同名江青的事），已隔离他。她这个秘书和关锋（可能是关锋介绍的）、戚本禹有关怀，她表示同意关禁戚本禹，要我跟康生谈一下。但康生因社会知道戚本禹是江青的亲信人物，反对逮捕。

逮捕戚本禹，是在怀仁堂开会时，在会上谈过，而后请人打电话要他到怀仁堂门口，由我和杨成武同志宣布的。

十一、一九七〇年我出去，是在会上请示毛主席批准的。出去前，又请示周恩来总理。原先计划，先到天津，再到石家庄，这路线是同周总理商定的。后来发展到了其他地方（山西、内

蒙)、没有预先请示，是犯了罪的。

十二、我在天津时，接到叶群电话，说我出去了，林彪不知道。她说，宪法事，选集事，都还要搞，你这样出去，是否好。电话中我顺便说一件事，我听天津造船工人说，山海关水深，如开港，可以容纳几十万吨油船，因此，去山海关看过。在九届二中全会时，林彪拿这事批我一顿，说我尽瞎说，瞎指挥，说什么现在世界的船最大不过十五、六万吨，我却说可以建容纳几十万吨船的港。

十三、我请《解放军报》人员解决江青的女儿在军报工作的事，又请给解决她的党籍问题，这是违反党纪军纪的。

十四、九大后，江、张、姚忽然要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通知学习江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此件送到我这里后，我没有签字，但写了一句，大意是：凡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文件，都要由毛主席批。

十五、九大后，江、张、姚都到上海住了一个时候。他们回来，江青就针对《人民日报》关于团结的社论发了攻势，大意是说，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讲团结就是在掩盖分裂。位些都使人感到，他们进行的作乱并未结束。

十六、姚文元在参加中央会议时，把他从上海带来的文章清样交给我，文中内容荒谬（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事，现在一时又记不起来了)。姚文元听了我当场看时对他说的话，就没有发表。

不久，《红旗》送来另一篇清样，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江青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由于中央领导同志提意见，才临时匆匆改版。

十七、大约在所谓杨、余、傅事件之后，所谓“誓死保卫江

青”的标语满天飞的时候，我接到过一封信，说“江青有功，可作国家主席”。我接到这个信件后，很惊讶，等于接受了一个很大的警告，深觉在江青问题上，自己对国家所负的责任是非常严重的。一晚，想找叶群谈，叶群藉口林彪不在，拒绝谈。

十八、我只参加过康生主持的“宪法草案”会议一次。在这次会上，改动了原有的“序言”。吴法宪在会上大发脾气，我那时正到厕所。散会时，我问吴法宪，吴法宪说了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话。我平常虽然不喜欢文人卖弄“天才”，可是一听到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却认为可以藉此事攻击他。

十八、张春桥在一次会议说，“千万不能说中国革命有什么胜利”，散会后，我曾用电话跟中央领导同志谈过，认为张春桥的意见同托派当时对苏联的谬论完全一样。后又把这个意见用电话告诉吴法宪和叶群。

我所知道的“杨、余、傅事件”

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我急切要找鲁迅信件原稿的下落。文革中，戚本禹把鲁迅信件原稿弄到文革小组，我毫不知道，知道后，我急于把它找出。听说原来有个保管的，是个家在四川的战士，已经回去，我给扬成武同志打电话，请把那位同志找来，杨成武同志可能把这件事通知傅崇碧同志。傅崇碧同志找到了人，了解书信原稿的具体下落，就到钓鱼台，给我打电话，说要进来。我那天不在，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文艺革命。由于认为卫戍区司令员要进来，当然可以，表示同意。傅崇碧同志进去后，把信件原稿找出来。这当然是傅崇碧同志辛苦工作的成就。可是，江青藉此，叫做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兴了大案，同时，“誓死保卫江青”的口号也在街上出现了。这个案子，牵连到杨成武同志。因为是我那里的工作同志同意傅崇碧同志进去的，江青通知我：“照顾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再在钓鱼台了”。因此，我叫他到政研室工作。

在江青对这个事件的暗中策划的时候，叶群一次到江青那里，我刚在楼下，看到她在楼边经过，正要回去，我叫她就在楼下会客室谈谈。我问杨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她装听不懂，没有回答。大概她把这事告诉江青，随后江青问我：“为什么要敲诈叶群。后来温玉成到卫戍区当司令员，还没有就职，她就写信送到卫戍区，作为试探。卫戍区的人不知道温玉成当了司令员，没有收信，她就说，这是抵制，说明传碧在卫戍区有很大力量。

这里所说，就是我所了解的“杨、余、傅事件”的经过。

答复关于解学恭的调查提纲

(一)

“解学恭先后给你写信和报告有多少?”这话我已想了几乎二天二夜，还想不出他写的字是怎样的？这似可证明我没有收到他的“信或报告”。或许他写过信和报告给我，不过我没有过目，就荒谬地存了起来。我的确记不起解学恭的字样是怎样的。如果我记得，又想隐瞒，就咒该万死！

当然，在这期间，我多次接触过解学恭。在没有见过他之前，似乎听说过他的名字，好像他是在内蒙工作。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万晓唐凰同志自杀。万晓唐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革命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招待，文化革命后听到他自杀，我很苦闷，有一回，还作了调查，没有调查出什么眉目。因为我不想当那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义不言中了。此事陶铸同志也在，我还要陶铸同志帮腔。后来听说有人批评我，听说有同志还帮我说话，说我就要到天津去重新学习。但是，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解学恭到天津的经过，的确是这样。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经认得解学恭。以后解决各省问题，中央会议在周总理的具体主持下，做了分工，由我参予天津事，在决定主要人选时，我根据中央的意

见，就提解学恭。这就是“提纲”上所问“解学恭投靠你干了哪些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开始。我觉得解学恭还不至于那样愚蠢，以为我这个人有什么本事、能力或有什么势力是可投靠的。

江青插进一脚，解学恭应该是会觉得到的。在北京解决天津问题的会议上，戚本禹来了，一晚，在会上发号施令，要大家把材料都送给他。这时我就离开会场，在会场外找人聊（注：聊）天，让戚本禹去发威风去。

有一次天津的大学生两派互斗，一派被围，断水断电，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我马上到天津去解决，我当天晚上到天津就到现场，解决了一方之围，但我被另一方层层包围，几乎要被挤死，幸而解放军给我救急，找到一个吉普车，把我推进车上，匆匆开出，这是我经常感念伟大的解放军的。

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份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王亢之回到天津即自杀，江枫被禁闭。这就是解学恭那时“投靠”我的结局。

（二）

在上述的一些事发生以前，一回，解学恭到钓鱼台找我，讲了天津两派斗争的情形。他大意说过：张淮三在万晓唐死后叫天津全市的人都给带孝。万晓唐跟我很好，我却觉得不必要这样做。随着张淮三凭他原来久在天津的关系，组织一些什么大队，阻碍联合。我是反对两派互斗的，我听说后，问是否可以暂时让张淮三离开天津，使工作方便些（我是急于求成的），解学恭说，

可以派飞机让他到内蒙去。我又提了要防备他自杀等等。过些时候，他说，张到内蒙后，吃过安眠药，因被发觉，没有发生事故。从此，我就放心，也没有再问此。在与解学恭谈此事时，我的确提过，因为张淮三为万晓唐布置那样大的丧事，并不恰当，我说，这可叫“万张集团”，后来天津就这样叫开了。此事我应负罪责。要怎样处置我，我是无话可说的。

（三）

解学恭“诬蔑周总理”，我还是从这次交给我这个提纲第一次知道的。解学恭以前跟我有什么来往时，他没有诬蔑过周总理，从来没有什么坏话牵连过周总理。我觉得他是拥护周总理的。当他来京搬家去津时，我在大会堂见过他，我的印象，他当时是向周总理报告工作的。这是就九大二中全会以前根据我的感觉说的，九大二中全会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九大二中全会以后，我仅从一份报纸知道，天津极度诋毁我。不论工业和农业，都编得有骂我的一套，当然，“唯生产力论”、专家冶厂，……这些罪都不得免。我在秦城时，有时情遏不住自己，对哨兵说过，把我送到天津去轮流批斗，让群众把我打死好了。这个宣传“责任”，当然是解学恭负责，但我并不想责备他什么。四人帮倒后，好像天津也宣传一阵，凡足说起四人帮作恶的事，总把我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我想在那初时似乎也还是解学恭当权的。随后，解学恭垮了，罪恶我又和他联在一起，又要承担解学恭的罪过，总之，不论怎样，我在文革初期带过什么帽子，有什么罪我就都应有份，是摆脱不了的。

“解学恭是怎样迫害干部的？”我没具体研究，和我有关系的

所谓“万张集团”追件事，我也只笼统地晓得。至于要我交待解学恭制造“天津海关潜伏特嫌集团的罪行”，我现在还不知道此案，待将来往生命还可能的时候，在有机会了解此案的时候，我是会交待的。

“交待解学恭与你勾结，迫害黄敬、吴砚农、杨亦周同志的罪行”，这比较困难，因为寅敬同志过去和我很好，单就一九三七年在日寇炮火连天时，他帮我带孩子，一直送我到西安，我一想起这事就感激不尽。三反五反时，我到天津，他一直陪伴我。一九五七年他不幸在南方逝世。吴砚农，我有一次住天津，记得我是同他住并排的房子，好家是去看过他一次，谈什么话，并没有留下印象。杨亦周，我闻过名，但好像没有见过面。我跟解学恭勾结，迫害他们，似乎比较困难，不是不想交待。

一九八一年三月

"文革"中江青等人的一些情况

一、我至少有两次听到江青公开大肆吹嘘姚文元，说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的文字工作，背着北京，做的是秘密工作。这是真的。因为在姚文元的文字发表之前，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好像别人都不知道。

二、据江青说，开始她并不和姚文元见面，只是通过张春桥和姚联系。她和姚文元见面，是较后的事。

江青替姚吹嘘，同时是为自己吹嘘，表明姚的文字内容就是她授意的。开始吹嘘姚文元时候，总会有点顾虑，因为姚文元的父亲是著名的叛徒、特务。当姚蓬子死后，吹嘘就变得大胆，说姚跟姚篷子没有什么关系，姚是他母亲带的。

三、江青在上海住的时候，她同人们的来往，我没有打听过。在柯庆施死前，我只隐约知道他们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设想的许多事，主要是文艺界的，但这并不排斥他们议论其他问题。

四、江青对自己的问题非常多疑。在"文化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箱关于她的材料没有及时给她送来，她就怀疑张春桥阴谋要搞她。她在一次北京群众大会上着重大讲上海的工作不一定比北京好。风声一传，上海出现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记得姚文元这时在北京，也说，他跟张春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久，她的一箱材料拿到了。张春桥也来北京。这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重新结合起来，张春桥对江青亦步亦趋，江青的任何话对他们都是"圣旨"。

五、上海安亭事件，虽然当时王洪文等来北京未成，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消极作用，使张春桥获得同王洪文结合的机会、搞了一个所谓“一月风暴”，夺得上海的权力。随后张春桥又把王洪文引到北京。我有一回在大会堂，走路时碰到他们，张春桥介绍了一下。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的种种情况，我完全不知道。估计江青必然会同他见面。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一个比较大的批判我的会上，张春桥同王洪文坐得很近，我离他们不远，我听到张春桥轻声跟王洪文说道：“他（指我）那次给上海写的那张传单见，就是唯生产力论。”王洪文笑着点头。

七、在“文化革命”中，一回在碰头会上，江青突然问我是否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北方局整过她。

八、王、关、戚倒台后，江青自称她有功，她不是从此收敛些，而是更狂妄了。据一位同志给我说过，她自称她保护了“中央二个常委”。当然，这是很可笑的。

九、自此，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说明，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但过了不久，不知怎样的，她跟她的女儿也搞翻了。

十、当江青造成上述局面，在她女儿还未离开的时候，曾公开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说陈伯达已不住钓鱼台，已不要她们母女，她们愿意回中南海给毛主席当秘书。

十一、江青（忘记是在什么场合）讲，毛主席说过（大意）：“给陈伯达很多工作位子，他都没有拿住……”。毛主席这话看得很透彻，文革小组的例子，是最后的一个证明。

有关华北问题的几点答复

对所问的事，根据记忆所及，记述如下：

一、我在九届二中会议华北组会上的发言，事先没有告诉李雪峰；发言后未曾与李雪峰谈发简报的事；华北组的简报发表以前，我不曾看过改过。

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和李雪峰到河北地区，是中央决定的(这个决定，记得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在怀仁堂做出的，由康生通知华北军区，要他同去，是因为内定李雪峰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要他在群众场合露露面，找机会让他讲讲话。回来后，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过。

三、一九七〇年夏天，经过毛主席批准，并得到周总理同意，出去走走。先到天津，因为对天津钢厂发生矿产来源问题，到唐山，又到石家庄，谈了河北铁矿争，最后到包头，也因为包头有富铁矿。因为是铁矿。因为到的地方，都是当时华北地区，所以也谈了华北各省一些经全越过“学习”的界线，大有“大官出差”的狂妄姿态、大出其丑、可谓毫不知耻了。

记得我回北京后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个简单的当然也是谬误的报告。

从九大到庐山会议

一

（第一部份原稿缺失——编者）

二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是我列在前面，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也写一部份。记得是写完一部份，先送一部份。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成为中央正式准备的稿子，即林彪在九大所念的稿子。当中央讨论他们稿子的时候，虽然我准备的稿子因被认为是“唯生产力论”，已算流产，但我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我的劈头第一句话：“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我以前写的一篇东西，说这件事时，漏掉张春桥这一句话，现补上）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到卫生间去，出来后，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周恩来同志在九大前后和我交换过意见，虽然当时在会上只得沉默，但他是拒绝张

春桥的谬论的。我在这个讨论会上所说的话，给我惹起很大的后果。不管康生、四人帮自己算不算伯恩斯坦，但伯恩斯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早已臭不可闻，他们必然要找机会对我提出这个比拟进行报复，而且报复我的，当然也不会只一个“爱恩斯坦”的名义问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给一个什么文艺团体“命名”，要登报大书此事，周恩来同志退回这个稿子。九大结束后，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

三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注：称）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以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套中央的领导大权的。在庐山上，那时全会还未开，一次，周

恩来同志路过我住处，曾经交谈过江青对毛主席的关系。我说：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她曾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围，她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可找两个看护料理毛主席的生活。第二次，在西柏坡，有一回我去找毛主席，他刚不在，江青又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到旁的地方去。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我去看毛主席时，他也刚不在，江青又说，她要离开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听到我说北京西山的事，他即接着说，“西山这一回，我是知道的，是毛主席要我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我想，江青说的她要离开毛主席这三次，都是在革命的关头上。在北京西山时，虽然北京已解放，但战争还在继续，要事如麻，她却用她一人的事干扰毛主席，说这是“忠于毛主席”，不是太过荒唐吗？周恩来同志排除她的干扰，把她送去莫斯科，是英明的。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一回事。她想的，就是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特别是在九大后，林彪和江青在夺权问题上竞走。

四

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前，从迹象看，林彪、江青都各有自己夺权的积极活动，其具体事，我也说不清楚。一个时候，我先向毛主席请示，到华北各地看看，毛主席同意。我向恩来同志报告，恩来问我走的路向，我跟他说了，恩来同志同意我的走法。关于这一行，后来康生、四人帮当做我的一个大罪行。其实，在遵守纪律上，我并没有错误。走了几个地方后，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简略的报告，并没有什么阴谋。华北几个地方，在“文革”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叫我过问其事，随后我去

青春，同时，也检查我自己，包括自己所作所为的错误之处，论纪律，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康生、四人帮除了加大罪于我外，还无缘无故地因我而牵累到一些好同志，使一些好同志分别受了大苦。

五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我记忆所及：康生主持的原来所拟的序言，不提人民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好像只是“文革”才开始中国的革命。虽然后来经会上讨论，做了点缀，但没有必要的份量。讨论会在怀仁堂开。一天晚上，我正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了桌子。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发火了。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虽然我在过去似乎没有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说毛主席是“天才”并不错。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事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早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我确实不能料到，怀仁堂这件插话，在庐山会议上，竟变成一件特大的大灾。所谓“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想，这当然是康生、张春桥向毛主席谈起吴法宪在怀仁堂的好大声音和拍桌子的事，因为吴法宪原是“空军司令”，所以设想他能够“炸平庐山”，而我却什么都没有，都不会，怎样能炸平一个什么呢？

六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他人，都往另一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原定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林彪抢先说话，据所记忆，是关于宪草里面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以及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后，康生便向我挑战，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会散以后，我觉得要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离开林彪的住处，以下就是“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住处，我顺便过了一下，他们问我可否要找一些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话。我答应给找。我答应这事，实在很鲁莽，因为上山时候，我并没有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好像是仅带了《列宁选集》，不记得还带有几本什么书，所以临时托同去的人在山上找了一些，当夜就用电话将找到的一条一条告诉吴法宪，随后又另抄一份，第二天在会上给汪东兴。

我是属于华北小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类似“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样的句子，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其他同志”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这句家是汪东兴说的。

七

有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些人开会（我想，这是毛主席要他召集的），参加的除了当时的“申委办事组”的人以外，还有汪东

兴和我。林彪和汪东兴在会上对我提了一些二十年前古怪的事，后来，全会上也有人当成大问题，再次提出这些事。

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叫我跟他到莫斯科。在那里，谈判的进程较慢，我因为第一个大孩子（已去世，当时他正在苏联学习）久不见，接他在大使馆暂住，我也去陪他住两天。这事成为我的疑案。那时我国的驻苏大使是王稼祥同志；大使馆是我们自己的大使馆，又没有大使馆外的什么外国人来往；我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件事能构成一个什么嫌疑。

在全会上或各小组会议上（不论哪一种会议，我都已不能参加），有人特别提到我去看“罂粟花”的事，我只好把这件事说一说。有一晚，苏联联络人费德林（能够说中国话），请我去看芭蕾舞剧。虽然我过去往苏联读过书，可是没有看过这样剧种，既然主人好意，我向毛主席说，就去了。事情已过几十年，我人又老朽，不复甚记忆，不过依稀记得：剧本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过的。因此，在剧场中，我一直纳闷，没有鼓掌。费德林几次劝我鼓，我还是没有鼓。直到剧已终了，在观众的热烈鼓掌声中，特别是观众表示对中国来客的热情，为中苏的友谊，为感谢观众的盛意，我也对着观众鼓了。剧场指挥老在剧终后找谈话，询问意见，我坦率地说，根据我是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觉得剧情不像。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回到住所后，见毛主席，说了经过和自己的意见。看“红罂粟花”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当我知道庐山会议谈这件事，认为我看这戏有罪，这真令我无话可说了。

实际上，这回要我去看这个剧，不过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作为请毛主席去看先做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毛

主席看，但毛主席已从我这里知道剧情，就没有去。

这件小事，在庐山会议上，成了我有罪的大事。

事情的经过和我的了解，我认为毛主席并没有怪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秘密”。当中苏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对我说，你现在要参观一些什么，你就去看。现在想起的，我除了看列宁集体农庄外，还到列宁晚年养病和逝世的地方，并且按照引路者的请求，写下自己的感想。这些参观，都预先请示毛主席，后来又对他报告过。

因为和庐山会议讨论的事有关，所以说了上面这些。

八

江青、张春桥见了《华北组简报》，开始似乎有点恐慌，因为他们惯于“揪人”，现在却有人也想把他们“揪出来”。在揪人正盛时，我曾对康生说，我过去不知道有“揪”字和“砸”字，《康熙字典》没有这两字。康生于是把《康熙字典》中这两个字翻出来，证明我的无知。现在“揪”字却要安在江青、康生等人的头上了，真是中国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

我估计，谁提议“揪出来”，他们是会知道的。郭玉峰参加华北组，他经常往康生、费轶欧那里走，康、曹同江、张又经常在一起，或许他们就是从郭玉峰口里知道的吧。

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我的记忆，江、张都未到，因为他们先向毛主席告状，殆已获得胜利，他们可不必出席，而李至峰和我虽出席，却足处在被告的地位。那位提出“揪出来”的，也没有事，当时他出席或不出席，我记不清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参加过毛主席那里的会。

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去见过周恩来同志。记得他说："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

在那次严重的会议之后，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见，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了。"

毛主席这句话，对我来说，含有一段很难过的历史。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解放初，最早我住党校，随后毛主席要叫我练习做点事，要我任中南海，因为打电话到党校找我来一趟，至少要半个钟头，很不方便。住中南海后，见面倒是很方便，而且我总是随找随到。但是，"文革"后，江青干涉我见毛主席的事，说我每次说话太久。过了一段时间，恰巧刘淑晏（陈伯达之妻——编者）没有经过我同意，我又住在钓鱼台，她就自己经过公安部在住处做错一件事（查一个脚印，本来是无聊事，如果我先知道，我想是不会让做的），事后谢富治向江青汇报，江青于是就对我下逐客令，"中南海是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不能再在中南海住了，要搬出去。"本来我因为书堆得很多，又想有时找一些同志一起做点事较方便，所以请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帮找一个地方，即新建胡同，江青下令把我赶出中南海，于是全家就在新建胡同安置了。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等等，有几次打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独求见毛主席了。这样的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当然，对党

来说，远不过是极微小的事，但毛主席这时见面劈头一句话就提“两年不见”的问题，可见江青的挑拨离间手段所起的作用。

毛主席谈话简短，他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于是，我去找江青。到庐山后，江青两次打电话要我到她那里去，我没去；后来又来电话说要来我这里，她也未来。所以一直未见面。这次去她那里，她就说：“稀客！稀客！”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要我跟她到康生那里。

到康生那里，先看到曹轶欧，她不招呼。进到康生住的大房子，张春桥、姚文元已先在，可见他们经常在一起论事。谈话开始了，记得江青第一句话：“你们藉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以后各人相继轰，原话现在记不起了。

九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记得周恩来同志沉默寡言，发言的是康生。我在庐山的检讨发言内容，基本上是康生授意的。

在我做检讨的会上，我非常感谢恩来同志，他代我念那篇由康生授意而写就的稿子。会毕，就在会场上，我高兴他去感谢周恩来同志。康生也在那里，恩来同志说，你感谢康生好了。康生很冷淡的回答：“不要怕丑”。

检讨会的第二天，我觉得事情完了，回家务农好了。一想，心为之一宽。可能是恩来同志不放心，叫了大夫、护士来看。我要出去往庐山上一游，请他们和做招待工作的同志一块走，遇到风景好处，同大家照了几张相片。照相后，又继续游山玩水 这

一天是从到庐山后最高兴的。

但是，风声所播，就兴尽悲来了。流传的话就是："陈伯达并没有沉痛，还去游山玩水哩。"于是，会又开了。这时我已不能参加任何大会小会，但似乎简报还看得见。有些关于我的事，是从简报上看到的。

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曾经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并指出例子。

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竟这样维护我，更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十

回北京后，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

打电话给康生，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周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到郊外散步，为着排遣自己的苦闷。随后，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将到，怕遇见外国人。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两位帮我管文件的工作同志调走了，说是要他们上学习班。有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附带管药的同志：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我的确不想坐自己的监，当逮捕送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过：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下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经往上报告，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人），睡着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的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漫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怀来说，在三十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错误，即使弄过一点材料，写过一点东西，也毛病百出，经不起严格审查，这只能说明我的无能。我真正感到求知之难。学生不成器，是不能怪到先生的。

我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当然，历史上任何天才人物，即使是无产阶级

的伟大人物，也不可能不会有某些缺点或错误。略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似乎可以使人略知这类问题的一二。

还有，也不能认为某人原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断言他的娘胎已定，无论如何后来就再不能当马克思主义者了，无论什么情况，都只能永远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是这样看人。试举梅林为例。梅林本来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却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同他通的信，对他表现了很大热情。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曾经对梅林这样称许过："梅林不但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康生、四人帮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正确，同时，认为别人如果同他们不一致，就有滔天大罪，祸延三代，他们臾竟有没有一点点的"马克思主义"呢？

前面我所说的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事，除了杯彪的罪恶行为制造的以外，我认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是极重要的制造者。毛主席当时年事已高，接触别人又常常被阻碍。

我属无知无能之辈，即使能经常见到毛主席，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主要的是毛主席同广大同志的接触已遇到江青等的破坏，处事就很难免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之处。伟大英明如毛主席，在晚年遇到这样的挫折，使人对四人帮感到痛恨之极。凡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罪过同我的工作有关，我承担责任的事，我自己完全承担起来，不能移罪给别人，更不能对毛主席推卸责任，否则我就罪上加罪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

附录一

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事。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

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向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附录二

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关于批判陈伯达的部份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他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九届二中全会忆记

一、先从宪草的一次会议进起。那次宪草是康生负责主持的，其中主要角色，或许足张春桥吧。提交中央会议上讨论时，我也说过错误的意见，记得是两件：1、赞成设主席；2、主张自留地另搞一个比较详细的条例（我是拥护有自留他的），宪草可不写。第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否定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对的，因为宪草写上自留地有很大影响和作用。

毛主席回北京时，曾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要我参加宪草。因此，这一次在怀仁堂开会，要我参加，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也算是最后一次宪草会议。开始讨论《序言》。康生原稿或许还可以找到。我依稀的记忆是：原稿几乎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仅谈文化革命，这次会议对此做了一些改动。原稿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次会议也添上了。在会议一个期间，我到卫生间，听到吴法宪的声音很大，或许可以说是声震屋瓦吧。我回到会议上时，已归乎平静。会议散后，我留下问吴法宪，吴法宪说了和张春桥争论天才问题的经过。我当时是同情吴法宪的。

二、在这次会议后，我对宪草加过几点条文，送周总理。有一次，我感到康生说的话中对此事很不高兴（他的原话我已忘记），因为我是送给周总理，而不是送给他。

三、到庐山下飞机时，我告诉吴法宪，这次宪草修改后，主席如批发，就很好，不要再提什么意见了。记得，后来吴、邱、

李几个人到过我那住处一次，我又再重复这个话。

四、江青有两次给我打电话，要我去看她，我都未去。有一次，江又来电话，说她要来，恰巧叶群在，叶群知道江青要来就走了。江青的电话是打给警卫人员的，或许江青已从电话上知道叶群在，就没有来。

五、叶群到过我那里只是一次，好像她说江青曾讲过关于国家主席的一些什么话，我现在已记不清楚她说，江青曾说过，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我当时听了以后，回答叶群说：没有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吧?〕记得，秦城审讯我时，江青叫我写下书面认罪，要我承认罪上加罪。

六、有一次，一位同志（他是好意的，跟林彪没有关系）来电话说，他还未见到毛主席，不过，有些人主张还要国家主席，你可否准备一下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我把第一次宪法有关主席的条文照抄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从没有给谁看过。后来在毛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我因毛主席还是反对设国家主席，就把这个抄样毁了。

七、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时，谈到设国家主席问题，我是表示赞成的，并表示赞成毛主席担任。毛主席反履地说明了他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的道理，（很明白，从此，就结束了这个问题。〕

八、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的那天，原来的日程是康生讲宪草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这个日程，但他忽然抢先讲话，态度完全反常。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因此，对他这个讲话，我觉得非常突然，是曾有怀疑的。

九、我散会后应该直接到毛主席处，请问对林彪讲话所疑之处，但却匆匆赶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

因为在开会前，他们曾经在一起），林彪谎骗我，我愚蠢至极，竟信不疑，犯了大罪。

十、从林彪那里出来后，我又到林彪下面几个人住处，议论江青一阵，接受了邱会作要我找天才记录的意见。因林彪的讲话很乱，我给叶群打电话，要她把林彪讲话记录给我整理，当然是想给林彪抹粉，表现我当时还没有看出林彪的反革命野心。

十一、回到住处，就在带去的几本书中找来找去，找到一条，便给打一吹电话，此事我做的太荒唐，害己害人，毛主席对我的最严厉批评和教育，是非常中肯的。

十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不知是谁布置的，听录音时，我的座位和汪东兴靠近。我把已经找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天才语录汇在一起交汪，记得对他说过，可以考虑打印一

十三、我去参加华北小组的讨论，对林彪的讲话表示拥护。小组把我说的，也有别人说的，作成了简报，对所拾的人没有明言，但措辞尖锐。这个简报发出之前，我并未看过，但追源祸始，我不能卸脱罪责。

十四、在华北小组的记录发出后，毛主席召集会表示盛怒。第二天，我请求见毛主席。见毛主席时，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责备我许久不找他谈话。我愿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十五、离开毛主席时，毛主席说，可以找一些人谈谈，还有，他问过我，李纳现在在哪里？因此，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就到江青住处。到庐山后，这是第一次到她那里，因此，她故意

嘲笑地说：稀客，稀客。接着，她说，我们到康生那里去。我只好随她走，一到，看见张春桥、姚文元都早在那里了。江青劈劈啪啪骂起来："你们名义上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是要推翻林副主席……"。张春桥说，"你为什么不见毛主席？你藉口徐业夫同志的电话不好联系，有什么不好联系呢"。姚文元骂我，为启蒙运动事，我让他坐等了好久……总之，一个接一个，各有各的骂法。回到我的住处，我又打电话找林彪处那几个人，我给他们说，我见了毛主席，他让我找别人谈谈，所以找他们来。江青他们那些话，我当时曾简单记下几句，也给他们看了。

十六、有一次，叶群来电话，要我到林彪那里做检讨。我在电话上说，我请求到下面（地方）去。参加林彪召集这个会的，除了住在他下面的几个人外，还有江东兴。

十七、随后，由周总理、康生帮助我做检讨。康生提的意见特多，我都记录下来。不管康生自己的存意怎样，但我当时接受，便算是我的，我有责任反省。但当时提到陈毅同志，我觉得非常突然，，这的确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当时我勉强记下来，一直对这事深感痛苦，我认为那些话是不应继续保存，应该删去。

十八、做检讨后，第二天我出去看庐山山水。这件事引起了很不好的结果，因为这好像我对自己罪行的检讨并不觉得沉痛。

我谈到毛主席严厉批评我的文章。对这一个沉重的批评，我当时向党表示接受，愿意重新学习，更新自己。当然，我这个表示并不保刻，只算是一个简单的开始。各小组同志的严峻批评，对我的教育也是很大的，将影响我的有生之年。记得平常我根少做记录，但就我所在的华北小组，我曾努力把同志们的批评记录下来。直到现在我还多少记得一些非常中肯的批评，例如，批评

我没有什么实际（实践），脑子里尽是“封、资、修”，等等。这些都永远足我应该记住的座右铭。

对自己问题的几点归纳

一、对“二月提纲”，看后有意见，不论对或不对，本来都可以按照党的正常生活的途径，向有关同志提出商量或建议，供有关同志审查。不是这样做，相反，却对整个文件采取否定的做法。这是我的第一个罪行。

二、当时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小组成员，除康生外，是文化活动中的一时之秀，竟完全抛开，另用一些没有经过考验的投机冒险分子。这是我的第二个罪行。

三、所谓新的“文革小组”，成了供林彪、江青、康生作为篡党夺权之用的工具。在名义上，我是这个小姐的“组长”。

四、这个“小组”不会没有矛盾，但不能在原则上公开划清界线，而是混在一块，给党和国家带来大灾难。

五、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上批评我：“不干，也不辞职。”这证明我的无原则性，也说明

校正一份材料

“陈建相”应写作陈健相。

“王通”是在国民党监狱时用的名字。

解放前北京有个“陈伯达医院”。还是偶然同名的。

破四旧问题：“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应该说，毛主席有这种思想。

第四页说主席打电话的事，这是指发表北大那张大字报。

第五页“提出辞织”，应是想提出辞职，没有直接提出来，而是想调工作到地方上去，实际就是辞掉中央各项职务。这个想法请陶铸同志替我在会上说过。

第六页说“几本美国小说”，应是看过外国小说。

第八页：“九大报告是我同张春桥看的”，这句话记错了。九大报告是张春桥搞的，我没有参加。

第六次、第二页

“我曾向刘少奇同志说过，我想推辞组长这个职务”，应该是向陶铸同志说过。在庐山会议以后几年，我向刘少奇同志说过，我想退休。少奇同志很厉害地批评我：“你入党的时候没有想到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吗？”这一批评触动了我，就没有再提。但是，在文化革命前，我确实想过要辞职，要退休，退休后到处走走……

关于起诉书第（二）项

起诉书（2）项说："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我认为我没有参加这样的"决定"。我能够想得起来的，这事件是江青同戚本禹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假藉一个学院的事策划煽动起来的。在文化革命中，我一直反对"揪""砸"这两件事。我说，我不知道、不认得这两个字，连《康熙字典》也未必有，康生就去搬《康熙字典》来，证明他的知识广博。甚至"批斗"二字，我也是以后处理一个地方的事才注意到，有人给我解释，所谓"批斗"就是批评不够，还要加上"斗争"，我才知道这两个字的来由。江青唯恐天下不乱，而且认为什么都还乱得不够。她要搞起什么乱来，并不需要什么"决定"。文革小组虽做了一个"文革小组工作必须要在中央常委领导下"的决定，但她仅视为空文，并不受限制，她想搞什么还是要搞什么。所谓"批斗刘少奇"，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举以下几例，用以说明我对这事件的态度。

第一、有一晚上，我接到毛主席秘书徐业夫的电话，说北大公开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要我去处理，我认为，毛主席的意思，是不赞成这篇文字的。我当即遵命到北大，看到墙上果然贴有这张大字报。我责问北大聂元梓，你们发表这个大字报，来源是甚么，是从《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得来的？聂元梓无辞以对，当场即扯下这张"大字报"。当时有学生说，可以请刘少奇来学校看看大字报。我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事情根多，没有工夫来看你们的大字报。你们有意见，可以写送给他。我"刘是

国家主席，这件事，很清楚地表示我当时尊重刘少奇同志的国家主席的地位。在这次同学生谈话中，有人提到郭沫若同志，我也是为他辩护的。

第二，有一晚上，我到府右街，当时江青、戚本禹策动一大批乌合之人包围中南海，我一到府右街就问：你们来干什么？他们答："揪刘"。我说，"揪什么？都回去！"从街口一直到西门，我一直这样叫喊。开始人们不认得我，后来不晓得怎样知道了，当天晚上就大量撤退。韩爱晶、蒯大富从大礼堂出来后，我让他们同行，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对待这样事件。第二天，我又专到中南海西边北边看，有几处还残留着，我叫他们马上收拾走，并看着收拾。

第三，《红旗》杂志接到北大校文革勒令公布发表《黑修养》的经过。在这文件上签署同意的，有江青、王力、关键、戚本禹；送到我这里，我特别写了三个大字："不同意"。王力、关锋、戚本禹怂恿江青来问我，我说，一个党刊接受一个学校团体的"勒令"，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江青理屈，不能置辞。但第二天她又给我送关于整我一些所谓材料。所谓北大勒令这事正式公开了文革小组的分裂，再不能虚伪地共居下去。所谓"王关戚"案件就是这样逐步在社会上揭露出来的，这至少是文革小组的一个重要转折，虚伪的面纱被拆开了。第四，四人帮倒后，我在秦城时，那时报纸还没有登载对刘少奇同志的事要重新审查，对此，我当然毫无所知。我曾经对那里和我谈话的同志，提出刘少奇同志是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我的意思当然认为是党内问题。我还同一位工作人员和哨兵说，王光美应当放，所说的罪状是没有根据的。

以上这些，我的态度，是可以找到人证的。我对刘少奇同志犯罪，我从来不加掩讳。但是事情的发展，毕竟有这些事情存在。在定罪时，我请求考虑。

我当时挂了那样的名义，没有解职，又没有辞职，不能制止这事件的发生，当然也有责任，谨听党和国家的裁决。

关于“批斗刘少奇”问题的材料补正和更正

一、我负有重大责任。在当时我担负的名义下，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一切重大的事故，我都负有责任。

二、发动和决定可能不是一回事。“发动批斗刘少奇”，我记得是江青和戚本禹利用一个什么学院的事煽动起来的。但我不能避开而且必须承担这个有关的决定的主要责任。

三、不论我对于“批斗刘少奇”的具体情节发展如何，我这个责任是不会变更的。

四、我过去写的材料，同现在写的这个材料抵触的，一概以现在写的这个材料为准。

陈伯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陈晓农按：

关于“批斗刘少奇”一案的具体情况，我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曾当面询问过陈伯达。

现将谈话情况记述如下：

陈晓农：

审判时，电视转播曾显示过一次那份“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显示的时间很短暂。我

当时看得比较仔细，那个报告的原文并没有“批斗刘少奇”的字样。报告是说要求在中央

办公厅机要局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提出“让刘少奇到会，听取群众批

判发言”。究竟因为什么你在报告上加了“邓陶夫妇”几个字？结果报上就宣传成你把报

告要求批斗刘少奇一人，变成要求批斗“刘邓陶夫妇”六个人。

陈伯达：

当时我加了几个字，是不愿意让刘少奇突出。那时我觉得刘少奇处境不好，单独出席这样的会，对他的压力大，多几个人出席，压力轻些。让他们亲属出席，原是想亲属在场，他们能得些照顾。刘少奇后来就是因为王光美被搞走，两个人分开了，才绝食的。我当时没有批斗他们的意思。

陈晓农：

也许因为报告原文并没有“批斗”这个词，后来正式出版的所有关于这次审判的书，

都没有收录这份报告的原文或引用报告的原话。

陈伯达：

报告上写的是通知到会，我在法庭上看了报告也觉得不解，曾问过：“哦，通知他们

到会有罪啊？”

陈晓农：

从事情的前后经过看，报告上没有用“批斗”这个词，但戚本禹在具体负责开这个会时，会上有些人却把刘少奇叫到前面站着，把会开成了一个“批斗会”。记得当年的大字报曾叙述过会上的情况，我当时在街上看到过这样的大字报，现在还有些印

象。

陈伯达：

戚本禹怎么主持的会，我就不清楚了。那时候有很多事，他们并没有让我知道。

关于冀东问题致特别法庭

我读了这段文字，非常震动和痛苦。是年是月，党中央派我到唐山，处理当地的斗争、纠纷问题，我到后辜负党中央的委托，违背毛主席历来的教训，下车伊始，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不力求实事求是，结果造成了这样大的苦难。我在说话中所说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对他们工作的经历完全无知，仅在最近审查我的工作过程中，才重新知道他们的名字。我这样处理事件，正如盲人骑瞎马，首先陷自己于死地。

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后，我对冀东发生的一切情况，便不再知晓。我没有得到任何报告、任何询问，没有人给我吐露一句发生的问题，连一个案子的信息也毫无所闻。即然我说过起诉书中所列的话，我就要完全承担责任。我现在谨声明，如果八万四千余人的冤案中，还有，特别是二千九百五十五人的惨死案中，如果我在其时的事先、事中、事后，曾经知道不论或多或生或者仅得之听闻或传说，我竟若无其事，我竟视同儿戏，或像隔江观火，没有动心，没有视同父母兄弟姊妹正在遭到大难，没有挺身而出，没有用自己去代替被拘囚者，去代替死者，而只以自己且做一官为得计，那末，我现在坠亨填补我这个罪恶。我现在身体还在，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力量，但将这残余身体填补我这个罪恶，算是献出我的全部。如果死者有灵，将不会过于怪我的。

陈伯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份陈述提纲

分裂

初、中、后

经验的教育不一：一方面逐步暴露，一方面逐步觉悟，矛盾越来越深，中途分裂，分裂也是逐步的，最后断裂了。在分裂中，因为敌人两方假象不一，也有上当时候（比如庐山），但混杂局面还是终于肃清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林谋杀案，上海准备暴动案，都是在我进监狱后发生的。

开始裂痕，我病中，病后出院，裂痕越深越大。所有禁止私设公堂，告工农书，都是在江青不参加的情况下写的，山西武斗的问题，哥达纲领问题（谁敢说“反革命”？我敢说，就是反革命）。在北京，我自己到些私设拘留所，马上解散。

开头：徐业夫的电话是重大的契机

组长问题：谈多次

在这以前，我没有同任何人谈文化革命问题，因为我多年所关心的、不是这个。

厚今薄古也可以算楔子，但我自己刹车了，从此以后，我记得没有再谈文化学术问题。，毛主席给我送过几次报刊，但我都没有触及。

致胡耀邦等领导人的信

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并请转呈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叶剑英委员长，党中央各领导同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领导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各领导同志：

我读了《判决书》，接受对我的判决，根据自己的记忆，就事论事，对三个案子，有点说明。

（一）在办公厅工作人员要求批斗刘少奇向志的一个信件上，我上了江青、戚本禹摆布的圈套，附和他们写了狂妄的话，判决书定我的罪，我是接受的。我只请求考虑我在事前事后的一些行动，即一个人犯罪有不同的历程。例如：

在这事之前，我在一个晚上奉毛主席令，到过北京大学，要聂元梓撕下毛土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我对那些要求刘少奇同志去看他们的大字报的人，作了这样回答：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有很多事，没有工夫来看大字报，你们有什么要同他说，可以写信。我承认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从来没有改过口。

在批斗这事发生后，我曾去轰散包围中南海的那些乌合之众。有一晚，我从府右街口到西门，一直批斥那些叫嚷什么“揪刘”的人，要他们立即收拾回去。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办公厅一个工作人员，要求办公厅人员乘势继续把余留的人赶走。也就在这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中南海的周围，看到另一个西门，还有一批人，我要他们立即走，，在北边，也还有几堆人，我也要求他们立即走，并看他们收拾东西走。

我对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同意北大学生对《红旗》杂志所下的要求宣布“《黑修养》发表的经过”的“勒令”，作了严正的抵制，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根据上述各项，可见我在事前事后的这些行动，同附和江青、戚本禹所写的批语截然不一样。第一，我本来没有批斗刘少奇同志的动机。第二，存所谓“批斗”以后，我连续轰散那些所谓批斗的乌合之众。第三，我对所谓“勒令”的斗争。

（二）我接陆案时，写过那三条，我认罪，并向陆定一同志请罪。

但是，第一，陆案不是我组织起来的，我去时，早已有人工作。第二，我去过几次，写过那三条；让关锋去一次，他狂妄胡来，没有再叫他去。第三，后来我辞卸这个管案的责任，并告诉谢富治：我不管这个案子。谢富治也接了。第四，以后种种，并没有人告诉我。

诬陷陆定一同志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这类话，我确不记得说过这类的我开头的，后来的事，我也是不知道的。我跟陆定一同志个人间有什么冤仇呢？我认为一件也没有；但一旦被迫放在那个案件上，就完全失去冷静的头脑，做出极荒唐的事。幸而陆定一同志还活着，我仅向他请罪，他认为应当怎样处罚我，我都接受。

（3）关于唐山案件，我犯的罪是，第一，去唐山时没有先进行调查，听了片面之辞，就说了那几句罪恶的话，虽然，那几句话还是有所限制的，只说是“可能”什么，没有把问题定死，把问题完全说成定局。但那几句话终被坏人或派性所利用，把我那几句话作为藉口，把各种罪都堆在这上面来。最近在报上还看到

有这样的话；“……‘肃反动流派’这是陈伯达强加给河北省群众组织的罪名，仅这一案，有两万人被重点批斗，五千户被抄家，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我不知道我说过什么“肃反动流派”。又说：“反革命分子陈伯达表过态，说老冀东党‘可能是国民党在起作用，叛徒在起作用’，从而扩大了迫害范围……使几万名干部、群众受到迫害，数以千计的人被迫害致死”。按照报上所写，我简直真不知死所。第二，我那几句话被人利用，变成那样大的案件，实实在在，一直到我受审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第三，在唐山几天（已不记得有几天，可能只有两三天），除了那次罪恶的讲话以外，主要的是，可以说是我当时主要的行动：1、接着我去看矿派大楼，跟各层楼的学生谈话，认为他们很好，楼里也并没有什么危险物；2、开过一次两派联合的大会，我建议两派和好，那时已快到新年，我建议在过年时，举行联欢大会，联合表演节目，记得两派都有根好的表示；3、我又去看过主持农场的老人和他的夫人，谈话是和好的。第四，我离开唐山后，就盲目片面乐观，没有再去调查，也没有接到关于唐山的什么消息。

近一年来，感谢审查同志，使我开始知道我的刚到时那些话所连带引起的罪恶后果，心情极端沉痛。我除接受《判决书》的判决外，谨将事实陈列如上，供领导参考。

《判决书》将成为我活时的教材。在终审之后，上面陈述的事，本来不应该提起。感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叶剑英委员长和各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黄火青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执行党中央的治病救人的伟大政策，体现我国民族的好生之德的优良传统，故敢请考虑给予我这个残废之身、垂死之年的人

个无损于无产阶级法制的可能出路。

历史的教训是深重的。坐狱，判决，这些教育对我很好，是需要的。重要的是引为严重的历史教训，可能对人会有更重要的作用。毛主席总结整风问题时，认为“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毛主席是伟大的人物，记得他在“七大”时，也说他是有错误的。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想，他会做更深刻的自我批评。在运动中，人不容易控制自己。像我这样极渺小极渺小的人，在文化革命中，多次像处在发疯的时刻，例如，在这三个案中，也就是发疯时刻的发作。发疯时刻过了，人平静下来，归于正常，就会有忏悔，认过，认罪。因此毛主席说的“惩前毖后，消病救人”，终究是个真理。或许我的罪恶深重，不严重处分，不能平民愤，这也是可能的。但党的大恩大德，终于使我敢上此书，陈些微情。且在“文化革命”发生不久，我在事实上即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又元等人分裂，我久被江青、康生打击，请求考虑此段历史，是否有可宽恕之处。

谨上此书，不胜翘望待命之至！

此致

敬礼！　　陈伯达谨上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在此信手稿背面，还写有下列话：

可能性不是现实性。现在冀东有人把我说的一个“可能”变成无恶不包。

致叶剑英的信

崇高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

听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我的罪行的判决，我认为是得当的，我不但表示接受，而且必须用这个《判决书》来教育自己，使自己逐步符合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我从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关禁时起，将近十一年，实在年龄已达七十七岁。现在刑期定为十八年，除开已关禁的期间，须继续服刑七、八年，那时我将达八十五岁左右，可能早不存人世，即使能活到那时候，也已变成废物，对社会将毫无用处。我一直私自妄想在死以前，能够努力在伟大的党领导下，在一个人民团体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做点无害于人民的工作来弥补我的罪恶。如果关禁到那时候，事实上将完全不可能。

我国人民在世界上是著名宽厚优容的人民，能够不咎既往，使罪人获得自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的时候，即释放溥仪及国民党战犯，效果是良好的。我国对知识分子采取宽大兼容、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很成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胆大妄为，使党的政策遇到了破坏，写了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没想到使许多知识分子蒙受了灾难，我这个罪恶，应该遭到惩罚，而且还在继续受惩罚。这个惩罚是合理的，应该的。我愿意让为我所伤害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我有这点反省。

我将永远地、永远地是全国大小知识分子的小学生，想从他们的知识海洋中多少吸取一点一滴，来教育自己，为的要向人民还债。

因此，我敢于向崇高的叶委员长和叶委员长的同事们，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庭的同事们，请求考虑我的刑期是否可予缩短，是否可以使用特赦，使我有希望做点赎罪的事。

我平素敬仰叶委员长的宽宏大度，叶委员长在多年前曾对海外侨胞说过，“爱国不分先后”，此语经常萦绕于我的脑际，敢谨上此信，诚不胜待命之至！疯了，精

散稿拾零

一

在延安时，毛主席住枣园，我也住枣园。毛主席去重庆后，刘少奇同志住枣园主持工作，我没有什么可做，随后即搬到杨家岭。当我还在枣园时，在路上散步，碰到少奇同志，我说，希望毛主席快回来，少奇同志认为不那么容易。东北问题，他对苏联军队的作用比较乐观。这些跟我的想法不一样。这些都是在路上边走边谈的。

二

苏联占领捷克，我写过一篇文章，送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写了批语，认为可用，要提到会上讨论一下。在一晚总理主持的会上，我把这篇东西提出讨论，江青马上说，文章一点不精彩。于是这文章就没有讨论，没有发表。江青总以为她可以冒充毛主席的话，这样，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这类事是不少的。

三

江青对周总理大不敬。例如下面一件事：

山西有个“武斗组织”，军队派去小部队，派一个吃掉一个。我给林彪打过电话，要派大部队，林彪把我的电话记录稿送毛主席，毛主席送给周总理。在开会时，周总理没有给江青看，直接交给在场的军队同志。江青竟然胁迫周总理要写个检讨材料。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在一次会上宣布，写任何检讨都要作废。

四

有一次，李富春同志主持的外交部群众会，周总理有病，他那里的工作人员要我去参加，我给江青招呼，她反对去，她既是反对陈毅同志，也反对周总理。

五

有一次，周总理找李富春同志到钓鱼台开会，我看到李富春同志，和他攀谈起来，可是，江青却找周总理另谈，反对李富春参加会议。李富春走了。我问，为什么来了又去？江青说，个人感情归个人感情。

六

周总理很辛苦组织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作为一种尝试。江青阻止戚本禹、关锋、王力同我一块去参加，以表示她对周总理的抵制。我再三叫戚本禹、关锋同我一块去，他们不动，我就自己去了。

七

一回，姚文元来，说，江青的意思，在“文革”碰头会上，对周总理，“文革”几个人要抱成一团。姚文元在我这里碰了钉子以后，江青果然就和康生抱成一团了。

八

毛主席的护士、医生都去看护她（指江青——编者），护士还是从工厂调回来的。这样闹来闹去，闹了一个时候，她说毛主

席的医生要谋害她，护士也赶跑了。……毛主席很生气，有一回在会上说，准备在一个比较大的会上公开批评她。

九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

一、江青指责我不如谢富治；

二、我听说有一回王力到主席处，估计（并没有人告诉我他做什么去）他是去报告的；

三、一个深晚，康生来说过毛主席在中央开会的情况；

四、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华北小组会上质问我为什么“二月”那晚上没有到会？谴责过我一片（注：遍）话。

十

因为我住的地方在修理，暂时在中南海借住一下。江青忽然来，说他们搞的关于批启蒙运动的东西，毛主席说他不看，要她找我。此事当晚我向周总理报告过。后来我匆忙集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这类问题的一些言论，送毛主席、周总理，并分送当时参加中央会议的人。此后，江青不再对我谈启蒙运动的事。

编者著：

江青此举的意图是想把陈伯达置于受批判的位置，因为陈伯达是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文化界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在新启蒙运动中超过重要作用的还有张中府、艾思奇等人。

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具体情况，可参看何干之著《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一九三七年版）、（美）微拉·施瓦支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五章、李新等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等有关著作。

一篇未写完的手稿

有一回，公安局派人来问，你说你曾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是什么“好事”？

我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在狱门前，看守的同志正开一个牢门要我进去，我不肯进去时说的。

“你是否说，你救过毛主席？”

“是的。是这样说的。这事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说起这事，是求毛主席能够宽恕我，不要让我进监牢。”

“事情的经过是：毛主席从晋绥到阜平后，周恩来同志和他离别要到西柏坡的时候，他告诉恩来同志，到西柏坡可告我，要我陪他到苏联。恩来同志把此意告我，我即到阜平。我到阜平后，没有和毛主席住在一处，是分开住的。

陈晓农按：

陈伯达曾在河北阜平救护毛泽东一事的具体经过是：

毛泽东、周恩来等转战陕北后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当时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但苏联认为中国共产党难以完全获胜，并基于外交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诺，示意中共在军事上对国民党让步。为此，毛泽东拟亲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指示周恩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时通知陈伯达来阜平，做赴苏准备。陈随即到达阜平。五月中旬一天，国民党北平驻军飞机突然飞临阜平，该日清晨，陈伯达听到飞机声响，感到情况异常，立即奔赴毛泽东住处，路遇仓惶躲避飞机的江青，急问：“主席在哪里？”江答：“还在屋里，我说不动他。”陈伯达

迅速赶到毛泽东屋内，劝道："敌机就在头顶上，很危险，要赶快走！"毛泽东听陈语气紧迫，马上与警卫人员离开住房。转过一道院墙后，毛泽东听警卫人员说陈还未走，回头喊陈。陈伯达为转移飞机视线，立在院中未动，连声催毛快走。持毛等行至安全处，飞机已向下俯冲，陈忽急跑出院外卧倒，炸弹已命中院子，弹片将住房玻璃全部击碎。毛泽东即日移居花山村，二十六日离阜平到达平山县西柏坡村。

此次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后来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孟宪德、刘从文向北平密报所致。孟宪德曾任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烟厂副经理，刘从文是军区司令部伙房司事务长。关于毛泽东准备赴苏一事，后因苏联方面提出派米高杨来华会谈而停止。毛泽东去世后，曾有回忆录说，在阜平遭轰炸的危机时刻，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和东谋长用担架将毛泽东抬离住房的。对这一说法，陈伯达说，这是不真实的，一、他到毛主席住处时，除有几位警卫人员外，未见到其他人；二、当时情况很紧急，来不及找担架，而且毛主席并非不能走路之人，坐担架岂不耽误时间；三、那位司令员和参谋长当时都不年轻，而毛主席身高体胖，并非此二人所能抬得动的。陈伯达认为，出现此一不合情理的说法，意在改变他曾救护过毛主席的事实。

对阜平发生的事，一九八三年十月北京市公安局曾奉上级指示派二位同志向陈伯达本人做详细了解，陈伯达口头陈述了事情经过，但没有写下文字材料。一九八八年九月，　伯达健康状况恶化，我建议他写下一份文字材料，他吃力地写了几行，就接到立刻住院的通知，于是放下了笔，数月后，他病情虽有缓解，但没有再续写此事。这就是《一篇未写完的手稿》的来历。

学术部分

文艺评论类

《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

——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石头记》(即通称《红楼梦》中的主人公之一林黛玉，曾说过如下的话：

“我是一无所有……”

“我……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第四十五回)

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是巡监御史，这是封建社会里的一件肥差事，又曾是“世禄之家”(第二回)。林如海死后，林家并没有什么别人继承他的遗产，为什么他的女儿变成“一无所有”呢？怎样来判别这一段公案呢？

根据道光王辰年间王希廉的评刻本，第七十二回中，贾连为着对付太监“张口千两”的勒索，同凤姐谈过：“这会子冉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注：抄自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子的校记〕。这个秘密当是贾连在林如海死后拿得他遗下的一注大财产。

第十四回写道：“林姑老爷（林如海）是九月初三巳时没的。二爷（即贾链）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的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回来。”

第十六回写道：“且喜贾连与黛玉回来，先遣人来报信，明

日就可到家了。”

“连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

从这些话看，除了贾连带来林黛玉，再没有写出还带来些什么，真家是两手空空的。

第十六回又写道：“贾腔自回家见过众人，回至房中，止值凤姐事繁，无片刻闲空，见贾连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因房内别无外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挥尘，不知可赐光让领否？贾连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

当贾连归来的时候，这一对贾府总管家夫妇彼此何等得意，何等“大喜”！

亲戚死了，哪里来的“大喜”？不在别的，只大青在贾连已经窃夺了林家的全部遗产。因此，这一对总管家夫妇才在“房内别无外人”之时，流露了自己的“喜”不自禁之态。

这一对总管家夫妇对人讳莫如深的秘密，也骗过那个当时还年幼而又娇养成长的林黛玉小姐。即使林黛玉知道这件事，因为“寄人篱下”，也只得忍气吞声，“纵有许多照应，自己无处不要留心”。（第八十七回）

林黛玉知道她“这里并没亲人”。（第九十八回）

在林黛玉要断气时，连林黛玉的丫头紫鹃也说：“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这几天连一个人间的也没有”。（第九十七回）

贾府总管人凤姐是做出这样决定的：“现放着天配的姻缘，何用别处去找？”

“一个宝玉，一个金锁”。（第八十四回）

真正叫做门当户对。

一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小姐，终归打败了一个“一无所有”的林家小姐。正是《石头记》中这个主要婚事的结局，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财产关系和婚姻关系的联系。

正如恩格斯所说，婚事“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的”。

恩格斯接着说：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一九八二年初

求知难

纪 训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过《西游记》一书："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俱记天竺途中遇难之事，九老者究也，物极于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难。"《西游记》所写的，"就是他（唐僧）灾难的簿子。"

引人兴趣的，是书中特写的美猴王——当他和群猴"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不胜欢乐的时光，他说："我虽在欢喜之时，却有点远虑，故此烦恼。"众猴听他一片话后，"俱以无常为虑"。原来孙悟空们梦想的，是一个这样的世境："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口更无些子争竞，时价乎平。不会机谋巧算，役荣辱，恬淡延生。"这是一群小生产者梦想的天国。从这点出发，孙倍空逐渐生出力量。他见"东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大显明"，将床铺摇响，大喊道："天光了！天光了！起耶！"

孙悟空跪在他最早的祖师榻前要求学道，他听到他祖师觉来自吟："难！难！难！"自从他一心一意求道，也自己说过："这个却难！却难！"但当祖师一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叩头礼拜了。在玄奘西行之前，《西游记》就突出了孙悟空，而且特别点出"难"字，从而写出了这个战胜八十一难的主要主人仕的机智和无畏的勇士——大圣。

猪八戒人伙，和孙悟空不一样。特别是他认为自己在路上"身挑着重担，老大难挨！，想"养精神"。孙悟空批评他，说："……既是秉正沙门，须是要吃辛受苦，才做得徒弟"。八戒不易

接受孙悟空的告诫。一过什么富贵庄院，八戒便禁不住诱惑，“一似针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动了凡心”。孙悟空和猪八戒的矛盾，造成了八十一难中特大的悲剧。三打白骨精，由于八戒的调唆，胡说八道，使唐僧认定孙悟空只是一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是“歹人”，写了贬书，更二要他回去。这件事害了唐僧，苦了沙和尚，猪八戒自己也遭了惨败。直到后来八戒按照白马所设的计谋行事，加上自己“请将不如激将”的妙想，终于把孙悟空感动了。行者决心去拿此时唐僧们所遇到的妖精。在走过东洋大海时，行者“下海去净净身子”，用现代的用语来说，也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貌：”我自从回来，这几回弄得身上有些尿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八戒“于此始识得行音是片真心，更无他意”。

显然，西游记是把这一段事故的经历当成重大的转折来写的。这段经历说明：在极端困难的路程中，在自己的一伙人中，由于内部矛盾的过度激化，就会出现致命的悲剧。

唐僧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如来佛，总算达到西行的目的。

但是，希望带来了失望。

行老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折千磨，自东土拜到此地，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滩、伽叶招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教我们拿去，我们拿它去何用，望如来敕治！”

对行者这个责问，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的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渥，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地二生二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

说他们太卖贱了，教后代儿孙役残使用。你如今圭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捡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阿摊、伽叶“二尊者复颁众，到珍搂宝阁之下，仍向唐僧要些人事。三藏（即玄奘）无物奉承，即命沙憎取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令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老将此收下……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那阿摊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的路程中，在自己的一伙人中，由于内部矛盾的过度激化，就会出现致命的悲剧。

唐僧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如来佛，总算达到西行的目的。

但是，希望带来了失望。

行老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折千磨，自东土拜到此地，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滩、伽叶招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教我们拿去，我们拿它去何用，望如来敕治！”

对行者这个责问，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的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渥，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地二生二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太卖贱了，教后代儿孙役残使用。你如今圭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

经，每部中各捡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阿摊、伽叶“二尊者复颁众，到珍搂宝阁之下，仍向唐僧要些人事。三藏（即玄奘）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令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老将此收下……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那阿摊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柴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伽叶却才进合捡经，一一查与藏。三藏却叫：徒弟们，你们都好看看，莫似前番”。

这事是唐僧们原来没有想到的。

马克思的著名一段话：“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又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喙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佛教的发展也正昙这样。

取经联系到素取行贿，这件事已点出佛敖的发展同样属于富有阶级的宗教，曾是为奴隶主和封建主服务的宗教。当然，它跟赤裸裸的吃人肉的那些妖怪不同。在唐僧西行的路程中，那些妖怪总想拿唐僧们身上的肉去饱餐一顿，但幸亏齐天大圣出了大力，避免了被吃的灾难。

齐天大圣——这一个好赫赫的名字！他不只是“圣”，而且是“大圣”；不只是地上的圣，而且是天上的圣；不只是天上的圣，而且是和天一样大，一样高，一样并立的大圣。“在一个逃

又小天他中生活的小生产者反映出来的目高自大的面貌。在孤立的小生产者的周围，包围着很多同一模样的小生产者，因此，一个美猴王可以一下子变成千百个或千万个美猴王，就如他那根铁棒一样，可大可小，可粗可细，可长可短，有时可以”变做绣花针儿”。

一个小生产者也可能到处冲撞，也可以“大闹天宫”，因为财产不多，丢掉也不值得可惜；但又经常思念故乡，去时容易，回时也容易，例如，当唐僧在路上赶他走时，他就重新起“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的杂彩花旗，逍遥自在，乐业安居。小生产考平（各干各的，各顾各的，但在接触到共同利害的时候，也能成“一窝蜂”，也能在一定时候“齐齐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旧社会农村发生不同氏族大械斗的时候，就“这种情况。

美猴王有群猴和他在一起。他代表了群猴的利益。孙悟圭把花果山当做他的靠山，他的稳便的后方。

但他怎样又变成一个佛教徒呢?

小生产者具有两重性：有时可以这样，有时可以那样。任何宗教都信神。孙悟空原来信心的神，现在又信佛教的神，如鲁迅的解释，“释迦与老君同流”（《中国小说史略》）。这对小生产者来说，并不可怪。

小生产者从来没有，也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力量。这是一个类似“一盘散沙”的阶级。他们盼望的，正如孙悟空给一个庄上人家祝福的：“子孙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风调雨顺，岁岁雨顺风调”。孙悟空自许“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人金石无碍；水不能鸥，火能焚”，但他却不能向百姓做“年年成熟、

岁岁丰登”的许诺，他认为这是天赐的。

孙悟空那样相信自己上天下他的本事，却极端恐惧唐僧针对他所念的“紧箍咒”，因为唐僧一念这咒，对他的头脑引起不能忍受的痛苦。这是封建主用以约束小生产者——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智慧——的枷锁。孙悟空不能打碎这个枷锁，而只能乞求唐僧“莫念！莫念！”来暂且避免痛苦。在宣布他为“斗战胜佛”后，他才消除这个对他的经常的威胁。但这已不能算是“斗战胜佛”的胜利，而是表现他对佛教的无条件的屈服，即“斗战胜佛”变成了屈服佛。

唐僧、孙悟空经历的，是求佛道，求神道。求神道，所谓求神拜佛，——这是多么荒诞呵！《西游记》所写的，不过是一些骗人的神迹，一些荒诞的奇迹。《西游记》——仅仅是一堆幻景——幻想的幻景，幻景的幻想。但是，人类经历无知、愚蠢、迷信，到会有所知、会有所启发、会有某些清醒，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各国具体的历史来决定。有的由东向西走，有的由西向东走，结果会碰在一起。

唐僧们求佛道，求神道，也有可能带来他们没有意识到的另一种产品。

唐僧玄奘西行取经是实有其事的，经过很大的艰难，也实有其事的。但“孙悟空”、“猪八戒”等等，当然是虚构的，事实当然不是小说《西游记》所写的神奇古怪。中印佛教徒历代的往来，以及玄奘这次西行，对沟通中印的文化，扩大中国人的某些眼界，增加中国人的某些知识，起了它的作用。中国人有某些思想，是受到佛学的影响，而独立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说："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晚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自然辩护法》二〇一页）

《西游记》写道："一佛国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

无限大和无限小的对立统一：无限大在无限小中。无限小含有无限大。这或许可说是原始佛教徒的"天才的直觉的"原始辩护法的萌芽。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甚至背离最初出发的目的，经过这样那样的弯路，"山穷水尽疑无路"，而爬到求知的某些彼岸。不过，这种知，又往往是片面的，不全的。

"行动在先"。"原始为动"。如古代人说过，"人未有学善于而后嫁者也"。实践开辟着求知的道路。求知的过程，即在实践——首先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开知的眼界。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讲过："一位日本学者，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六百零五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六〇六种药品为止，……"。求知不会只是八十一难，而是如人们习惯说的，常常经过千杂万难，而且也会遭遇失败。求知，总是克服一件，又会遇到新的一件，随着历史的前进，将永无底止。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儒林外史》杂记

(一)

"……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却定的不好。将来读者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这段话是《儒林外史》的总楔子，隐括了全书。在吴敬梓笔下，封建社会中一些文人学士的形形色色，都显出了自己的原貌。

八股文选家马二先生说：

"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在世，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

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一个是从小当戏子（鲍文卿），一个是修补乐器的落魄秀才（倪老爹），一个是不小但也不算很大的官（向鼎），吴敬梓把他们之间的关怀看成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

吴敬梓写向鼎是这样地看待鲍文卿的："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在向鼎最后去看他这位朋友的时候，不想这位朋友"已做故人"，他"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恸哭了一场……，"并毫不含糊他为这个操"贱业"的人题了铭旌。在铭旌上，他题鲍文卿为"义民"，而自己则题是一个

“道台”，是他的老友。

这些善良人物也是为封建社会、封建阶级服务的，并且只有根据封建社会的结构，封建社会的国家制度，才能了解他们之间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丹·斯密曾把国王和他的文武官员以至各种文人、演员、魔术师、音乐师、歌唱家、舞蹈家列入为一类人。马克思对斯密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评价：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支配的资产阶级的语言。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官员、牧师等等，以及由这些职业引起的一切旧的意识形态阶层，他们的学者、学士、牧师，都在经济学上，和他们以及富有游情者们（地主和游情资本家）大群豢养的奴仆和小丑，被放在相同的位置。他们不过是公众的仆人，像别一些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是靠别人的勤劳的产品来生活，所以必须减少到必不可少的限度。……”

《儒林外史》所写的向鼎是封建社会中一个开明的官员，他把自己和鲍文卿看做“一类人”。向鼎对待鲍文卿那样真挚，生死无二，当然在于鲍文卿“与我有恩”。（注十四）但鲍文卿在向鼎面前，始终是“小的何等人，败与老爷施礼”的自卑态度。向鼎给他斟酒，“他跪在地下，断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坐。”“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他一厘也不敢受，说道：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小的乃是贱人，怎敢用朝廷的银子？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爷天恩，留小的一条拘命。”

鲍文卿谢绝向鼎给的银两，毋宁说这种谢绝表现了鲍文卿的

"高风亮节"，而他说的这些话，却活现了封建社会中一个未觉悟的农奴的灵魂。

鲍文卿因修补乐器的事，同倪老爹结成了深挚的友谊。在两人的接触中，倪老爹道出自己的身世："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如今做了二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藉这手艺糊口。"倪老爹又说："那四个儿子，我都因没有的吃用，卖在他州外府去了。""这一个小的，将来也留不住，也要卖与人去……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由于这一回谈话，倪老爹这个小的过继给鲍文卿，由鲍"抚养成人"。

落魄秀才倪老爹的身世和他的谈话，简直就是对八股文和所谓"举业"的否定。

（三）

吴敬梓是封建社会该时代的在野派。他憧憬于古代，却看不见将来。

《儒林外史》里那些大小名士想返回于他们所想像的古代的"礼乐"，并想由他们来演习一下这个"盛业"。

迟衡山说："而今读者的朋友，只不过讲举业，……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仲春，仲秋），用古礼乐致祭，藉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

《儒林外史》的所谓"礼乐"，不过是封建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精神生活。它是封建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

马克思说："由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首先将会生出社会的一定的结构，其次又会生出人对自然的一定的关怀。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则由这二者决定。人们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马克思对统治阶级中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断续作了说明："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它们的职能，都只有根据他们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理解。"

所以，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依随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礼乐"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变化的过程是：一种新的礼乐逐步代替另一种旧的礼乐。一种进步的、或较为进步的，逐步代替另一种落后的或停滞不前的。一种给人鼓舞，一种给人麻痹。一种反映新社会的新生和欢乐，一种反映旧社会的僵化和死亡。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着不同历史时代的"礼乐"——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在这里，是封建社会的存在决定封建时代的"礼乐"，而不是封建时代的"礼乐"决定封建社会的存在。

《儒林外史》中的"礼"所表现的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的形式，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表现在精神生活的一种规范化。

封建主颠倒了人和礼的关系，认为封建时代的人的关系是建立在封建时代的"礼"上面，而不是封建时代的"礼"建立在封建时代的人的关怀上面。封建主认为，要把封建时代的"礼"当成一种职能来学习。鲁国孟僖子将死，叫他的儿子去向孔子学"礼"，说："礼，人之干也，非礼无以立。"孔子和他的徒弟就经

常学礼；当孔子遇到患难的时候，还“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封建时代的“礼”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学派。一个学派排斥其他学派。齐国晏婴认为“礼可以为国”，“与天地并”。晏婴同孔子一样，把“礼”看成同天地并立的、主宰人的关系的、最高的神物。可是他认为孔子的礼节繁杂，“累世中能尽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不适宜在“细民”中提倡，因而排斥孔子在齐国做官。其实，“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本来是封建制度下一个森严的界限。

《儒林外史》中的名士们，大概是尊崇孔子的“正统”的吧，捧出一个“真儒”主祭泰伯祠。参加“大祭”的，连找来三十六人作“伴舞”的孩子们算在里面，通共不过七十六人。参加的人并不多，但不排斥人们观看。

《儒林外史》写了那许多看热闹的：

“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马二先生笑问：你们这是为什么事？众人都道：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听见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来看。”

可是，不管主祭的是“神圣临凡”也罢，观看的是“欢声雷动”也罢，以至“泰伯大祭的事，天下皆闻”也罢，并没有因此丝毫改变当时封建社会遵守的八股文和“举业”，没有“成就出些人才”，没有“助一助政教”，没有伤及封建社会制度的毫末。

“神圣临凡”的虞博士终于无可奈何地说：

“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

（四）

“有了钱，就是官”。

而社会的表现呢？

“始终还要从科甲出身。”万中书说。

“到底要从科甲出身。”施御史说。

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百姓怎的不怕他”。

《儒林外史》的结局，只能这样。想借助一些幻想来安慰自己，也不过是幻想的破灭。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

“青州兵”与曹操

——记《三国演义》片断

曾经听闻毛主席谈论曹操和“青州兵”的故事。

《三国演义》第十回是这样写的：“青州黄巾又起，聚众数十万”。东汉朝廷起用费操，“不过百余日，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操择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其余尽令归农。操自此威名日重”。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在国内流传的广泛，几乎没有其他小说可以同它比拟。书中所写，如章学诚所说，属于“七实三虚”，而民间或读或听自说书，却常把虚事也当做实事。但曹操收编黄巾三十余万人，择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却是实事，并不是虚事。演义所写这段文字，几乎同陈寿的《三国志》差不了多少。

青州兵成为曹操的主力军，推动了当时统一中国北方的事业。北方这一个大版图首先在极度纷乱中统一起来，应说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

青州兵的特点是还存在当年黄中的锐气，如曹操一个谋士所谓“我军精锐之士，无不一以当十”。惟其如此，所以这支军队在北方曾经是所向无敌的。

“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谋臣，武有勇将，威镇山东。”

“曹操平了山东，表奏朝廷，加操为建德将军费亭侯。”

“令曹操拥兵二十余万，谋臣武将数十员”

“令曹操在山东，兵强势盛，可宣入朝，以辅王室。”

“曹将军尽起山东之兵，应韶前来。”

“臣有精兵二十余万，以顺讨逆，无不克捷。”

“于是迎銮驾到许都……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

“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

这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势。

曹操还在邺郡建立了由自己发号施令的、与许昌并立的都城，“一切用人行政，兴师讨伐，皆自邺出令，莫敢有异志”。

曹操造铜雀台既成，大会文武于邺郡，设宴庆贺，夸耀自己“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的武功。其实，这些武功是仰仗青州兵建立起来的。

这样，在北方统一的形势下，曹操就能自称：“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形式也好像这样。曹操是不愿让别人称帝称王的。但自己呢？却是本人所允许的。

例如，演义有以下一段描写：

曹操“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军士排开圈场，周广二百余里。操与天子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背后都是操之心腹将校。……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操就讨宝雕弓、金钒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钒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群皆失色。”

演义把曹操的本色，汉帝的无能，写得如跃在纸上。

黄巾起义军的号召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神道设教，表现了农民缺乏独立的、自觉的、冲天的力量，同时也是表现了

农民自发的愿望或梦想，即想靠迷信得救，靠神主得救，靠中国农民历代相传的新出的“真命天子”得救。黄巾起义军认为”汉运将终“，大圣人出来了。所谓“大圣人”，就是指的新皇帝。打倒旧皇帝的朝代，另立新皇帝的朝代，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用的旗帜。一时乘机而起的，或是新出现的草莽的英雄，或是旧时的世家子弟。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差不多是中国从秦朝以后每次农民大起义时反复出现的局面。这个大逐鹿时期或长或短，曲曲折折，然后复归于重新的统一。

曹操原是从屠杀黄巾军起家的。但他首先矫诏全国，“大集义兵”，诛讨董卓，这个声势来得很大。一系列事件，使他终于认为袁绍这些人“竖子不足与谋”，于是树起了自己独立的旌旗。他依靠“青州兵”，每得一次新的战功，过去帝王的亡灵也会存他的脑中重新翻腾一次。

曹操不能不明白：刘邦的帝位，是陈胜、吴广先给打开了一条路；刘秀的帝位是赤眉铜马先给打开了一条路。现在又是黄巾先打开了一个新帝王的路子。同时，曹操也当然不能不明白：农民起义——即现在的黄巾是他的死对头，他首先是因为同农民起义军作战而开始了他的事业。

《三国演义》刻画过曹操本人的两面性：“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或许这是过去人们曾经试给他做过的结论。

两种活动交织曹操的一生：为保护封建财产，而反对农民起义；随后，也为保护新的或旧的封建财产，而又改头换面利用农民起义的原有力量。对农民来说，悲剧的出现，归结到底，足由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封建社会结构还要存在下去；是由于农民要解放自己，需要有一个领导的阶级，而能够充当它的领导的阶

级——无产阶级，还未出世。

虽然如此，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包括黄巾在内，终究是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又说："每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对东汉末年农民和封建主的阶级斗争，其形势的发展，错综复杂，我想，也应作如是观。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记：

黄巾当时不但在曹营中留有赫赫的青州兵，而且青州、幽州、徐州、冀州、荆州、扬州、克州、豫州这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因此，即使黄巾已遭受失败，仍到处有黄巾的余部，例如，刘备的部下也有"黄巾余党"，"天公将军张角部将"，"黄巾张宝部将"等等。在江东出现的于吉，诡异迷众，神怪多术，"军民敬仰"，黄巾宿敌——孙策视为"黄巾张角之流"，加以杀害。

一部历史悲剧——《水浒传》

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杂谈

(一)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中的这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梁山泊聚义时的农民与地主的社会根本矛盾。

“打鱼一世寥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当时农民和各种小生产者的“聚义”本身具有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起义反对封建地主制度，另方面，却对当时封建制度的最高代表者——“赵宋王朝”抱有“忠心报答”的幻想。

在“官逼民反”的社会背景下，梁山泊的聚义事业可说“其兴也悖焉”，但在初起时，也经过一些曲折。

先到梁山泊的“村野穷儒”王伦听了新到山寨的晁盖等人所做的事，“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自己沉吟，虚作应答”。于是林冲杀了王伦，整顿了梁山泊的阵容。李卓吾说：“王伦那厮却自家送了性命。古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即做强盗也是做不成的。尝思天下无用可厌之物，第一是秀才了。”梁山泊从此天天兴旺起来。

(二)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日若遂凌云志，敢

笑黄巢不丈夫。”宋江以唐朝末期农民起义的首领黄巢自命。他在浔阳写的这一首诗几丧失自己的生命。黄巢先自称“冲天大将军”，最后却自称起皇帝来。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首领或称王，或称帝；或先称王，随后称帝。梁山泊的晁盖也称过“天王”，在他死后，梁山泊一直还这样称他。梁山泊好汉的头领之一朱贵说过：“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李逵（他的哥哥在别人家里当长工）有一段话说得更尖锐：

“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快人快语的李逵，在晁盖死后，看“梁山泊主”的位子让来让去，便直接叫道：

“哥哥（这里指宋江）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个大宋皇帝也肯。”

可见，李逵想的是：梁山泊聚义者们应该代替“赵官家”，而建立另一个新皇帝的朝代。

（三）

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突出的一些例子，如秦末的陈胜、刘邦起义；西汉末的赤眉起义；东汉末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窦建德等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宋代的宋江起义；元末的朱元璋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朝的洪秀全起义；他们共同的一个规律是：在推翻或部份地推翻旧王朝的统治，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后，其为首者又当起农民的王或皇帝，也有的用其他称号，如张角自号为天公将军。

新朝代的当权者，有些人开始是被称为所谓“明君”，大约朝中“好人”较多，多少减轻些赋税，从而多少有利于生产（主要是农业）。随后又出现种种昏君，重岁敛怂役，便好佞当道，成为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皇帝，严重摧残或极度掠夺农业的生产。结果暴君代作，民不聊生，农民只得又起而造反了。

每个朝代之间，“昏君”和“明君”有起有落，时轻时重，或先明后昏，或半明半昏，没有一定的格式。

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朝代，就这样逐渐地，或较快他转变成自己初起义时所提出的主张和所作所为的对立面。

（四）

且以自称“大顺”皇帝的李自成作为一个历史例子。明末李自成的起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终归于失败，但起义时广泛流传过他的一个著名的口号：“迎闯王，不纳粮。”这大概也是各代农民起义时的主要动机，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不一样，也不叫什么“闯王”。然而，以“不纳粮”著称于世的“闯王”，最后也还是跳不出要当皇帝的老圈子。

农民的生产是分散的，农民本身没有坚强的集体力量，当时又没有先进的坚强的领导阶级；因此即使旧王朝因农民起义而崩溃了，农民还是跳不出封建主义的圈子，新的封建王朝又在不同的形式上建立起来了。

大约每经过两百年左右（或长些，或短些），就这样曲曲折折，周而复始，又来一个新的农民起义。如果梁山泊好汉们真像李逵所想的那样，毕竟也会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结果是重覆农民起义后一个新样式（他们想叫做什么就可以叫做什么）的王

朝，随后又或这样或那样，循着旧王朝的路上走去。

马克思的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我们也只能这样来具体了解中国的历史。

（五）

梁山泊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遭遇异族人侵。

李卓吾读《水浒全传》的序上说：

"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

当时外患频临，异言辞逼迫，或许是激致梁山泊好汉们走"一意招安"这样一条路的原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述南宋时人的存书，有如下的话：

"…中原之境土未复，君父之大仇未报，国家这大耻不能雪，此忠臣义士之所心扼腕，恨不食贼臣（按：指秦桧等人）之肉而寝其皮也欤！"

李卓吾名《水浒传》为"忠义"，又称为"发愤之所作"，殆亦与此同感。

（六）

宋江们要求当时统治者"招安"，而受"招安"的最后报应，是梁山泊聚义的散灭。

打虎好汉武松因杀淫妇荔夫而受押配，他在路上遇见宋江时这样说：

"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

宋江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

宋江还说："如得朝廷招安……日后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

说的，还是那时一些"封妻荫子"的封建老调子。

但那位主张宋江称王称帝的李逵对"招安"、这事一直表现不耐烦。在招安以后，有一次，他针对宋江感到朝廷虐待而苦闷，说：

"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点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

李逵因这些话而受宋江一顿骂后，又说：

"哥哥不听我说，明朝有的气受哩。"

宋江们一意受招安，只是一条没有路的路，最终将梁山泊好汉们引向了散灭的结局。

（七）

打方腊这一仗，是梁山泊好汉们自身盛衰、集散的最后转折点。

在打方腊之前，梁山泊好汉们虽已经为宋王朝打了许多仗，但宋王朝在他们回京之后，只准许宋江、卢俊义可"随班朝贺"，其余都受拘束，不许入城。因此，好汉们起反感了，"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有些人先各自走了。公孙胜去向宋江告别时，宋江对他说道：

"昔日弟兄相聚，如花始开；今日弟兄分别，如花零落。"这是宋江还未打方腊时说的。在打方腊后，"如花零落"的，却不仅公孙胜及其他两个，而是一连串一连串地出现了。

(八)

打方腊这一仗，要打通若干水陆险道，好汉们多死伤，但卒因群众的指点而取胜，一个老和尚对时迁说："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他还给指点"过关"的小路，嘱咐道："将军见外人时，休说贫僧多口。"

但这一个胜利，却包含梁山泊好汉们的散灭。

燕青说："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当打方腊时，许多好汉们早已注意在朝昏君和好佞们会对他们使用狠毒的手段。费保对李俊说："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的性命。"他和李俊等人就因此先做了下海的具体准备。

方腊败后，梁山泊好汉们各自散去。例如：

鲁智深圆寂于杭州六和塔；武松在六和塔出家；林冲患病也留在六和塔；燕青退居山野，做一闲人；李俊诈中风，同费保、童威、童猛乘船出海自投外国去了；戴宗求闲在泰安州，纳还了官诰；阮小七回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奉养老母；柴进纳还官诰，求闲为农；邹润不愿为官，回登云山去了；朱武、樊揣云游江湖，去投公孙胜出家……如此等等。那些到任为官的宋江、卢俊义、花荣、吴用、李逵（此人却违反自己初志了），依然被宋王朝视为仇敌。蔡京、高俅等好贼聚谋，必欲置之死地。宋江、卢俊义饮了"朝廷降赐御酒"，相继中毒而死。宋江死前，怕李逵再上梁山泊造反，把他找来，也让他饮了"药酒"，药发身死。李逵临死时嘱咐从人："我死了，可千万将我灵柩去寥儿洼和哥哥一处埋葬。"吴用、花荣同在寥儿洼自缢身死。

水浒好汉们的下场，就是这样一段历史悲剧。

（九）

宋江同诸将领离了杭州向东京进发时，燕青私自来劝他原来主人卢俊义："今既大事已毕，欲同主人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足迹足迹足迹埋名，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

卢俊义说："俺兄弟们身经百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

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燕青自称）此去，正有结果，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耳。"

《水浒传》作者加了一个评论：

"若燕青者，可谓知进退存亡之机矣。"

（十）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般的是以道教作为旗帜。鸦片战争后，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加了外来色彩，是一个例外。但洪秀全失败后不久，北方又出现了义和团，那也是一种"道歉"。

梁山泊聚义的旗子是"替天行道"。

《水浒传》写的宋江遇"九天玄女"及其投给的所谓秘密"天书，"说的就是"替天行道。""九天玄女"叫宋江为"星主"，也是道教的玩意儿。"九天玄女"嘱咐宋江："三卷天书""只可与"天机星"（指吴用）同观。"

吴用、公孙胜、戴宗等都是《水浒传》里突出的道士。《水浒传》所说的一些道士、道术能呼风唤雨，神出鬼没，能使用一般地上的人所不能用的手段，达到所不可能达到的目的。

但是，道教、道术不能代替人（包括道士们自己的饮食、穿着和住宿。人总是要食、衣、住的，道士们也一样，而食、衣、住总是必须依靠劳动者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这一点，便说明了道教、道术一切伪托、伪装，说明了历史上农民、小生产者一切向神仙求救的梦幻。

道士、道术没有能够阻止梁山泊众好汉“一意招安”，也不能预知“招安”后，他们只是各式各样的散、各式各样的死。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劳动者只能全靠自己救自己。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人们是不会懂得这个真理的。

（十一）

如《水浒传》所写，梁山泊义士们总算认为：

“不可分毫侵害百姓。”

“四海之内，皆是兄弟。”

“路见不平，便要去舍命相护。”

“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

因此，也如《水浒传》所写，梁山泊好汉们起义的作为，曾经“闹动了世界。”

一九八八年五月写

一九八九年九月修改

文艺的魅力

——兼述说鲁迅（门外杂谈）

一

关于古代艺术产生的魅力，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曾引马克思说过的话，现在把马克思的整段原话引述如下：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看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不朽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例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马克思高度地称许古代希腊的艺术。

在社会的新发展中，当古代希腊社会阶段已成为过去，事情也就发生变化。

马克思说：“一切神话都是在想像中和通过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因此，随着自然力在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当然，“一个成年人不能再变成儿童”，但是，——如前面的引文——马克思设问道：“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

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其文艺的历史，不断分别地对此作了不完全一样的回答。

二

像人们都要经历过儿童时代一样，“……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自己的史前时期……”。当然，古代各族经历的“儿童时代”，各有其特殊的面貌，特殊的色彩，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或突出在这点上，或突出在那点上，或这样或那样地显出自己的奇葩异卉。古代各族这些差别，能够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但不会是同一模样。

马克思说：“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

说到稚气，就是成年人，也有人常带有稚气。有的成年人怀有这样那样的稚气，而只要不是矫揉造作，也能使人发生好感。

古代以前，古代，中古，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幻想、神话，经常使人感到喜悦。中国民间喜欢讲”故事“，就常常夹带着各类的神话。

明朝出现的吴承恩《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在汉族中几乎家喻户晓。知道孙悟空及其同路伴侣如猪八戒等的神话故事的，总感觉得这些故事好像是活生生的。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也都有自己创造的无数色彩的神话文学作品。

三

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是有民族的特点的。

在中国，这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也就是我们平常谈论的文艺的民族形式。

文学艺术不是开源于虚无，而是开源于各民族不同社会中的人民生活。

毛泽东同志说得很对：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工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一个真正文艺作家通常熟悉的，是他土生土长的所属民族在一定社会生活中的人民生活，包括生活的内容和生活的形式。因为描写的是熟悉的生活，所以作品就有真实感，就具有典型性，就具有来自本国劳动人民的语言的精华，就具有独特的风格，就具有真正的魅力，而矫揉造作是成就不了艺术的。

四

文艺的发展，受各民族经济发展的趋势所影响，所制约；但是，各民族文艺的发展历史本身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发展在先，有的发展在后。有的发展是在正当该民族如日升的时候，有的发

展却正在民族受屈辱的时候。譬如中国，诗歌的盛大在有唐一代；戏曲的繁荣却是在蒙古人入侵中原后激发起来的；敦煌壁书和其他许多艺术品是在历史上少数民族当权的地带逐渐涌现的。

即使在黑暗年代，也不能避免光明的闪耀。

恩格斯说："……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

对于文艺的发展，也应该这样来看待。人们的社会历史本来是曲折的，因此，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必然多种多样，而不断地显出多样性的统一。

文艺的民族形式，随着各民族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历史的变化，在生动题材、生动内容、生动语言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形成新旧形式的交错。

恩格斯对人说，学德文，"我认为可以向你介绍读歌德《浮士德》的头一部份——这部份基本上是用民间文体写的……"。

恩格斯这个介绍很有意义。

民间又体属于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可能流传宽广，也可能垂之久远。

五

每个新历史时代，新历史时代的人，在发展中，有所继承，又有所否定。以为某些划时代的文艺没有社会关系的各种制约，没有社会历史的来历，没有继承前人的多少遗产，这种看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上说过：

"……莫扎特的《安魂曲》大部份不是莫扎特自己作的，而

是其他作曲家作的和完成的；而拉斐尔本人‘完成’的壁画却只占他的壁画中的一小部份。”

往下又说：

“……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能否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

可见，任何杰出的艺术家也总有他的社会历史的来历，总受一定社会条件的各种制约。

六

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的《伦敦通信》中论过雪莱和拜伦：

“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等级的人；没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莱的

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他不想声誉扫地的话。由此可见：穷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这个世界迟早也是他们的。”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又这样写道：

“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

文艺作品，对社会的一个阶级的人——工人具有魅力；而社会的另一个阶级的人——资产者却很害怕，避之恐不及。人的社会阶级地位各不相同、互相颉颃，对于文艺的爱恶也就变了样

七

列宁的名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写道：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这样，是不是文学艺术因此就会落到一个狭窄的小圈子呢？

不。无产阶级的天地是广阔的。

列宁说：

“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最近，有人将列宁这篇文章的题目和文中的“文学”一词改译为“出版物”，我想，这似乎并不切合列宁原来的文义吧？（俄文 литература 原有两重意思，一为文学，文艺；二为著作，文献，出版物；这个词与英文 literature 意思相近，都来自拉丁文 litteratura。这里如何翻译，似乎不应成为难事）。

八

事实上，有现实主义文学，便有揭穿“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的光彩夺目的作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商品和货币〉第三章的一段注释中，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的以下诗句：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老人变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哧！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贱的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时隔几百年，莎士比亚这段诗，在他离得很远的异邦，对那些“向钱看”的人们，还可以作为讽刺，或者在可能的条件下可作为针砭吧。

九

“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这是马克思对拉萨尔谈他所写的剧本的意见。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也指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不是易事。马克思、恩格斯当然是对拉萨尔进行含蓄的批评；同时，不只对德国人，而且是，对一切从事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者，他们都提出这样的期望：走现实主义的道路。

恩格斯说起法国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使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

一方面，描写、嘲笑、讽刺那必然灭亡的阶级，那些他所同情的贵族男女；另方面，毫不掩饰地赞赏他当时看到了“未来的真正的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这是恩格斯所说的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给哈克奈斯女士的信，表示他对于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意见：不只是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过去，它的消极面；而且要描写工人阶级的现在和未来，它的积极面。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家们的新现实主义创作开辟了道路。

十

当中国革命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同盟军，在这

个伟大的国土上，进行翻天覆地的事业的时候，新的文学艺术蓬勃地诞生了。经过伟大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延安的整风，在毛泽东同志《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文艺队伍深深踏入民间的泥土。其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和延安和一群文艺作者，走遍各革命根据地。从那时期起，革命的新文艺，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新文艺，得到的成就是真正划时代的。革命文艺的声音，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文艺的声音，如《黄河大合唱》、《南泥湾》等等歌曲，以及《白毛女》、《把眼光放远一点》、《刘胡兰》等等戏剧，激动了工农兵大众的心。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将逐步汇合起来，转变为全国胜利的伟大新讯号。

五四运动后，表现工农兵的革命文艺发端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初期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延安整风以后，又在农村中吸收了千百年来的文艺精华，并经过了革命的新洗礼；它不但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同样地为城市的工人群众、各种劳动者、学生、知识分子们所喜闻乐见。

十一

在抗日战争前夜，鲁迅逝世了，但他的革命文艺思想却常留人间，在实践中起了作用。

鲁迅是中国新革命文艺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赞美鲁迅的：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

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向鲁迅学习，是文艺界的重要课题。时至今日，我想，也还是如此。

十二

我自愧对鲁迅著作学习得非常少，但只要可能，应当就此做些努力。

最近看了《鲁迅书信集》，觉得很受教益。

文艺来自民间，发源于民间。这是鲁迅看待文艺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例如，他说：

“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的，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地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

鲁迅设问道：“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

十三

提到绘画，鲁迅认为，应是古今的融合，又应是中外的融合。他有以下一段话：

“就绘画而论……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

的新法合起来，也许能够合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鲁迅提出要注意以下两项：

“一是要练习素描，二是要随时观察一切。”

即“多看和练习”。

鲁迅认为端正绘画的意识，必须有：“经验、观察、思索”。

其实，每一个革命文艺家——从事各种文艺的革命文艺家都应该是这样的。

鲁迅所以那末热心于中国一些“笺谱”的复刻，出版、就是为了提供一种历史经验，便于有志者去观察和思索。

说得多么中肯呀！

总之，对于所从事的对象，都应该不断熟悉它，从各个方面熟悉它。

十四

鲁迅说了下列一些问题：“现在的青年艺术家，不愿意刻风景，但结果大概还是风景刻得较好。什么缘故呢？我看还是因为和风景熟悉的缘故。至于人物，则一者为基本练习不够（如素描及人体解剖之类），因往往不像真或不生动，二者还是为了和他们的生活离开，不明底细。”

“……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

“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

暂且以一个例子来。中国人画欧洲人的像，尽管作了很大的

努力，但同欧洲人自己画的像比较起来，总觉得有所不像，有的甚至大不像，因为中国画家平常并不同广大的欧洲人长久相处，不熟，一画起来，不论是画谁，总好像缺乏欧洲人面貌的某种特殊性，而且还有点像是中国人。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一些画家过去在人物画像上，功夫有些不足，所以中国人自己的像画得很好的也并不多。这一问题，鲁迅实际上也指出来了。

前面的一些话是就绘画而说，但鲁迅的论点对文艺各个方面都是同样适用的。如果一个中国人写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生活的小说、戏剧、或诗歌，里面的人物和具体的生活并不像中国人的模样，也就成了问题。

鲁迅足踏实地，因而为现代中国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

十五

鲁迅生活在中国革命疾风暴雨的时代，他勇敢地站在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的大旗下。他在中国艰难的岁月，总是看到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他以火热的心，努力熟悉工人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生活和斗争，同时，他希望所有的同道者都这样做。

恩格斯说：

“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甚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存。因此，这个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近代中国有两个基本的生产者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

级，也还有手工业者这类小生产者。没有工农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者阶级以及手工业者，中国社会就不能生存。这点，差不多是人人都能够懂得的。有中国，兵，则是由工农这两个生产者的阶级出身的。

毛泽东同志在战争时期说过："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我们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军队，开始称呼为工农红军，后来称呼为人民解放军；群众的亲昵称呼，则叫工农子弟兵或人民子弟兵。我们的革命军队同时也是生产的军队，在可能的条件下，生产一定的装备，生产一定的给养，但大量的装备和给养还是来自工农两个生产者阶级。"从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来，"工农兵联合起来"的歌声，传遍了中国的大地。鲁迅的心，鲁迅的笔墨，和这个伟大的歌声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指出："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参加革命、拥护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如鲁迅一样，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拥护工农这样的生产者阶级和由他们组成的革命军队。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生产者阶级，他们拥护工农这样的生产者阶级，为这样的生产者阶级服务：在革命中，为协助工农战胜反革命和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工作；在革命胜利后，则为协助工农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和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而工作。在文艺界工作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是这样，就根本上，首先是，学习，向群众学习。马克思说："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鲁迅就是不断努力，持之以恒，不畏艰险，锲而不舍，在向工农这两个生产者阶级学习的道路上攀登的。

中国有句老话："学然后知不足"。或许可说，在人类求知的不断长河中，这句老话却是光景常新的真理。

十六

文艺作品的写作方法，有的是现实主义的，有一是浪漫主义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一定社会历史生活的某些侧面；其间，杰出的作品也就会产生或这样或那样的魅力。

正如中国人爱说的："各有千秋"。对于文艺作品，不能把今当作古，也不能把古当作今，只能从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去了解它。

鲁迅说起他自己的写作：

"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体化了的作品。"

就是说，鲁迅总是要求自己作品有一定的具体集中的典型性。

毛泽东同志说：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通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文艺在于形象集中表现社会的生活，形象地典型表现社会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说的比鲁迅的话更加全面，更加完美，但同鲁迅说得自己创作的经验，道理是一致的。这是现实主义的道路。

十七

鲁迅很好地说明了文学和社会关系：

“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

问题就是这样的。

鲁迅反对文艺界的人闭关自守，主张放眼世界。

“……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在同一国内，不好只看一个人的著作；在世界范围内，同样必须多看许多作家的著作。鲁迅那样热心介绍外国文艺的各种作品，在晚年特别有兴趣介绍旧俄时代作家（如果戈理）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新作家；他这样工作是为了中国大多数作家，当然，首先是为了提高人民的见识。

鲁迅对一个木刻家说过：

“我得警告先生：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

鲁迅这一个警告，似可适应于一切文艺工作者。

十八

大家都知道鲁迅会做旧诗。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句子，经过毛泽东同志引用，几乎连小孩也都能背诵。但鲁迅怎样看待自己的旧诗呢？他说：

“……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

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作几句，自省殊亦可笑。”

真是“孺子牛”的精神，表现了鲁迅文艺的魅力。

十九

鲁迅说过我国人民的命运问题：

“……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是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对于在我们来说，经过人民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时代同鲁迅时代根本不同了。但就文艺而论，揭发自己的缺点，却是继续鲁迅的精神，“意在复兴，在改善”。在旧社会，“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而在新社会，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有广阔驰骋的天地。全国解放前延安和各革命根据地表现的人民文艺高潮，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艺高潮，启示了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的方向，开导了我们奋斗的先路。

一九八三年六月五日写毕

试说但丁（笔记）

——无知正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袭击着我，使我生出求知的渴望—

（一）

但丁的《神曲》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诗人。"

但丁的写作风格，正如他自己所说：

"请用敏锐的眼光抓住了真实。"

"艺术取法乎自然，好比学生之于教师。"

但丁抓住的真实是：封建中世纪和资本主义世纪之间不同财富拥有者的相互角逐。

"这边送过去，那边迎上来……我看见一处的人特别拥挤，他们分为两组，他们各自大呼大喊，胸膛面前推滚着一个重物，面对面挺进；他们相逢的时候，互相冲动了一回，然后各自滚着重物回转头去走……这两组各自向左向右在幽暗的圈子上走，不一刻又在圈子的对方逢着了，他们照样地打一阵，骂一阵，于是再回转头来走。就是这样反复来往没有穷尽。"

两边争夺的"重物"，即对财富的争夺。

但丁所写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不同头目集团间的财物争

夺，预兆资本主义内部不同资本家集团的财富争夺。

但丁说：

“命运给人类财富是多么的愚弄他们，而人类的追逐他，又是多么的剧烈！月亮下面的金钱，从没有使劳碌的人类有片刻的安静。”

看来月亮似乎“安静”，但为金钱而追逐的人们却没有片刻的安静。

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开始日趋剧烈了。

（二）

金钱、财富争夺的两边不断转移：

“地球上的造物多么愚蠢呀！……他创造了管理地面繁荣的神，使金钱川流不息，从这一双手里转那一双，从这一个民族转到那一个……这一个做了主人翁，那一个做了奴隶儿，都是他的玩物。他在冥冥之中，好比躲在草里面的蛇。……他的变化不测，全然不受一点阻碍，必须使他的运动加快；他常常使一个人从这一端跌到那一端。你诅咒他的时候，安知不是应当称颂他的时候。他一意孤行，笑骂由人，非但不加申辩，并且充耳不闻。他欢欢喜喜旋转他的轮盘……”

这样，忽而大发横财，忽而一贫如洗。这是但丁时代已经开始活跃的资本主义自然规律，而绝不是什么“造物”、什么“神”的产生。

但丁譬喻那些无穷无尽渴求金钱的富翁为“母狼”。

“她的性质非常残酷，肚子没有饱足的时候，愈加吃得多，反而愈加饥饿”。

“是非”，也可以用金钱交换。

“那里可以用金钱把一个‘非’换成一个‘是’呢。”

（三）

但丁说：

“我们血统的高贵真是脆弱呀！”

“所有地上的东西都有一个死的命运，一如你们自己；有的东西似乎能够久存，其实是个人的生命太短了。月球命名海边的水有涨有落，永无间断，命运的玩弄佛罗伦斯也是如此。因此我说及的那些佛罗伦斯的大家巨族，他们的声名已经隐没在时间的尘雾里了，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丁举出了佛办伦斯的一些“著名的市民，而今式微了。”

“因为骄傲而倒地了。”

“一班暴发户的突然富有，佛罗伦斯呀！使你的城里生出骄傲和放荡，因此早已使你挥泪了。”

从佛罗伦斯封建名门贵族的灭亡历史，可测见新起的资本主义暴发户也必然灭亡。

（四）

但丁说到一个人：“他因为无底的金钱欲，做了叛徒、盗贼和谋杀尊亲的人。”

“克拉苏！告诉我们，因为你是知道的，黄金的滋味如何？”

书上注了一条这个古罗马时代克拉苏的故事：

“克拉苏雄于财，与凯撒、伯鸿贝并称罗马前三雄。克拉苏出为叙利亚总督，被安息（Parthia）王所败，被杀后，以其头浸于溶金之中，说：‘君渴于金，请饮金！’”

像克拉苏财雄一世的，不算多，或是爱尝尝黄金滋味的，却大有人在。

“一班人民看见他们的领导人也只是争取他们所渴望的财产。”

牧师的榜样又如何呢？

“现代牧师们的出行需要人左右扶持，他们是这般笨重，需要人前引而后推。他们的外套盖到他们盛饰的马身上，叫人看了会作一皮之下、两兽前行之想。”

牧师和马，竟不过是像盖在马身上的一张皮下的两兽！

“那专作祈祷用的房屋，现在变为兽窟了，那法衣也变为恶劣的面粉袋了。重利盘剥者所得的果子，在上帝面前，不比那使僧侣们的心变成疯狂的果子更讨厌。”

“宝剑和十字架都拿在一个人的手里，这二件东西在一起就弄得糟糕了：因为他们合在一起，这个便不怕那个。”

“他们这班人，日夜在那果用基督的名义做着买卖。他们把一切罪过归于弱小的一边，这是向例如此；然而天刑将为真理的见证，报复就要落在他身上了。”

“在那审判的时候，将见许多口称基督、基督的，比那些从来不知基督的还要离开基督远呢……？”

对此，但丁怀着不与其妥协的信念：他主张把从事重利盘剥的富豪们、暴发户们放在群众的审判面前，也主张把贪欲成性的僧侣们放在群众的审判面前。

（五）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开始出现，显示了斗争的残酷。

但丁写了当时社会的颠倒：

“……景象大变了，我看见他两脚向上……不懂事情为什么这样颠倒，真叫我惊奇不绝。”

“那小小的引起人类残忍的欲念图面，全部显示给我了，从他的山脉到他的河口。”

山河大地被一小撮富豪们、暴发户们的残忍欲念支配着。

“因为你是挨冻挨饿、把一块荒地播满善种，而使他成为一个葡萄园的，可是今日在那里却长着荆棘了。”

社会的颠倒，形成了彼此互相不懂的“语言”：“他既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不懂他的。”

“允许”和“守约”成了不相容的两方：

“允许的很多，守约的很少。”

人间的和睦也被破坏了：

“他们在生时都欢喜散布谣言，表示歧见，破坏人间的和睦。”

（六）

“你将懂得别人家的面包是多么含着苦味，别人家的楼梯是多么升降艰难。”

马克思说：

“但丁在他的不朽的诗篇中说过，‘对放逐者的最残酷的折磨之一，是必须跟各种败类打交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十七卷，五二四页）

但丁这么写过残酷的折磨：

“压在你肩上最难耐的重量却是你的同样，他们既凶恶又拙

劣，你竟和着他们坠入这种幽谷；他们忘恩负义，非愚即狂，居然回转头来反抗你。”

“这些就是隐在几年以后等着你的陷井。”

“当那引导我的心灵以入于天国的一位，谴责今日尘世可悲的生活以后，像一个人的背后点着火。”

对于这些，但丁不主张缄默，不主张自己甘受。

但丁认为：

“希望是一种对于未来光荣的预期。”

“我像那目前一无所有的人，满足于未来和希望。”

“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

“恐怕，他使人们在正大的事业前是却步。”

“我觉得很有坚强的力量足以抵抗命运的打击。”

“假使我对于真理是一个胆小的朋友，我恐怕要在那些人中失去了生命……”

但丁认为不能畏首畏尾。他的名言：

“我的航行，决不是可以用小舟去破万里浪的，也不是畏首畏尾的舵手可以担当的。”

（七）

“有谁能够把我所看见的流血和创伤描摹尽致呢？”

“我们没有足够的字句，也没有足够的记忆力，可以包罗这许多事物。”

但是，但丁相信一种实践的力量：

“一粒小小的火星，每每点着一根大火把。”

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常说的一句很著名的话：“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

但丁说：

“太阳要上升了，你们会找着一条较平坦的路径，由那里攀登上去。”

但丁歌颂那“度着非常被人轻蔑的生活，但是他的心里并不觉得可羞而低着头。。”

但丁向往的，是一个“自由，正直而健全”的“天国”这“天国”就是穷人的“天国”

“……贫穷的人数增加了，都……过刻苦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值得在天国的光荣里歌颂的。”

这里所说贫穷的人数增加，在实际上应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在先河流。所谓“天国”，或者可说是空想社会主义原始的一种幼芽。

（八）

当然，从历史上看，但丁没有了解他当时市民们要求所谓“自由”，正是资本主义黎明时期的要求，客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但丁说：

“他是寻求自由而来的；自由是一件宝物，有不惜牺牲性命而去寻求的呢……为着自由，你视死如归，苦无痛苦，那里有你的遗体，到那伟大的一天，他将是很光辉的。”

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预兆来临了。

（九）

但丁提出了一些唯物论或近似唯物论的思想，也有一些原始

朴素辩证法的论点，一些与自己的“天国梦想”不同的思想 例如，他以下的论点：

（1）善于观察物性。

（2）一切事物，其间都有一个互相的秩序。

（3）光线中有无数的尘埃浮动，有的走着直线，有的走着曲线，一时快，一时慢，大小长短，千变万化，形态不一。

（4）一个圆盆里放着水，在中心打一下，则水波自中心往四周；在四周打一下，则水波自四周往中心。

（5）像银河一般罗列着大小不等的光点，一片白色从世界的北极到南极。

（6）你坐在椅子上，目光所及不过是大姆指到小姆指之间，偏偏要判断一千里路外的事物么？

（7）你像一个人，只知道事物的名字，但不知道事物的本质。

（8）那梯子很高，我的眼光及不到他的头顶。

（9）假使你们的壮丽达到超过的程度，那末你们的衰落也要超过的。

（10）在你向前行进之行，最好把你脚下的宇宙回顾一下。

（11）同样的树有的结甜果子，有的结酸果子。

（12）一个人所下的判断，不能过于自信像果子没有成熟便估计收获的这些人。

（13）你对于是和非，在没有看得清楚以前，切勿轻易说出，要像在你的脚上绑着铅块，不能举步而行动的疲劳者。那些不加辨别贸然赞成或反对的，都是愚夫，常常因为速断的缘故错了方向，又因这自负的缘故不肯改变

（14）人类呀！请你们在判断上谨慎些！

（15）所有地上的东西都有一个死的命运，一如你们自己；有的东西似乎能够久存，其实是个人的生命太短了。

（16）在那放指于火而急抽回的一霎间。

（17）“是”和“否”交战在我胸中。

（18）假使民众的意见是错误了，那末是他们知识的钥匙尚未开启。

（19）你的脚还没有踏在真理上面，只有依着你的旧习惯，东张西望扑个空。

（20）决不把正当的要求关在门外。

（21）我将先讨论苦味最多的一个。

（22）只有从那些感觉所得的东西，你才学习到你以后有用的知识。

（23）善始者不及以善终，好比橡树不及长成结实一般。

（24）假使你细察开创者的情形，再细察后继者的行径，你将看见白的东西已经为黑的了。

（25）把你的眼光向下。

（26）示我以真理的证据者，在其跟随而起的作为。

（27）绕山的路是曲的。

（28）我们攀登一条迂曲的石缝，时而左弯，时而向右弯，好像波浪起伏一般。

（29）走这种路要用些技巧，得紧跟着弯弯曲曲的路边走。

（30）虽苦犹乐的工作。

（31）树上的叶子这一张落了，那一张又生了。

（32）我们的路程是谁也不能截断的。

（33）我的思想和我的所见相比，真可说："微乎其微"了。

我以上所述的《神曲》中的物事，也真可说是仅"微乎其微"。或许会有些"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吧。

这篇笔记的引文是根据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王维克的散文体译本。引文所注的页码，均见王译本。题目下的引句，用的是朱维基的《炼狱》的中译本。

同日又记

哲学类

认识的渐变和突变

——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程

殊

“顿悟成佛”—这是公元四世纪时，中国佛教徒道生首先提出的。

谢灵运张大其说，提出顿悟和渐悟的差别。随后，中国的佛学、佛教中逐步形成为顿渐两大宗派。在中国佛学的历史中，顿渐两派曾经有过激烈的斗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个方面，或这样可那样地影响到中国历史上的思想界。曹溪和尚慧能在这个斗争中成为顿宗发展新阶段的一个开创人物。

从唯物论看，所谓顿悟和渐悟，在哲学上属于认识论的问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经历各种不同性质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对客观存在、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论对大的或小的事物的认识，也都有一个由渐变到突渐的过程。通过人的不断行动，不断实践，进行对事物的探索，如螺旋式的发展，由迷（迷是佛学的用语）到悟——即由不悟到悟之甚少，到悟之较多，到能够悟到某个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或其中的某些规律）。各种事物本身的复杂程度并不一样，但事物本身究竟是复杂的，因此，人类认识事物都必须爬过或大或小的艰难的阶梯。在爬梯的时候，并不是一切都会顺利，随时都可能跌下。当然，跌了还可能再爬，又跌又爬；但有的人永远跌下去，再爬不起来

人在行动中，在实践中，人对事物（自然界的事物或社会的事物）的认识经过某种渐变，时间或长或短，而结果，或终于有所大悟（佛家的通俗用语，叫“大彻大悟”）。相反的，或终于没有所悟。有所大悟，即悟到其事物的多方面，悟到该事物的全面，悟到该事物的发展的总趋势。这是人在实践中沿着渐变道路对事物所产生的认识上的某种突变。这种突变是认识运动“渐进过程的中断”。这是认识运动的渐变和突变的统一，如用佛家的语言，或许叫做渐悟和顿悟的统一。

世界的运动没有尽头，人的认识运动也没有尽头。人总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由低级攀登到更高的一级，由一个突变攀登到另一个突变，由一个认识运动的渐变和突变的矛盾统一，过渡、转化为另一个新的认识运动的渐变和突变的矛盾统一，永远这样往复，不会终止。

在这样的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基本上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两个相反的观点。

是思维为存在、自然界的本原，还是存在、自然界为思维的本原，这是哲学上唯心论和唯物论两大派争论的基本问题。前者属于唯心论，后者属于唯物论。中国佛学中渐悟和顿悟两派的斗争，把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问题，变成为认识“佛性”是经过渐悟经过顿悟——这样一个主观世界之间的问题，玄之又玄。两派都离开了客观世界，因此，两派都属于唯心论，都是唯心论——或是客观唯心论，或是主观唯心论——的偏见。

虽则如此，佛学顿宗提出认识上所谓“顿悟”的问题，打破了长久以来佛学所认为“渐悟”是认识上唯一的支配观点，打破了渐派在认识上的死板，停滞，僵化。这是一个进步，这是给佛

学的认识问题上输进了一种新东西。但是，顿宗舍弃了认识上的渐悟——即渐变的观点，便也就是舍弃了认识上突变的必经的点，仅仅幻想一步登天。在这个问题上，顿宗的观点，也可适用毛泽东同志在感性和理性的问题上对哲学唯心论所形容的，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佛学顿宗的首创者——道生也提有“悟事有难易”之说。可是，中国佛学史上顿宗没有发展这个观点。顿宗一般发展所说的顿悟，同唯物论相反，如顿宗一派人所说的：“一闻言下便悟”，“悟即须臾”。这是一套主观唯心论。

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并不是平坦的道路。而佛学中顿派所追求的，却是一很简单而轻便的——主观唯心论的道路。

顿宗自身的矛盾是：一方面，反对了局限于渐悟的片面性；另方面，自己却陷在局限于主观唯心论的角落上，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的片面性。

慧能和尚及其徒弟们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有它的社会根基。这就生产者的局限和片面性。小生产者自视甚卑，几于无地自容；又自视甚高，几于目空一切；常常二者兼而有之。

在中国佛学、佛教中，慧能本来是一个名不出众的极其普通的劳动者，一个在市卖紫的人，后来当了和尚，也只是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在佛寺里，他在确房踏确，从事舂米，如柳宗元关于他的碑文所定的，“能劳苦服役”。这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小生产者。他在佛学上的活动、表现的，是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

小生产者有一个强大之处，就是人口众多（包括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内），它是一个人口最多的阶级了；同时，小生产者的弱点，就是它极散漫，各个小生产者经常像坐井观天。按照小生产

者来本的面貌，总是希望从迷信得救。他们虽然也知道有一个“孔夫子”，但同孔夫子的“礼乐”却格格不入。中国农民在起义的日子，总爱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帜，这是道家的旗帜；但在平常的日子，太上老君的“长生不老”，对他们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要求的，终究是当前的救急救死。自从佛教进入中国，小生产者们大批大群地迷信了佛教，形成“佛老同流”。佛教宣说它是普渡慈航，能够“普渡众生”，并且有了“西天极乐世界”，因此，就吸引了大量的小生产者。但是小生产者们对那许许多多不断输入的、浩如烟海的佛教文字，梵音汉译，诘屈聱牙，感到渺茫。究竟那些说的是什么呀？

适合于中国小生产者的需要，一个新的禅宗诞生了。他们从一人当了和尚的小生产者口里，听到一个“顿悟”的新说教。

在所谓“顿悟”、“顿教”、“顿门”等等名义下，这个以慧能为代表的宗派的简单说教一切界限中解放出来。“人皆有佛性”，不信佛法的人也可“成佛”。

小生产者众多，像个大海洋，各个人像大海洋中的一滴水，不可能区别谁能“成佛”，谁不能“成佛”，总之，“人皆有佛性”。

慧能初见他的祖师弘忍，就回答了弘忍的挑战：

弘忍：汝是岭南人，又是狲獠，若堪作佛！

慧能：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在慧能看来，“佛性”抹去地方的差别，也抹去人种的差别。这次初见面的回答，显示了慧能具有的智慧。弘忍听了就说：“这狲獠，根本大利。”

以下是《坛经》上记载的两段事实：

弘忍听了慧能的答话后，“欲更其识，见左右在傍边，大师更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其一）

弘忍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见，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其二）

仅在这寺院里，一个有名的、权威的祖师同一个新来和尚的寥寥几句的谈话，就引起了自己左右可能加以迫害的恐惧，可见“佛性”正像一个小生产者处在一个蜗牛壳中，很狭窄，也并不是“人皆有佛性”。

小生产者在任何地方，在不同的人种中，都具有同一个模样，照慧能的说法，当然都一样有“佛性”。但是，小生产者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之间，彼此有矛盾。他们在历史的运动中和波浪中生活着，有时缓慢地分化，有时急剧地分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僵死的，他们的“佛性”是会有差别的，因而，他们的不同的“佛性”和“非佛性”越来越多的剥削小生产者的剥削阶级中人相继不断地、成批成批地——或许是整个阶级地卷进了信佛的潮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指的这类人所具有的“佛性”。

一种“佛性”同另一种或几种“佛性”的斗争，证明佛性与佛性之间，有很大差别，很矛盾，以至很大对抗，从而彼比间划开一个无情的界限。

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佛性即是“阶级性”。不同的佛性的无情的界限，反映的，正是不同的阶级性的界限。

中国佛学、佛教内部间的斗争，是封建社会内部阶级斗争所

形成的五光十色的折光；或者是反映中小生产者一类劳动者同封建主及其他剥削的斗争，或者是反映小生产者一个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者是反映封建地主内部的斗争。

在一定时间，斗争曾经是你死我活的。在佛教的禅门内部，为了一件袈裟传代，就是这样。

弘忍在“三更，唤慧能堂内，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弘忍说：“慧能！自古传法，命如悬系。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

这就如王维的《能禅师碑铭》记载弘忍临别对慧能说的，“物忌独贤，人恶出已”。

《坛经》记载过此后慧能遭到一些险恶的故事，“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开”。

又据《坛经》记载，慧能临逝世，给徒弟留了以下的话：

“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扰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性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

有人说过的，或许这段话是神会藉慧能的名字，而作的自我标榜。但却实有其事，即：神会在慧能没世以后二十余年，推翻了北方佛教中声势赫赫、占有统治地位的渐派，建立了以慧能为宗的教义。这是当时北主佛学、佛教中的一次大斗争，也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慧能为旗帜的顿宗在佛学、佛教中号召力的精神，可举如下的例子：

慧能针对一个轻侮他的小官僚说：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

重视人，把下下人的智收集起来，就成为上上的智慧。上上人瞧不起人，罪过很大，有无量无边罪。这是慧能对当时下下人的智慧的看法和极度的歌颂，而对那些官僚们自恃是“上上人”，却给予很大的蔑视。

慧能勉励人不要当“迷人”（糊涂人）他给人这样“破疑”：

“东方人造罪，吟佛求生何国？”

他这样大胆地破除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迷信，有如狮子吼！

这些说明为甚么顿宗当时能吸引人，能打倒当时北方渐宗的权威。

顿宗的教义向两个方面发展：

一方面，直线地继续走向极度的主观唯心论：否认渐悟，“以心传心”，陷于虚妄只能“颠倒妄想”。

另方面，物极必反，不自觉地走向一种泛神论：“人皆有佛性”，“若识众生即是佛性”“众生是佛”。这是近似泛神论。

慧能要逝世时，承认：“有来必去，理亦当然。”“落叶归根，来时无日。”这些说法，也可说是靠近唯物论的门户。当然，这仅是他的个别的观点。

从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出身的慧能，接触过一些事物，他看到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总是“来去相因”，“出语尽双”。他举了几十个对子，想说明问题。例如：

“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暗与明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

“有为与无为对，有色与无色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俗对，僧与俗对，老与小对，大大与小小对，长与短对，高与下对。”

“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常与无常对，喜与嗔对，舍与悭对，进退对，生与灭对，体与用对，有情与无情对。”等等

所说的是这些对，实质上是慧能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事物的矛盾。

慧能没有把“顿”和“渐”列成一个对，列成一个矛盾，说明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说明他在认识问题上陷于极端的片面性。丈八灯台，照不见自己。小生产者坐井观天，是不能够知道自己这个片面性的。

慧能列举一些矛盾，没有论述事物中这些矛盾的运动，没有看见这些矛盾在运动中斗争着，交错着，互相代替，互相克服；没有论述一个矛盾在运动中如何引出另一个矛盾……如此等等。他不能领会渐悟与顿悟的联系，不能在认识事先过程事看到渐变是导致顿悟的阶梯，不能领悟事物运动和认识运动的渐进过程的中断，不能领悟矛盾的统一。这样，他就不可能认识种种事故“来去相因”的辩证法。他说的一些“来去相因”，一般在只在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运动中打转，而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在的、实质的运动。

列宁说：“……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列宁这些话或许也可以用来看待慧能和尚的僧侣主义；但或许在这里引用列宁这些话，会过高地看待慧能和尚？

在秦朝末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差不

多在每两百年左右为一周期，爆发一次农民大起义。佛学顿渐两派的斗争，有其社会基础的差别，有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差别，但佛学中这个较大的斗争是发生在隋末农民大起义这后，没有因此触动社会财产关系，没有因此引起整个社会范围的震荡，没有引起市民和农民的起义风暴。两派后都以帝王为靠山。渐派神秀得势，因为他是“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两京指长安和洛阳，三帝指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继慧能而起的、曾经是慧能徒弟的顿派神会得势，因为当安禄山反叛时，他曾经为军队筹饷出了力（这里且不谈他所有取的宗教形式），受到唐肃宗、郭子仪的赏识。反对安禄山，是得人拥护的，但不同于农民的直接风暴。

胡适一生对于中国革命，总是谈虎色变。可是他从各国所藏的敦煌残卷中收集了神会的一些《语录》之后，一提神会推倒了以神秀为代表的渐宗，便叫为“宗教革命”，“中国思想史上的绝大解放”，叫“神会是个革命家”。他比拟于欧洲的宗教革命，所谓“马丁路德提出一个自己的良知，罗马天主教便坍塌了半个欧洲”。胡适第一没有了解当时罗马天主教会和欧洲封建财产制度的密切联系和密切结合，第二没有区别七世纪——八世纪的中国同十五世纪（可追溯到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欧洲之间的经济条件和阶级条件。

恩格斯论述过欧洲宗教改革的性质和条件：

“宗教改革——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

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市民阶级的势力在封建制度内部发展起来了。一个新的阶级起而反抗大土地所有者。……”

“十三世纪至十世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革命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这就是欧洲的宗教改革。

反复蔓延几个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其中著名的，如英国的约翰·威克利夫的思想运动捷克的胡司运动和起义，德国的市民改革家路德和平民革命家闵采尔——这两派的分道扬镳以及闵采尔为代表的德国农民战争，法国人加尔文所创建的教义在英国唤起的起义，“在路德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等等。中国佛学、佛教中顿渐两派的大的斗争发生在七世纪到八世纪，同欧洲这些宗教改革比较起来，经济条件和阶级条件不显然的差别。中国不少佛教寺院也有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有些大寺院有较多的财产，这类寺院的财产在不同封建王朝之间，在各教派势力时起时落之间，也有所变化，但一般地说，没有像欧洲罗马天主教拥有那样大的地产。中国佛学、佛教顿渐两派的斗争的出现，不仅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才过去不远，而且市民阶级、城市平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也不能同欧洲的宗教改革时代相比。中国佛学、佛教这两派在思想上的斗争，当然受了当这些经济条件的摆布，然受了当时这些政治条件的左右。它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前的一种反射的折光。

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产生的情况也不一样。

一切以时间、地点为条件。对事物，对历史事件，不能像胡适那样，乱加以相同的比拟。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黑格尔反对绝对化

（读书札记） 程 殊

“黑格尔反对绝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萌芽就在这里。”

这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就黑格尔对独断主义所作的批判而写的句子。

人们容易自以为是，所以总是不自觉地或自觉地喜欢绝对，喜欢片面，因而把假象当作员相，把个别当作普遍，把偶然当作必然，如此等等。但是，辩证哲学出来了。“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存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中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列宁指出了“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一革命的方面。”但是，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的批注中，对黑格尔的“歪曲、诽谤唯物主义”，“躲避唯物主义的遁词”等等的一系列斥责，是极其严厉的。他对黑格尔所谓“不可能再有更贫乏的了”一语，写道：“一初都会是贫乏的，如果加以歪曲和剽窃的话。”虽则如此，当他看到黑格尔批判独断主义的时候，却表示何等喜悦呀！

“反对绝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萌芽”，这话是深刻的。

人们容易把自己对世界的万千气象、万千动态的——如毛泽东同志形容过的——“一孔之见”夸大为绝对，作片面的了解，独断地提出来未经证明的假设，并独断地视之为不易的定理。辩

证唯物论否认在认识问题上这些狭窄局限，这些自我闭塞。如恩格斯所说，“……人们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谈到辩证法，恩格斯喜欢先谈起量和质的转化。在《反杜林论》，在《自然辩证法》，都是这样。在自然界，他举出了“一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压力下，在摄氏零度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摄氏一百度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在人类社会，他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

马克思《别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在论《协作》的劳动的是和质的变化问题上，有以下一段著名的话：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宴的问题不但是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马克思接着对此又有些比较详细的论述，还附注了不少的材

料。

数量变为质量，创造一种生产力；反过来，生产力的质量又变为数量，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一个劳动者可等于几百个几千个劳动者，其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

各国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各国社会制度和各国具体条件，而发生极其差异的交错，突出说明了列宁提出反对绝对的观点，对于看待任何事物、任何问题的重要性。例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比较过当时中英两国生产力的情况："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几百磅。"按人口来说，中国是有几亿人口的一个大国，而英国不过是一个小国，但按生产力来说，中国却是一个小国，而几千万人口的英国却是一个大国。

一九八〇年冬天，有一个小册子说了这件事："有人估计，美国现在电子计算机完成的工作量，需要四千亿人才能完成，而且有些由电子计算机完成的工作，人工根本是无法进行的。"而现在世界的人口不过只有几十亿。

在各国资本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强中更有强中手"的竞争。日本人口只有一亿多，而美国人口却有两亿多，但由于近二十年间采用新技术的角逐，日本有些工业行业却跃居首位。

论起人口密度，日本殆居东亚第一，但是，这并不妨碍资本帝国主义的日本在工业上的跳跃。

其实，人口密度大于中国的，如英国、西德、意大利等国，也都不妨碍它们的高度工业化。

当然，各国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和跳跃，除了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斗争、冲突、倾轧和危机，并激发新的

军国主义而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日本当然同样。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人多，当然会有所困难，即所谓“大有大的难处”。但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人多，就更需要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列宁那样，集中全国优秀的、有些甚至在世界上堪称第一流的科技人才，拟出可行的统一经济计划，谦虚谨慎，既反“左”防右，也反右防“左”，逐步地、有节奏地过渡到高度的发展。否则，生产不足，就可能出现更多的困难，而且，恰如列宁所说，落珀是要挨打的。

殷鉴不远。贴近我们的，永不能忘的历史教训，就是几十年来的中国和日本。在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不能让这种历史重演。

上面说的例子，只想说明世界事物的千差万别的交错。

时间或长或短，范围或广或狭，一切事物都因各种条件而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一切都在变易，都在流徙；而旧事物将无情地消逝，新事物将无情他诞生。在认识问题上，重要的，如列宁所说：

“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

“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中国有句老话：“过犹不及”。孔子用过它。毛泽东同志为此作过一些评述，认为，这句老话说了事物的质和量的关系。我想，这个评述是正确的。

一定的事物所以成为一定的事物，因为它含有、具有一定的

量。过了这个一定的量，或者不及这个一定的量，就会有质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质，这个一定的事物变为另一个一定的事物。

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策略时，说过："……只要再多走一小步，彷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再多走一小步，会使真理变成错误，可见真理有一个限量："过犹不及"。

在"论统一的经济计划"的问题上，列宁说："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事业。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是印证了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

一步之差，也说的是：真理有一个限量的问题，有个尺度。

关于农业生产的事，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说的农业生产，意指"生产主要植物性食物，即生产各文明国家中一般主要

生活资料的那一部份"。毛泽东同志也提过农业是基础，强调发展粮食，同时，又规定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总方针。对此，当然应该加以分析，加以联系，作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理解。在经济发展的国家，把大量粮食用作牲畜、家禽的饲料，从而变为人们的肉类和奶类的食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将来趋势，也必定会这样。四人帮完全绝对他、片面他、独断地把问题曲解为单搞粮食，不搞"林、牧、副、渔"。把事情搞得这样片面，又过，又不及，根本上伤害了农业生产力。恣肆灭裂，违背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四人帮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蔑视辩护法，因此，得了历史的惩罚。

人的思想发展，处在不同时期，总会有一定的界限。例如，

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和有经验的成年人就有一个界限。列宁哲学笔记上记述了黑格尔以下一段话："——正像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衰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

列宁对这段话，批注道："很好的比较（唯物主义的）。"

凡事都有一个界限。把事情绝对化，对具体的情况不作具体的分析，都会是片面的，都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独断，使问题僵化。我满怀著差惭表明这一点：在这样或那样的认识问题上，我一辈子就经常犯了绝对、片面、独断、僵化的过错……。

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

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

（评“四人帮”杂记）

列宁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一文论述“一般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的问题，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不免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捍卫自己的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相互交替，时而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根本反对改良的方法。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就是这样，这种在西欧各国日益成为不再是地主阶级的政策，而是一般资产阶级的一种政策。第一种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就是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的恶意，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

很显然，列宁说的这两种管理方式，两种统治方法，不仅资产阶级采取，而且历史上各种剥削阶级在获得统治地位后也都曾经采取。

这里不妨说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所谓儒法之间的问题。

所谓“儒法斗争”，“四人帮”大大喧嚷一个时候。据一本书记载：“四人帮”认为，“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

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现在也一定有儒"，"党内也有儒"。在"四人帮"看来，中国历史上一切学派，不分阶级差别，不分时代，都绕在儒法两家之间团团转；不仅"儒法斗争"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其他各家"学派"只是或者思想上属于法家，或者思想上属于儒家，而且，两千多年来一切学派的斗争一直都是这样。据他们说，不但一切学派的思想上斗争是这样，而且两千多年来一切政治的斗争，也只是"儒法两家"的斗争。

按照"四人帮"的观点，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历代劳动者，他们不懂得什么思考，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自己的要求。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仅是儒家或法家的隶属，或者可以说，都只是法家的隶属。而到现在，在无产阶级的当权时代，"四人帮"妄图夺权，按照他们的自我广告，他们是法家的继承人，是法家的正统派，而一切违背"四人帮"意见的，都一律算是儒家。因此，"四人帮"要代表法家行事，对于他们所认为是属于儒家的，必须加以清算，加以讨伐。

儒法两家是两千多年前出现的。正像列宁对欧洲资产阶级所谓说的一样，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封建地主阶级也有两种管理方式，两种统治方法。儒法两家便是代表他们的两种管理方式，两种统治方法。这两种管理方式，两种统治方法，有个一致的目的：维护封建主的统治，维护封建制度。

儒法两家的"道"和"术"，在历史上惯称所谓王霸之道，王霸之术。这两种道术的统治方法，其情况是怎样的呢？

封建制度的拥护者——孟子这样说："霸者之民，欢虞（欢欢喜喜的样子）如也。王者之民，脾脾（得意自在的样子）如

也”。好像老百姓在这两种道术的管理下，情况并没有差了多少。

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这样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

毛泽东同志强调地说明了反对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两面政策，而革命群众需要采取“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

儒法两家的道术是中国历代封建阶级的两面政策。采取这两家道术的不同派别，是中国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两套班子：在某种需要时，这套班子上台，存那种需要时，那套班子上台，而在某些时，为着适应需要，两套班子也同时上台。

中国封建阶级的集中代表人并不掩盖他们的“两手”。汉宣帝说：“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他赤裸裸他暴露了自己。

一般说来，一个剥削阶级总是有两个基本派别（或是几个派别）的人物，一派装红脸，一派装白脸；但由于事情利害的变化，红脸也可以变白脸，白脸也可以变红脸，有的可以同时是一半白脸，又是一半红脸（即所谓两面派）。总之，剥削阶级存一定时候的各种利益有各种复杂的表现，也就有各种不同的代理人，而老百姓只能根据自己的或迟或早的遭遇来分别地认识他们。中国历史上儒法两家交替执政或者共同参差执政，问题不过如此。

稍为见识英美资本主义正常制度的，都知道英国原来是由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后来则由“工党”代替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美国则由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如此等等。因为，正像列宁说的：“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

至少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地用一个样子和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在中国这个长期而庞大的封建帝国，为了对付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或者是写对付自己封建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统治阶级用反复交替或相机并用的手段，这并不足怪。

可是，“四人帮”竟然丝毫不想想这类众多的历史事究，更说不上对具体事物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四人帮”大概忘记或者竟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论点。

马克思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在“四人帮”，竟是儒法两家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儒法两家的意识；竟是儒法两家制约了中国社会历史，而不是中国社会历史制约了儒法两家。

在“四人帮”看来，要判断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各时代的变革或变迁，不是如马克思所说，“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获得解释，相反，却必须从儒法两家的意识中去获得解释。

“四人帮”认为，要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个朝代是好或是坏，

只要看那些管事的，那些当权的；儒家便坏，法家便好。

法家李斯被赵高腰斩咸阳市，“四人帮”也就把那个“精通刑法”而奉秦始皇之命以“法事”教胡亥的赵高一变而为“儒家”。

一本给“四人帮”吹嘘的书，这样写道：“秦始皇对反革命儒生的镇压不彻底。在他去世后，潜伏在秦政权内部的野心家赵高乘机篡权，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转而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

黑白竟是这样的颠倒。真正重演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

“四人帮”极端地、极度地、盲目他仇混儒家，恨不能把儒家的一切东西，全都焚之、坑

之；而且如有谁引用过儒家的一点话，虽然是有限度的，他们也绝对不能容忍，一经他们调查发现，或者并不经什么“调查”，而只凭自己不高兴，指定谁是“儒家”，即不分皂白，斥为大逆不道，诛之讨之，纳入他们号称为“反革命分子”的行列。

列宁在他的一篇名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说过：

“在马克思主义里绝对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

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

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看！列宁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是：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

让我们再听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吧：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看！毛泽东同志认为“孔夫子”也是包括在我们“珍贵的”遗产之内的。

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从孔孟的书上取来的。如此等等。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没有提到法家。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主义，既然“我们这个民族的遗产”，当然，不会把法家学说中有某些值得注意值得参考的东西排斥在外，例如，其中有某些在一定程度上的唯物主义的成份。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四人帮”同毛泽东思想完全相反。他们把所谓法家当做“创造中国历史的动力，实质上，毫不知羞地，认为“四人帮”自己在“创造”中国的历史。不论他们的胡作非为曾经假借过什么名义，他们妄想把正在前进的中国拉向后退，结果，他们这种

反动企图只能被前进的历史车轮所斫压碎。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附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四人帮”共事几年，愚蠢至极，负罪很多。不过，我和“四人帮”有过很深的分歧和冲突，这也是事实。举比较大的例子，如，（一）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

“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二）

或许以下要说的一次，是冲突的一次集中的表现。在九大预备时期，我在中央会议上，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拟的九大报告稿（即林彪在九大会上念的）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一些小国，如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你举的现在中国的例子，也是中小城市……”

张春桥所说；完全胡说八道。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进卫生间，出来后，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但是，我

的话异常激怒了康生四人帮。过了两天，开一个会，对我进行了一个从来没有的、言词极其激烈的责斥和批评。在我倒后，四人帮接连不断地攻击所谓“唯生产力论”，并反过来对我加封一个所谓“伯恩斯坦”的名义。

四人帮发动所谓“尊法反儒”的喧嚷，则是在打倒我之后，当然把我放在“尊儒”之列。

在延安初期，我写过一篇关于孔子的文字，幼稚浅薄，目不待言。此文发表前，先请教毛主席，记得毛主席对我的原稿加进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意见。毛主席写给我的原文，我记得在一九七一年我被关押之前，一直保存着，现在是否还在，我就不知道了。四人帮批我关于孔子的文字，其中所引的材料，除了我年幼无知时所写的外，大概引自《解放周刊》，似乎也把毛主席的意见当作我的意见，胡乱加以“批判”。

陈伯达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科学·假设·实践

（读书杂记）

似乎有过这样意见："科学不需要假设；假设不过是主观的乱想乱说，同科学没有关系，同实践没有关系……"（见某个日报）。这类意见把科学的假设视同"先验论"。如此等等。这样看待科学和假设，看待科学的假设和实践，是否合适，值得探索。

列宁同民粹派斗争时，阐发过这些问题。

列宁引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原理之后，他说：

"……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

根据列宁所说：

这个假设得出"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

其次，"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

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素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列宁继续说：

“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阅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列宁说：

“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经指出这些思想。……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继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

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须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

这样，在这个伟大的“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面前，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还不差一点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这种先验论的议论的毫无用处”，“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

列宁就是这样论述唯物史观由科学的假设发展为“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的发展过程。除了随意臆造、胡思乱想的先验论，科学的假设是科学成就的一个必经阶段。

社会科学是这样，自然科学怎样呢？

恩格斯举过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有名的例子：

“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万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设，这个假设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几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设；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恩格斯又举过一个如下的例子：

“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哥白尼的世界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设，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烈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

总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恩格斯以下这样的论断：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设”。

再以毛泽东同志所发展的军事科学为例。在十年内战初期，经过战争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进我退”的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或许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这还是处在假设的阶段，但这是科学的假设，在实践上证明是胜利的科学假设。随后，又经过实践，经过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同志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就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是由科学的假设到科学的成立的一个重大的经历。

这里所以说起这个问题，就是为的说明科学的假设并不是先验论，科学的假设也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而在社会科学上、自然科学上那种随意臆造的先验论，应受到责斥。

还不完备，有的还不完全确切，还有所偏差，要有所改正，有所补充，有所完善，……这些在提出某种论点的时候，都是不可避免或者很难避免的。毛泽东同志说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名言，对任何科学工作者都适用。

大错大改，小错小改。同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天才能够越出这点。

这里的标准，始终是实践。

列宁说：

“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

当然，实践标准是包括自然科学的一切部门的，包括如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所引用过“六〇六药品”这样的一个例

子。

实践的标准衡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衡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任何新学说从假设到成立的逐步发展的全部路程。

接触大量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界现象，搜集和分析“堆积如山”的材料，这是一种实践，一种很辛苦的、长期的、同时是多方面的深沉的实践。没有这种实践，就不可能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形成达尔文主义。

生活、实践——永远在发展过程中，因此，人们如果不愿落后，对事物的认识，就只能随着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加以逐步地掌握。

伟大的模范，例如，列宁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就继续马克思《资本论》的事业，“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说：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

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样，人们对事物要思索，要从科学的假设到进一步获得事物的充分论证，到进步对事物作科学的充分说明，就不可避免经历思想的“烦恼”。因为想打开事物的“秘奥”，这种“烦恼”就是有益的、积极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论《易》初稿

一

马克思说：

“计算是摇摆于感性和思维之间的理智的第一种理论活动。计算是小孩的理智的第一种自由理论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策一卷三六页）

现在试说一下中国人作为历史上儿童时代的有关这种活动的问题。

中国原始的书是《易经》。甚么是“易”呢？什么是“八卦”呢？

“易者，象也。”（《系辞下传》策三章）象即“形”，即事物的图相。“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同上，第一章）“八卦”即概括“象在其中”的中国人第一种自由理论活动。

八卦是由“——”和“——”两个记号作成的。这两个记号，分别叫做“阳”和“阴”。

这两个记号是数的记号；把这些记号序列成形，成为八卦。这八卦的“形”和“数”——或“数”和“形”往复演变，演成六十四卦。“穷则变，变则通”，能够继续演变。

“易有太极”。流传的易太极图就是阴阳二者弯曲构成的。“太极，无极也。”（周易序）太极而无极，即太极包含无极，无极包含太极。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曲折交错，不断一分为“八卦”是现实世界在中国人儿童时代头脑中引起的想象物和创造

物，但在中国历史上却被颠倒过来，脱离现实世界，变成历代中国人礼拜的神秘物。

二

历代流传下来的《易经》有两部分：其一是是《易经》本身，其二是为《易经》作传的《易传》。《易传》说到“八卦”“制作”的经历：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系辞下传》第二章）

从这些话看，八卦是来自外在的现实世界，但却没有认为八卦是中国人长期的历史经验发展的产物——即没有认为是来自人们实践逐步形成的产物。

《易传》在上述的半截话之后，接着又这样认为：中国的农业、渔业的生产，从事这些生产的工具，人们的市场交易，等等，都是神人——名叫伏羲、神农——从他们制作的八卦中取来的。

真实的历史被这样颠倒了：现实的世界倒是来自八卦的抽象形式，而不是八卦的抽象形式来自现实世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上说：

“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产生的。但是，正如同在其他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一五七页）

恩格斯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八卦的“形”和“数”的概念发展真实史的钥匙。

三

中国人在历史上的儿童时代，曾有自己杰出的造就。世界不同的民族在他们发展的儿童时代，根据自己的特殊条件，在某些方面，或某个方面，会有自己突出的造就。例如，大家熟知，古代希腊在哲学上、艺术上的造就特别突出，到现在还在世界上留有余光。世界其他各民族，如印度，也有自己比较突出的造就。中国《易经》里的八卦的“形”和“数”——“数”和“形”，当中国人的儿童时代，直至以后长时期的岁月里，大多当成迷信的玩物，但其中什至也有些颇为出色的原始辩证法观点。

想到《易经》和近代科学有些关系的，是近代人。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几位外国科学家。首先是微积分的创造人之一、德国的莱布尼兹，而后进一步地把这事介绍给我们中国人的，是英国的李约瑟博士。科学没有国界，这话是不虚的。

周士一、潘启明二先生合作的《周易参同契新探》一共对此有较周到的说明，如下列：

莱布尼兹“在他对中国的研究和发现中，有关《易经》图象的数学翻译，即二进位制的翻译”。（该书第四页）

“二进位体系的第一次描述，是在一六七九年由莱布尼兹笔之于书的。标题为谈二进制算术。”（同上）

“莱布尼兹于一七〇一年四月将他自己所作的一个二进位的

表达给鲍威特（到过中国的那稣会传教士），《易经》卦爻与二进位数字的同一性，才被确认。”（同上书，第五页）

李约瑟博士又引证一位科学家如下的意见：

“后来的发展表明，莱布尼兹的二进位数学远远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古玩。……二进位制被发现为今天巨型计算机的最合适的体系。……除了发展二进位制数学之外，莱布尼兹也是现代数学逻辑的创造者和计算机的先驱。”（同上书，第九页）

“我们看到他的关于代数语言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体户预示二进位制一样。”（同上）

当然，莱布尼兹的二进位研究成就开始是独立取得的，但《易经》卦爻的排列体系与二进位数字的同一性无疑对他有新的启发，使他产生了很大兴趣。同时，这也说明二进位制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四

恩格斯说：

“数学走到了这堡个领域……都采取了完全辩证法的形式，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觉地成为辩证法的数学家。”（《自然辩证法》）

易卦由“——、－－”这两个“形”和“数”的矛盾组成，或许可说，其矛盾点集中表现在“坎”和“离”这两卦上。坎卦表现阴中含阳，离卦表现阳中含阴。坎、离两卦各有自己的两重性。在人事上，凶中含吉，吉中含凶，凶可以变吉，吉可变凶，失败者可以变成胜利者，胜利者可以变成失败者，比如，纣克东夷，以陨其身，——卒败于周武王。

在六十四卦中，例如，泰卦和否卦，损卦和益卦，既济卦和未济卦，这些卦名就是互相对立，互相联系，互相交错，表现诸卦本身对立的两重件：泰有变为否的可能，反之，否又有变为泰的可能；损有变为益的可能，反之，益又有变为损的可能；既济有变为未济的可能，反之，未济又有变为既济的可能。

泰卦是“小往大来”，否卦则是“大往小来”，表现二卦走向相反的变化。

人们常说的“否极泰来”、“泰极否来”，就是从《易经》的辩证思想加以推演而流传下来的。

研究《易经》的人们曾经正确地用泰卦中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观点说明易卦的素朴辩证思想。

“履虎尾，选选，终吉。”（履卦）履虎尾，谁不害怕呢？但在从容、谨慎、勇敢从事的条件下，凶化为吉。“明夷”（夷，伤也。明而见伤）卦中彖辞列过的文王“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离”，箕子“内难而能止其志”。“明夷”卦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易》曾自发地反映出商周间这些有名的事件。

五

“日中则长，月盈则食。”（丰卦·彖辞）日月运行过了一定的度数，必然发生或（偏斜）或食（亏损）的变化。时间的变异，给人以空间的——日、月“盈虚”的消息。盈虚是对立的统

一，统一的对立。

“以同而异”（睽卦·象辞。同中含异，异中含同。这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的对立。

“山上有水”（蹇卦·象辞。山和水是对立的，但常常山上有

水，水上有山。对立的一方

含有对立的另一方，反之亦然。

“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卦·彖辞）

“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卦．家辞）、

险由动来，这是一方面；动和知（智）又能止险，这是另一方面。动和知是险和止险的对立的统一。

“革，水火相息。”（革卦·家辞）

“革，去故也。”（杂卦）

革即更代。水火相更化，所以成为水火。春夏秋冬相更代，所以成为四时。社会（或中国的朝代）相更代，如历史上所税的商汤更代夏桀，周武王更代商纣。这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生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家辞）我国史上这个革命的大词儿，先见之于《易》。

六

“生生之为易。”（《系辞上传》第五章）

“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同上，第一章）“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下传》策五章）自然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不息。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传》第二章）“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传》第一章）一切事物内部的不同方面都在相摩相推，而在不断变化、流动、转徙之中。所以，人对事物的认识，要“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同上，第五草）。彰是微的

对立面，不知微则不能知彰。柔是刚的对立面，不知柔则不能知刚。微和彰，柔和刚，都是对立的统一。

“有天他，然后有万物。”（序卦）“天下同归而殊涂”。（《系辞下传》第五章）或可说，这些是《易传》包含的原始认识论。

七

《易传》说：“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慸，渐者进也。”（序卦）物无止境。但仅是“量进”吗？

在渐进的一定程度上，会出现新的突变的跃进，即质变的跃进。

事物是数量变质量、质量变数量——二者的统一。

“序卦”这样结束：“物不可以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甚么是“未济”呢？我们看来，就是：物的数量和质量的继续互变。

八

中国古书上说过：上古之世，“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是母系氏族的特徵。但如《易经》所记，中国历史已在变化中。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恒卦·六五）

母系氏族制在瓦解了。对上古来说，就到《易传》所谓“中古”了。

《易经》一方面反映“干坤”的矛盾，另方面又倒映为“阴阳”的矛盾。中国传统的历史习惯，一直流传母系氏族“阴阳的痕迹。

按照《易经》记载，中国人当时已经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曾概说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分期法：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蒙昧

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易传》所说的“中古”，当属于“野蛮时代”。

九

易卦的“形”和“数”，包括《易经》中的一些原始语言，是中国人把当时的经验和想像集中起来，反映了中国正处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始变革之中的这样一个过渡时代。

《易传》则是在《易经》后的另一个历史时代的作品。

《易经》本身中的原始描述、想像、语言，其所反映的时代，是氏族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时代？或许是这样。

《易传》这样存疑过：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传辞下传》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同上，第十一章）

十

《易经》记述于商周之间，长期流传，经过了一些人手。《论语》记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现存的《周易》（不包括《易传》）本身，当是孔子在学易过程中整理过，加工过的。

《易传》可能为孔子所作。《系辞下传》还记过称许“颜氏之子”（颜渊，即颜回）的一些话。大约他的一些门弟子参与了他这个工作。

十一

“八卦”始于商。孔子临终时说：“予始殷人也”。殷商时代的“八卦”，无疑地对于他有过大的烙印。

司马迁《史记》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此乎？”可见孔子虽是殷商的后代，但并不讳言，在文化上，他是周文王的继承人。

孟子说：孔子是“集大成”者。“集大成也者”，“始，条理也。……终，条理也”。看来，就是对事情和问题的始终，加以条理化。《论语》记孔子和门弟子及其他一些人的问答，记他个人的言行，还说不上对事情和问题的“条理”化。孔子在《论语》中有一些近于辩证法的提法，例如：“过犹不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讷于言而敏于行”；“文质彬彬”；“温故知新”；“有教无类”；等等。但这些对问题都还说不上“条理”化。孔子“作春秋”，在历史上名声很大，但“春秋”只是对那个时代上属统治人物加以褒贬的汇编。孔子“集大成”，显出一部思想较有“条理”的作品，《易》的《系辞上下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其庶几乎？

《易》的八卦数学的发展，迫使那热心学《易》者，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农业时代的水平，当时他所能知道的某一定的自然事物，某一定的问题不自觉地走向辩证法的思维。

《易》的一定“条理”化，可以看成具有某些原始的、朴素的辩证法。当然，其基本是唯心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

十二

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孔子写“万世师表”，“至圣先师”。所谓“祭天祀孔”被看成大事。他们崇拜孔子的“礼乐”，对于《易经》则只作为一种迷信——卜筮的玩意儿。现在探讨《易经》、《易传》的目的，在于扫除原来封建统治者长期散播的迷雾，还其本来的原始面目。

中国有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礼教、反孔教的旗帜，是一个伟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打倒对孔子的偶像崇拜——即所谓“打倒孔家店”，表示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但并不妨碍对于中国旧文化（包括孔教）的探讨和批判。

十三

虽然孔子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归根到底，孔子学问的基本点，是一个“礼”。

孔子所说的“礼”，其用处是什么呢？

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可见，他的“礼”，是为的役使人民，为的作为“刑罚”人民的用途。

孔子认为人的一切都要受礼的约束。他对颜回（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对他的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学“礼”才能站得住足。

他周游各地遇了难，还“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他死了以后很久，司马迁记载：“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孔子对于“礼”，从少年时起，贯如是。鲁国一个“大夫”

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远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史记·孔子世家》）

所有这些，并没有甚么"学易"或"易学"。

孔修订过的"易学"，打倒了自己礼教的"孔家店"。

一九八九年三月起草

经济类

试说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不久前，看到报纸上发表《渗透日本社会的生产率运动》，我被这个题目吸引住了。日本原来是一个比较落后于各资本主义大国的工业国，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十多年来，一跃为头等工业国，它的汽车产品，简直风靡全球，迫得它的老师美国要和它低首谈判，单就这点，至少足够我国思索的。因此，文章作者写这个题目，是很可注意的。不过，读了以后，好像有点不足之感。

照马克思所说，（假如我的了解没有错），大机器工业，“存在着技术上的统一”，“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像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像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只要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资本论》一卷四一六、四一八页）

又说：“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心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在细节方面可以不断改进。”（同上，四一八页）

又说：“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魔力是由它的庞大的肢体

壮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同上，四一九页）

大概说来，机器生产按其发展进程，有一个体系，这种体系随着其发展阶段，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当然，在工业各部门之间，在各个国家之间，发展是不平衡的，有落后的跃向前面去了。在二次大战后，由垄断大财阀支配的资本主义日本，本国虽然资源不足，但利用美国的技术和资金，使战胜国为之服役。

论及日本工业的生产率运动，好像有一件事呼之欲出。

马克思说：“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同上，四二三页）探索日本工业的生产率运动，似应触及这个“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个条件似乎是电子技术装备的控制。

文章也说：“一九六三年在通产省的财政支援下建立起来使用电子计算机的企业经营情报处理系统，受托为企业各种业务活动进行计算、计划和情报分析，为企业或工会进行各种社会经济、劳动问题的调查、民意测验。”

文章所说的这类情报系统，当然主要是为日本如三菱、三井、住友这些垄断大财闭服务的系统。

文章没有具体提到和论及电子技术装备的自动控制的应用在企业物质生产条件中的作用，它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的作用。但照我十几年的前听说的，似乎这却是日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运动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同上。四二三页）我的乱

想，这话或可用在这里。现代机器这个客观的生产机体的物质条件，通过现代电子化的自动机体系，壮重而有节奏地旋转起来。照报上文章所说，“日本生产性本部”恰好是成了推进这个现代生产率运动的核心机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推进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工业。文章很正确地引伸毛主席平日的语言，“学生变先生，先生变学生”。这话或许将落在举国振奋的中国人身上。

以上一些有关日本的材料，仅是我的模糊记忆。是否如实，当然应该查证。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普遍化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份就超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份就越大。就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资本论》第一卷五七九页）

马克思在另一地方写了以下一段：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十六卷一二〇页）

上录马克思两段话，实际都是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时间节约问题，意思一样。马克思认为，劳动的普遍化是工作日缩短的绝对界限，由此，人们就得有脑力活动、社会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宽广范围。人们的劳动不会因此就到划一，毕竟还会有多有少，有好些有差些，但时间的节约，将会促进质的提高。按照劳动的质的同类性，将是计量劳动的前提。

一九三〇年在苏联时，得知苏联的劳动日由八小时改为七小时，看来，当时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这个行动，是根据当时工人的状况，并有马克思学说的根据。初到苏联，有时到校外散步，经常看见一些闲散人在莫斯科河的冰上，挖些小洞钩鱼，以后好像就少见了。在一九二九年前后，有时由学校派住工厂听工人开会讨论工厂的事，有时也在工厂吃饭。吃饭时，要自己拿饭票，记得饭菜一般不算坏，但肉类较少。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在天津一些工厂饭堂吃饭时，(特别是自行车厂饭堂办的好)，伙食就较好，要买甚么都可买到。根据当时在天津工人家属中的访问，有些老太太说，家人能劳动的，都有职业，虽则有的工资不算高，但合起来就多，所以大家还满意那时的生活。如果现在按马克思的提法试做，首先遇到的问题看来是全国就业的情况和前些时候曾经发生通货过多的问题这个困难，当然会使工作不易。不知可否先作某些个别，局部的、暂时的试行和调整看看，假使通货问题和工资分配不相抵触，同时，家庭就业者得到一种安排的协调，使每个家庭总合起来看，都能有所得，而不是有所失。还可考虑，在得到工人群众的同意下，有计划地，有条理地，有控制地，也即是有条理。有利，有节地，与通货的数量相适应地，(不搞通货膨胀)，清理那些作风不正的份外之财（就报纸

看，似乎数量颇不少），用来补充就业的工人，这将可得群众的欢心。

一九八一年八月间稿

劳动时间问题和苏修帝国主义

前有一次，曾写到关于劳动时间的问题，其中，说到我在苏联时期，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将苏联劳动时间由八小时，缩短为七小时，促进全国就业和生产力的发展。

苏联有两亿多人口，它要维持生产，同时保持和发展庞大的军队，近多年来不断派出大量侵略军到世界许多地方，又在全世界遍散它的特务网，从哪里挤出这许多人来？我曾想到苏联劳动时间或有新的缩短，而性质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完全不同。

劳动时间的缩短，虽然在不同的制度，依条件的差别，而有不同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缩短以外的时间，在于促进脑力劳动和其他的自由活动，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明。但已经变质的苏联，却利用这种缩短了的时间，把大量的人送到国外从事武装侵略和间谋活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为巨大的侵略力量，成为威协世界的超级大国，这是世界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表现一种社会的蜕变，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蜕变。

据说，苏联的劳动时间，现在是六小时，问题的实质，可能就是这样。

马克思论机器体系

马克思在写机器体系的一些论点时候，电力的技术革命还没有出世，更不用说电子的技术革命。马克思说的机器体系，还是蒸汽机时代的机器体系。尽管是这样，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的作用及其发展前途的预见，即它最终将导致这样的结果：

“资本……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正如资产阶级经济体系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那样，它的自我否定，即它的最终结局也是如此。”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工农业的生产在前进，但还是落后的。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最新的自动机器体系，将是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迅速前进，克服落后，赶超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认为，生产力包括科学在内，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人口众多，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难点。积极运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工农联盟的巨大优势，尽可能地及时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恰是解决这一难点的基本条件。

是否可先作一些试点，先抓一些试点，系统地改革原有的机器体系，进行设备更新，同时，合理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调节劳动时间，例如，工时由八小时变为七小时，甚至六小时，或每周六个工作日为五个工作日。这样，可以安排更多的人就业，

同时，使工人有充分从事科学和各种学习及其他活动的宽裕时间。所有这类有目的的学习，或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或各种艺术和体育的活动，是能够，也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和经常地考察的，从而可能获得有效地、出色的成就或成果。

这样做，将促使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并进，促使劳动、智力、体力同时并进促使人民大众同伟大的党和国家团结得更紧，而归结起来，将是全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对自然界的统治。

因为我的见闻很狭隘，上面所写的，或许不完全正确，写出仅供同志们参考。

马克思列宁论劳动生产率

——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关于中英两国劳动生产率的比较说起

“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曾创造出同等的价值。但的，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差别，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

这就是说，在当时英国人的蒸汽车机时代，一个英国人的劳动生产率等于几百个中国人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当时中国人口有四亿，但是要有几十亿的中国人的劳动的产品的价值才能抵得上当时几千万人的英国人的劳动的产品的价值。

在鸦片战争中，一个人能纺出几百磅棉纱的英国人终于打败了一个仅能纺出一磅棉纱的中国人。而就人口而论，中国在世界上是大国，英国不过是个小国。

在现在，时间过了一百年，中国人也使用机器，有蒸汽车机，也有电力机，这些已追及前时的英国人，虽然也可能还有手摇纺车。但是，世界又已经过一些重大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的变迁。我们不妨拿中国和日本比，和世界几个资本主义大国比，（也可以仅和日本比），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如马克思说的，还同它们存在着“惊人的差别”。

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关键就在这里。"

列宁又说："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伟大创举》）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寥寥数语，揭穿了实质。

马克思当时所说的"大得惊人的差别"一语，对我们来说，等于是一个警告，是叫中国人吃惊，而列宁所说的"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等于指出我们应力求走上的道路。

劳动生产率，包括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要有产品的正常的，以至优良的质量。坏的、蹩脚的产品，等于废品，等于浪费生产资料，等于不生产。

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要产品能不断优胜于资本主义。这不能一蹴而就，但正如中国人所常说的"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或所谓"点滴不息，石头可穿"。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恩格斯论工业发展和城乡融合问题

恩格斯论述工业生产本身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是促使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的消灭。

恩格斯是从蒸汽力的发展谈起并论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趋势的。当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说到马克思对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他感到衷心的喜悦，说到马克思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估计到科学的发现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将产生的革命的影响，毫无可疑，电力的发现和发展，是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工业生产本身将促使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的历史趋势和其心然条件。电子化的使用和发展，对这点也作了最新的证明。

恩格斯说："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甚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一种花费许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高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宿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

历史的发展，总极其曲折。在资本主义大国中，蒸汽工业、电力工业、电子工业的发展，却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局面，极大地加剧城乡的分离和对立。乡村所需要的产品，包括农业机械和肥料等，在大城市制造，其他农村必需品，也是从城市中来。有人口在千万人以上的城市，多少摩天大楼，高耸入云，污染成为对

人的极大祸害，清水变成毒水，浊浪激空，臭气薰天，如此等等，真是恩格斯本人还没有见到的“恶性循环”。

物极必反。恩格斯说得很对，而且只能这样：“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充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

我们中国很幸运，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行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可能及早避免资本主义大国的那一切恶性循环，建设一个伟大的、洁净的、社会主义的城市和乡村的融合。

我多次读过《人民日报》关于建设小城镇的一些报导和文章。显然，这些是很好的。我觉得按照这些报导和文章，调节城市和乡村的建设规模的关系，缩小大城市建设的偏颇，将是很及时的。

原来的县有多少大小不等的小市，农民进市，几乎半天之间亦可来回，或许这些可能成为建设小城镇的一种自然的或许是局部的条件。

积习难返。要这样做，特别是有调节地、有秩序地、有条不紊地、无伤害地、不乱哄乱动地缩小大城市建设的偏颇，像党中央近几年来一种重大的号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这里也是很适用的。从首都做起，从各省市的大都会做起，形成一种潮流、一种习惯，形成一种必要的稳重，不做任何轻举妄动的事，这样，想来事情是比较容易做开做好的。

记塘沽工人的话

似乎是在一九七〇年期间，我到过塘沽参观那里的造船工业，听那里的工人们说，塘沽港小，不能造几十万吨大船，山海关水深，是一个很好的港口，可造几十万吨的船只。为此，我曾到山海关看过。在庐山会议上，林彪骂我“尽瞎说，世界哪有几十万吨的船只?”可是，过了不久，我似乎从报上看到日本造有三十万吨的油船。

我很闭塞，这件事也不复记得。最近报上有一些文章谈过工业怎样“吃得饱”的问题，因此，偶又想起塘沽工人说的话。造船工业似乎是国家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的工业，也是和钢铁工业有关的工业，并且，这是同国际贸易联系的工业。回忆塘沽工人的谈话，虽已不能都记得，但所提问题或可注意，谨写上供参考。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

——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甚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甚么劳动资料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文本二〇四页

一

“出路在于革新”。“不革新则灭亡。西方一个国家——西班牙（算是“中等国家”吧）有些人这样说过。作为一个不甘落后的国家的人如此看待自己的问题。

“本世纪内，电子工业如果不占优势，下世纪在世界竞赛中会吃败仗”。我国有的经济专家这样预言过，或许是对自己国家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警语吧。

简言之，“所有工业国家都得同技术突飞猛进和过去向未来的痛苦转变进行搏斗”。

问题的关键在电子工业革命。由于它的出现而不断产生的新一代商品，物美价廉成为摧毁一切关隘、一切长城的新重炮。

一个日本人这样摆出问题：

“电子技术是产业的火车头”。

电子工业发端于美国。

日本人是从美国学习得这个电子技术的。

“美国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获得英国纺织蒸汽机的技术工艺。现在日本公司只需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分析和复制出美国用

在电子机上的微型集成电路块。日本先进技术的应用要比美国快得多。”

“现在美日正在竞争研制新型的超电子计算机。美国人认为日本人的计划是跳蛙式的，要越过美国计算机工业的水平和破坏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

日本人在技术上的“跳蛙”式成就，已使美国“希望从日本得到武器技术”。

一个原来的战败国，在三十余年中达到的技术成就，甚至使原来的战胜国对之有所要求。

这真是“跳跃式”的，说明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不论其国的大小和它原来的强弱，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跳跃的。

弱者可以变为强者，强者可以变为弱者。

二

现在不少国家吵嚷的所谓“新产业革命”，或许可以说，其实不过是电子学革命的一种延伸，一种继续；是它由浅入深，由较粗的进到较细的，由一个较低的阶段进到一个较高的阶段，由应用在不大广阔的范围将进到非常广阔、甚至难于预测的、日进不已的范围的过程。

由于能够大大节约能源、节约劳动、动作敏捷，而且物美价廉，所以电子计算机的技术将被普遍利用。

人们都知道，“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向大型高速方向发展，而且出现了新的发展方面，就是小型化和微型化。小型和微型计算机进一步开辟了新的应用范围……微型机将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目前还难预料的影响”。

电子计算机是广大和精微的对立的统一。

“……由于集成电路和微型电子计算机是非常小的东西，所以不那么明显。就是，在人们还不觉得的时候，确确实实发生了革命性的行动。”

“电子计算机正在潜入人生活的各个角落，那怕需要强烈灵感的艺术领域，也被钻进去了。”

三

“目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盏明灯，是微电子技术。”其实，这盏灯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互相吞并、渐入末路的黯淡路灯。

试举以下几例，可以窥见电子技术发展的迅速，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日两国的竞争，则彼此一会儿忽焉在前，一会儿忽焉在后。

其一：日本富士通公司采用超高速、大容量大规模集成电路做主储元件，使这种电子机的性能达到一秒进行五亿次运算，从而日美各企业之间的开发竞争似将进一步加强。

其二：事情还将更大大地前进。据共同社报导：六家生产电子计算机的日本公司参加研制一台在一秒钟内能演算一百亿次的“超级电子计算机”。这台超级电子计算机将提供气候研究、核聚变、设计电子计算机之用。预计实现这一计划需要一亿美元。

其三：工业用机器人原先是美国发展的。据美国机器人学专家保罗·阿伦过去一个时候的估计，“日本现在使用的机器人的数目达到三万六千台，而美国使用的机器人的数目仅六千五百台”。

其四：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本国的电子计算机工业。但是，

本国市场却主要被像国际商用机器工业公司这样的美国大公司……和日本的富士通公司所控制。……为了对抗美日计算机公司的竞争和减少对进口高级技术的依赖，今年九月，欧洲各国工业部长在雅典商定要奋力争取早日制定欧洲研究情报技术的战略计划……

四

当然，电子工业有它的产生和发展的来历。正如列宁说的："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着'发展到无'的运动。不过，'从无开始'倒是没有的。运动总得是从甚么东西开始的。"

电子工业出现之先，牵牵大者，有蒸汽机之类的机器大工业，有电力工业。没有这些伟大的先导，就不能有电子工业。电子工业总是从这些发源，而不是从无发源。但历史事物的发展，在各国家中却是不一样的，是很不平衡的。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也是工业发展的常事。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实现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大家熟知这些发明都开始在中国，但几百年来，中国是多么落后呀，多少次挨打呀！机器工业的发源地英国，现在的境地又如何？记得列宁说过俄国人的一句俗语："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美日在电子工业上的竞争，取决于两国间以至各国国际间的各种条件，结果如何，当然有待历史的分晓。

五

马克思分析机器由三个不同部份组成："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传动机构……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

机上，……机器的这一部份——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

毫无疑义，马克思这段关于机器工业本身的三个组成部份，有机地联系这三个组成部份，综合这三个组成部份为一体，自动地对生产过程进行调节，进行控制。

电子自动控制，根据企业的发动机、传动机、工具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联系，按计算程序工作，快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一本小册子这样简要地说过：

“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如采用一系列电子仪表、自动装置、以及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生产线，自动化车间，这些工厂从原料进厂，产品出厂，都是自动化或全盘自动化的，能够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率地进行生产。它应用于国防工业，可以使武器实现自动化与全盘自动化。如导弹武器，从基地发射，沿轨道飞行到准确地命中目标，都是自动进行的；无人驾驶侦察机，从起飞、侦察、返回基地，也自动化了。”

这是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对企业发动机、传动机和工具机引起的一元化运动。

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不局限于一个企业，一个小局部。

“例如，综合自动化的钢铁联合企业，从矿山开采、选矿、冶炼、轧钢、剪切到包装、运输，都是实现最优控制的大系统。”

根据日本的材料，试举一例：

“川崎制铁水岛工厂，从一九七四年就采用了使用大型计算机的彻底控制系统。其结果，创造出在轧制工厂中成品率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九三的世界记录。……据说美国成品率的平均数是百分之七十强。就平均数而言，日本超出了百之九十。它不仅降低

了成本，而且在节约资源方面所产生的效果也是极大的。”

电子自动化控制，翻开了各国各种产业——包括了重工业和轻工业，也将要包括农业——的新一页。

所谓“机器人”，被称为“极重要的生产工具”。它能起极大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照人们说，它不过是“科学家通过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创造财富的”一种物品。但所谓“科学家”者，首先是不断劳动者的长期实践经验，他们才能创造出这样一种物品。

六

过去是日本人追赶美国人，而现在却出现一种苗头，美国人反而在一定方面追赶日本人。

美国人说，“日本是最难对付的竞争对手。”

美国人说，“从经济和安全观点来看，在计算机领域中的某些方面的差别，是区别第一流强国和第二流强国的标志。”这是针对美国同日本的竞争而说的。

由于采用电子技术，而使日本货物美价廉，纵横于国际市场。“美国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进口货现在占到美国消费品的百分之十九，而一九七〇年只占百分之九。一度曾集中在像衣服和玩具这种简单劳动密集的产品的外国者，已经很快登上工业的阶梯。美国进口它的百分之二十八的汽车，百分之十八的钢，百分之五十五的消费电子产品和百分之二十七的机床。这些工业碰到的挑战首先日本，现在也来自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区。”

“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怎样地把先进技术用到传统工业中。”（注同上）

美国工业的产品，曾经因它的先进技术，物美价廉，泛滥全世界。但是使用过去的技术，已使美国的产品（如著称于世的汽车之类）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失去了夺目的光彩，反而使美国本国成为日本冲进的市场。

美国人说：

“美国工业正像昆虫一样在蜕皮，抛弃旧技术，发展新技术。但是新皮尚未长硬。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工业——主要是计算机和微电子学，有机器人、纤维光学、长途通讯、生物技术和异乎寻常的新材料——还很年轻。它们尚未发展到修补由于老化企业——钢铁、化学、汽车等大烟囱工业企业——的衰化所造成的就业机会减少和工业产量下降的地步。”

这个作者及其同类作者都是资产阶级学者，因而不能把历来资本主义发生十年左右危机乃至近来三、四、五年间发生的危机联系起来观察问题，而仅限于就技术谈技术。但是，作者所谈技术的作用，值得注意。

“蜕皮”，就是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旧皮要换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皮。这个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与日本的经济竞争中将使用“有力的秘密武器”。甚么是他所说的“有力的秘密武器”呢？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人作为资本和一个能最大限度利用这种资本的社会”。

其实，这个美国人所谓美国资本的“有力的秘密武器”，不过是资本主义历来在不同形式中所施行的自由竞争和垄断两个阶段都使用的“武器”。

正如列宁说的：“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

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在资本主义各国中，有它们的某种形式的差别：有的对封建残迹重些，比如，保留君主制、寡头制其例如日本；有的甚至没有这种残迹，如美国。这就是这个美国人所谓美国人的有利条件是它属于“开放的社会”，即列宁所说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看来，这就是作者所谓的“有力的秘密武器”。

说的真是没有秘密的秘密。

列宁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分析，证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是这样写的，现在已过了六十年，但资本主义世界——突出的，如美国和日本，依然故我，而又甚焉。

竞争变为垄断，垄断变为更剧烈的竞争，美国和日本的资本统治也就是这样发展的。技术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影响和加强这种局面。

七

列宁引用过一位教授的话，其中说：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带来了垄断的趋势。”

电子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剧烈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垄断的这一个赤赤裸裸的事实，但大不列颠已局促到后面去了。

资本的垄断等于对市场的垄断的竞争，等于商品的竞争。如下例：

“日本企业在市场畅销的产品，至多两、三年就要革新一次，平时还不断革新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有时一种产品刚问世，企业又在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新产品，使产品不断更新。”

“日本企业家感到，如果不以技术开发为基础经营好的企业，在当代就无法保持竞争能力，因此，企业研究开发部必须不断从事技术革新。日本重视高级技术的开发，主要理由有三：1、高级技术开发能使企业发展快，还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2、企业拥有高级技术，能降低成本，提供价格便宜的新产品；3、具有关键性的高级技术，一旦取得新的突破，可使许多有关企业受益，提高生产力，使产品在国外市场具有竞争力。”

据文章说，以上这些是美国企业家对“日本企业经营术”的观察。

可见，产品革新有依赖于不断的技术革新。像北京过去流传的“沙锅居”店的肉汤所以保持美味，是由于“汤底不断地相传自明朝”这类神话，早已站不住脚了。不仅如此，就是近代相传的某些企业技术延长不变至数十年或近百年，虽然还可动作，也早已老朽不堪了，怎样能谈到与现代企业的技术并驾齐驱呢？

中国有句俗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话似乎也认为事物是可以跳跃的：不是从“中”取法，而不从“上”取法。要学技术，以至攀登技术的高峰，日本人能，我们也能，以至全世界的人都能，问题是要得其“法”，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补充，加以发展，这本来是学习的规律。自卑或自傲，则都不足有所作为，都是没有前途的。

八

一个法国人写的《世界面临挑战》一书，其中写过“美国国家基金会”的调查，据说，“调查的答案是：技术革新”。该书叙述了美国自一九二九年以来“这一漫长时期的工业成就，依照它们的工业技术水平，进行了比较”。

作者写道：

“集中利用最高工艺技术的工业与整个工业相比：

生产率提高了一倍；

生产增长了二倍；

价格上涨率降低了百分之五百。”

作者随后又说：

“这就解释了为甚么必须立即把力量和投资集中于发展新工业技术上，必须毫不犹豫地用更新型的、性能更好的机器取代现有的机器。”

日本在某些技术上已超过了美国，前面曾提到汽车一项。《世界面临挑战》一书大书特书这一件事如下：

“经过几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的汽车工业已经打破了所有的出口纪录，特别是美国的纪录。但是，即使把汽车的产量全部加在一起，日本仍然不是世界第一，从来没有人把这一称号从美国那里夺走过。到一九八零年，这一称号被夺走了：日本工业生产了一千万辆汽车……从而跃居世界首位。而且，日本工业出口的汽车占产量的一半，这也是一项绝对的纪录。”

在叙述这事的时候，该书大肆描述似乎“神奇”的机器人。我们在前曾提到过：所谓“机器人”，不过是在电子工业中，在

以微型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工业中，劳动者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的一种高级新形式。中国有句老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于所谓"精诚"，指的应是人的不懈努力，只要有人，不论任何民族，任何种族，只要持之以恒，就没有任何科学技术是不能掌握到手的。

九

法国这位作者认为，现代出现的新技术将使后来者在工业发展的道路上一改旧日的观点。这主要是由于微处理机的发展。

"一种过去未被认识的、不起眼的、取之不尽的物质——沙里的硅，经聪明的人加工后，成为资源的资源。这种人人都能得到的硅，从今以后成了新工艺技术所需要的唯一的物质。它与氧气一样，最广泛地存在于宇宙间。它是一种普通的沙，就是海滩和沙漠里的沙；整个地球的一半是沙子。"

"微处理机这种用沙子制造的、吞噬人的智力的小机器，使人重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此，第三世界也应当下决心跨入这个新纪元。它不必预先经过准备阶段，因为那将使它更加落后于人。"

美国以它的硅谷著名于世界，现在有些国家也在搞起自己的"硅谷"。但我们中国的"硅谷"在何处呢？探索、物色、适当建设一个中国的"硅谷"，我想，这是我们中国科学家们为伟大的祖国开发新工业、新工艺所应赋予极大努力之处。

十

关于"自动工厂"，马克思有以下一段话：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头来考察机器，就会发现，与机器相适

应的生产方式在自动工厂中获得最纯粹、最典型的表现。……自动工厂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完善的生产方式，而且它是成为完备的机械体系，要靠人的劳动来完成的个别过程越少……它也就越完善。”

“总之，机器本身体现出：“生产的连继性（也就是原材料加工所经历的各阶段的连续性）；自动化（只有在排除偶然故障时才需要人）；运转迅速。由于使用机器，更可以进行同时作业了，例如，在制造钢笔尖时，机器在一次运转中就对钢“坯”进行切割、穿孔和开缝。”

马克思的伟大科学远见，道破了机器工业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趋势。百年来，机器的式样、巨细、各部份之间的关系大有变迁；而三十年来，这些都和电子自动化，产品的大革新，相互联系。

电子自动化技术创造的生产率压过了一切。现代机器工业的生产连续性和同时作业的运转迅速，一般说来，都表现了电子自动化的一些新成就，而且因之诞生了航天工业和种种由电子自动化技术控制的新工业。

《世界面临挑战》记了一个法国人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最有希望接替电子时代并创造新的活动领域的科学是生物学。这门科学还将影响到食品、卫生和能源等广泛而又重要的领域。”

如此等等。

且看吧！

十一

因为电子学的突飞猛进，人们盛称人类智力的不尽的创造

力。

人们往往把手和头脑两者彼此孤立起来。其实，没有人的手，就没有人的头脑的进化——也就失却人的智力。

恩格斯关于人的手和头脑的问题做过如下的解释：

“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具有决定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

“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份地借助于手相应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可见，人第一是手。先有手，先从事劳动，人的脑随之发达，而后反转过来，脑影响了手。由于劳动，人获得一层又一层的智能，逐步假手改造世界，也改造自身。由于劳动，手和脑不断结合，又不断矛盾，而后又不断结合，如此循环不已，提高了，前进了，没有底止。

正如马克思所说：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的物质，人就使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他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的控制。”

电子学也就是把人类自己在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

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的控制。”

电子学也就是把人类自己在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是人类的手和脑的一次新结合；一次新矛盾，将引导一次新矛盾的解决；而不是凭空地出来甚么“智力”的神灵。

十二

人们说，“现在工艺革命不过是进行新的探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是的，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一种工艺革命的开端，而且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

我们将有更伟大的征服自然的前程，这必然是摆脱资本主义限制的前程，必然是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前程，必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初

附：参考材料

一九五七年、日本颁布《紧急发展电子工业特别法》

日本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把发展计算机列为重点发展项目，并颁布了《紧急发展电子工业特别法》。

一九六一年，日本成立了电子计算机公司。

它们分别集中人力财力，研究攻克技术难关。

（《经济参考》，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评美国人的两本书

（笔　记）

一

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四月说过：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徵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徵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一百几十年前，马克思好像是对着我们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而说了这番话似的。

这是马克思一个演说。马克思往下继续说道：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马克思并不是中国人所称的“卜卦”先生。他把问题看得这样全面，深远，而且事实越来越证明他的见解的正确，因为他以严格的科学立场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解剖了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不能逃脱自己的命运。

二

面对着二次大战后生产力在新水平上的发展，主要是已经出现的电子工业的发展，电子学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冲击。资本主义

社会中一些人感到：

“面对着一个吉凶莫测的未来”。

“忧心忡忡”。

“他们固执地认为，现实是荒谬、疯狂和毫无意义的。在某种广泛的意义上，生活可能是荒谬的”。

“等待他的未来却是坟墓”。

他们的精神失常，“孤独”，“空虚”，“思想崩溃了”。

“他们陷入迷信的偶像崇拜和巫术的集合之中”。

他们开始求救于花样百出的迷信团体、宗教团体。“这些信徒、教派和社团……在美国是最多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也领先二十年。”

恰恰是电子技术原来领先的美国，竟领先出现了所谓“人民圣殿”教徒们在南美圭亚那实行惊人规模和惊人残暴的“集体自杀”事件。

三

电子学在人类生产历史上已经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美国人所写的两本书，其总的观点是谬误的，但也提供了电子技术发展的许多事例，值得重视。例如，其中写的：

“电子计算机对时间所起的深刻作用，越过人们想像，成为社会上最重要的计时工具。二十年来电子计算机科学所用的单位，经历了从千分之一秒到十亿分之一秒的压缩。如果一个人一生为八万个工作小时（每年二千小时，四十年），现在可压缩为四点八分钟。”

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四月九日致恩格斯的信这样说过：

“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天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像：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一天等于二十年，多么伟大的预见呵！

到了今天，大体可说，露出头角还不算很久的电子计算机时间表，竟是一天等于或稍多于四十年。

假使马克思活到今天，对这件事将会如何高兴呀！

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竟有人在人类巨大跳跃的进程中企图南辕北辙，想倒退到一两千年前的时代。

四

马克思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致恩格斯的信曾经指出，工业革命和自动机溯源于从古代继承下来的钟表和水磨。

“……在十八世纪把自动机器（特别是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

“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和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人的劳动……”

资本主义的工业“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以前我们常常说的工业革命，指的是这一时代。这是第一次的工业革命。这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之一，是“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但蒸汽车机的利用受到地方条件的限制。电的发现，可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恩格斯说，“这的确是一次巨大的革命”。

恩格斯说：

“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了地方条件所规定的几乎是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消除城乡对立的最有力的杠杆。”

当然，工业革命不会从此终止。如恩格斯所说，电的利用，“使一切种类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把它们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同上注）这样，就为电子学、光学的发展开辟了异常广阔的道路。又经过了六七十年，继电子革命而起的以电子学带头的一次新工业革命像一阵巨大的波涛，开始席卷全世界。任何民族如不甘落后而灭亡，都不能无视这次新工业革命（或叫做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五

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及亲自看到当代电子学、光学的革命，但他们分析、预见了工业发展的必然规律。例如，马克思以下一段话：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驶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中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序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现在美国人写的书本所说的“为无生命的环境输入智慧的关键是电子计算机”，也正说明，电子计算机只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手创造出来的驾驭自然的人类头脑的一种新器官。它的成就是空前的，可决不是绝后的。

六

如列宁所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电子学等工业的出现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新的不平衡。

美国人写了如下的事实：

“一九六〇年美国在制造业方面，占有世界市场的约百分之二十五。

一九六〇年，在重要的美国市场上，美国公司生产的汽车、钢铁和电子消费品，占销售额的百分之九十五。

不过那都是昨天的事情了，今天美国不再能主宰世界经济：

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间，美国的生产增长率每年大约下降百分之一；一九七九年生产增长率下降了百分之二。

一九七九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刚刚超过百分之十七。

一九七九年，美国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下降到汽车的百分七十九，钢铁的百分之八十六，在美国售出的电子消费品中只占不到百分之五十。

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工业领导国，它的钢铁和汽车生产都超过了美国。根据每人所得计算，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美国大致相当，但日本在增长率方面占优势。美国能领先，只是因为其经济规模较大而已。日本是第一，不过它只是一项衰退比赛

中的新世界冠军。

但这并不表明日本取代了美国的地位。因为日本同样受到新加坡、南朝鲜和巴西的挑战，这些新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使人眼花缭乱。”

这倒是说到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在使人眼花缭乱中没落下去的大趋势的哀音，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惜。

七

美国作者这样自相矛盾：

他们一方面夸耀：

“过去曾有大英帝国日不落之说。今天太阳在大英帝国是落下去了，但在数十个全球性公司帝国，包括美国的……西德的……日本的……等公司的天空，太阳永不落下。”

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在哀叹这些“全球性公司帝国”的太阳也正在落下：

“工业文明正在消失。”

“西方正在日趋穷途末路。”

当然，这也算是“夫子自道”吧。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往往掩盖了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抢劫别人财富”。

美国作者“开始搜寻甚么是真正的东西”。

他们主观的论点是：“我们生活在工业化最后的无可挽救的危机之中。工业化时代消亡于历史之中，一个新时候诞生了。”

但他们究竟发现了甚么“新时代诞生”呢？

他们所谓“诞生”，却是梦想死人的复活；他们所谓“新时代”，却是一种“旧时代”。古老的鬼魂，在美国这两个作者的笔

下再现了。

八

美国作者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叫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美国作者说：

“美国的工业社会要让路给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大多数人要处理信息，而不是生产产品。”所谓“一个新社会”，就是他们所叫的“信息社会”。

好大的“新发明”！好大的口气！

这两个美国人都说，“早在一八五五年就有能比一个人快一百二十三倍的脱粒机”。但他们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电子计算机效率、功能的飞速突破，却认为是甚么“工业文明正在消逝”！

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不能够说明、也不懂得甚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叫人莫明其妙，发明“一个社会”，叫做“信息”。

电子技术是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新发展的一种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手段，如前面所述，是一种“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

它围绕于生产产品而起作用，围绕于生产的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而起作用。

电子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一种尺度，是生产产品时间节约的一种尺度。离开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离开为生产产品服务，离开它对于社会生产的巨大促进的功能，“信息”的寄托何在呢？附丽何在呢？怎样会有一个单单“处理信息”，而“不

是生产产品”的一个甚么“社会”呢?

九

恩格斯在马克思坟墓前的著名讲话中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

最近出现的所谓“信息社会论”,它不正是想掩盖人们必须吃、喝、住、穿这样简单的事实,从而抹煞“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吗?

所谓“信息社会论”,也应算是一种新的芜杂的的意识形态吗?

所谓“信息社会论”,也应算是一种新的芜杂的意识形态吧。

其实,“信息”的存在,不是有了人类才开始的。例如,在植物界,含羞草就具有信息的感应性。在动物界,老鼠有表示预感地震将来的动作。蚂蚁“对紫外线非常敏感”。蝙蝠能发出和接收超声波。如此等等。植物界、动物界有这种或那种的不同类型的信息感应性,但又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书中关于生物学的一段札记中所指出的:

“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

这样,在“信息”问题上,很清楚地划出了人类同动物的界

限。

十

马克思论机器体系时说：

“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析和运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证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

往下，马克思又说：

“机器体系的这条发展道路就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

马克思继续地说：

“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抄略一些词句——作者注）……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

如上述引文，马克思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写的《经济学手稿》在指出“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

决定因素”的同时，也清楚地指出了：由于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大工业的发展将是：

一、“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

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

三、“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

但是，两个美国人却把这些工业上现在已越来越清楚地体现出来并且正迅速向前发展的水平当作“工业文明的消逝”而哀叹！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同一事物的看法是如此不同，他们之间的世界观、历史观，这样明显尖锐地对抗着。为甚么呢？

十一

在资本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

工人用较短的劳动时间创造的财富，即足以抵偿资本家那里所付的动力价值（工资是其表现的形式）。

“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

事情如马克思写的：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

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

十二

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个人的劳动和社会劳动和社会劳动的问题，马克思作了如下的阐述：

“……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主要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

“……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

劳动资料的自动化过程，如马克思在一百几十年前所说，“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单个人的劳动……成为社会劳动”。大工业活生生的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着的。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以严谨的科学分析驳倒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两个像煞有介事地大喊大叫的西大陆作家。

两个美国作者所想像的，符合处在穷途中的资本梦想。他们梦想：结合的社会劳动将瓦解，单个人劳动会重临。他们梦想：

“恢复工业革命以前曾经盛行一时的生产制度，不过现在是建立在最先进最尖端技术的基础上。”

“背道而驰。”——他们企图走的历史道路。

十三

两个美国作者如是想：

“个人化代替了普遍的或大众的时间表”。

“电子家庭是否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典范”？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人们会想到一个不寒粟而的哲学问题。机器会代替一切吗？”

面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程，无产阶级总是充满战斗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胜利的信心，但是美国作者的资产阶级哲学，却“不寒而粟”。

难怪，在美国，“学校里宗教信仰得到恢复。有二十五州在辩论学校里应否准许进行自愿祈祷，张贴十戒和进行静思等”。

十四

美国作者咀嚼着下列的一些事实：

一、“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小企业：在美国一千一百万家企业中，有一千零八十万家是小企业。”

二、“小城镇的兴起”。“自从一八二〇年以来，乡村地区和小城镇的人口增长率第一次超过了都市。……虽然在都市或近效区居住的美国人仍然超过乡村……但关键在于乡村人口增长得更快。”

三、“我们正在把工厂和工作人员送回乡村”。

四、“手工劳动在遭到三百年歧视之后，再度受人尊敬。”如

此等等。于是，美国作者得出结论：

“一个必不可少的认识是，工业化这场“戏”算是“谢幕了”。(着重线是评者加的)

可是，不管你能列举多少事实，——这些事实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复杂性、变动不定、甚至有某些相仿佛的反覆现象——但人们却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世界以下这个根本的、特大的事实，如作者所写：

“任何机构都不像大公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它是二十世纪新时代者还说：

“我们的工作才干和能力在公司里获得鉴别，我们与其他人的社会联系，大部份也是在那里形成的。”

这些大公司正是垄断资本操纵中、小工业命运的主人，是君临整个资本社会的网。

美国作者承认美国这个现实：“目前的制度不平衡，对大公司有利。”何止有利而已呢？中小工业仅是垄断资本的点缀，它的附属品。问题是企业资本所占的比重，而不论它们企业的数目的多少。

作者所谓大公司是“二十世纪新时代的政体”，即垄断资本的政体，即美国现在的政体。

也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如美国作者所说，“新的全球经济是被大的跨国公司控制”。

十五

美国作者却异想天开，要在上述垄断资本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超工业社会”，建立一个“明天的‘既是生产者又是消

费者’的经济”，叫做“产消合一”。

他们的妙语是：“新出现的文明……它既有高度的科学技术，同时又是反工业化的。”

他们的办法是：“我们将在家中花钱租用电子设备的办法，为自己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

说来说去，原来是资本主义早已有之的、在资本控制下、为服务服从资本主义剥削规律的家庭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上曾指出过：

“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步加工。”

美国作者笔下所提的花钱租用电子设备的家庭劳动，只能是在现在条件下，大公司——即垄断资本开辟的一种更广泛的剥削形式，实际上附属于资本家的大工业，而并不可能出现一个的自给自足。这两个美国人所云云，仅是他们自已空想出来的，便招摇过市，这恰恰是在为垄断资本服务，想为资本制度避免衰落和灭亡的命运寻找出路。

十六

其实，大、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来都是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垄断资本从来支配中小企业，也不断吞并中小企业。它们制服中小企业，使它们成为大企业的附属品，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能消灭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中有的破产了，有的被吞并了，但有的又会再产生出来。在资本范围内，中小企业的存在，适应大企业的需要。

电子等技术被广泛采用的时候，中小企业也有采用的方便条

件。美国作者说："美国小企业的大量增加将为电脑提供巨大的市场。"但是，作者应该知道，这件事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社会主义制度的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相比，完全异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毛泽东同志说过，是：大、中、小企业，按照社会主义的计划规律，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即"发展生产，保证供给"。在这里，中小企业不是大企业的附属品，而是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份。在这里，大、中、小企业之间也会有矛盾，常有矛盾，但不是采取对抗的、你死我活的形式去求解决，而是要互引学习，"取彼之长，补我之短"，采取企业间的互助合作的形式去解决。

在社会主义的城市之间，同样地存在着大、中、小城市的有机结合的问题。社会主义不能片面地、畸形地扩大大城市，因为这不利于全国整个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农业的有计划发展，不利于消除城乡的对立，而且会更扩大城乡的矛盾。大城市规模的必要限制和必要压缩，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避免片面发展的长远方针。

十七

恩格斯很早在《共产主义原理》著作中设想过：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原来是农村出现了社队工业。一些地方，有些著名的社队，工农业并举有某种初步的成就，发展了农业，又发展了当地的工业。工农业并举的生产力的初步发，当然直接影响——初步提高社队

的全体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些社队吸收了从大城市（例如上海）退休回来的工人，他们在技术上起了显著作用。在我们的社队中，我们开始初步看到了恩格斯说过的“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济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

在广大的社队中，亦工亦农，或者称为，亦农亦工，这将会在社会主义中开辟普遍工业高涨和普通农业高涨的道路。农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但农业的发展，将来用较少的劳动（在国家援助下，农业将集体使用机器和发展自动化），就能养活全社会。在农业劳动之余，就地从事工业劳动；也在工业劳动之余，就在从事农业劳动。按照具体的情况、时间和条件，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之间采取必需的分工分业，可合可分，而又可分可合。劳动者互相交换生产经验和技术经验，互相促进。在这样的前景下，生产将会大发展，而现在的农民用不着拥挤到大城市中来，从而能够逐步地解决工农的矛盾，解决城乡的矛盾。

这全然不是美国那两个作者所谓“超工业社会”，也不是他们所谓“反工业化”。恰恰相反：没有工业化，没有高度工业化，就没有这样的前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

社会各种产品多种多样，千差万别；适应社会需要，交换将存在下去，而不是如美国两个作者所奇奇怪怪幻想的“产销合一”。

十八

美国作者喋喋不休：“感到精神上如此空虚与沉沦，好像生活在混乱和咆哮和思想漩涡之中。互相冲突和矛盾的观点，震撼

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

写的正是当代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

作者说：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反抗运动的开端，目的在于推翻统治了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工业时代的主要思想，正在失去信任，不受欢迎……”

资产阶级转而反抗资产阶级曾经进行过的革命。这些资产阶级代言人赤裸裸地反抗资产阶级过去的黎明。

当几百年前西方资产阶级处在新兴起的时期，“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如恩格斯曾经热烈给以欢呼的：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启发了人们走向唯物主义，成为欧洲各国唯物主义兴起的先声。唯物主义就是这个划时代的伟大思想革命的旗帜。

马克思说：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

恩格斯说：

“法国唯物主义者……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

列宁说：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

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

唯物主义正是大工业诞生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

现在有两个美国人“数典忘祖”，却要否资产阶级有过的那些光彩的历史。他们认为“工业时代的主要思想正在失去信任，不受欢迎”。他们叫喊“反工业化”。他们追溯到“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要搞一场什么“反抗运动”，针对的，正是大工业诞生和资产阶级革命和思想前驱。他们企图推翻“三百年前”在意识上曾经为大工业开路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

旧的宗教已屡次败阵。但他们希望的，是“新的宗教将会产生”。“天苍苍，野茫茫”，归根到底，他们还是要去求救于中世纪的死魂灵。

一九八四年五月

本文作者的一个重要声明

我在起草这篇文字时，所看到的（也即所根据的），是中国公开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的两本译文本。现在看到我们报上对该译文删节真相的简单揭发。在我们的译坛上出现这样的事，真没有想到。这些揭发，对于我们的理论事业是非常有益和极为重要的。

报上揭发的问题，是我的这篇文字没有涉及之处。我手里没有英文原本，而且我也不懂英文（几十年没有接触了）。现在把两篇揭露原书的文字照录如下，以补拙文所缺，并改我的重大疏忽之过。

两篇文字是：

一九八五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吴大琨：《不要盲目引进西方经济理论》

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第三版，高放：《知识价值论不能代替劳动价值论》

“改革问题”等等

一、质量第一。这应是企业改革严格规定的一条。凡是不合国家规定质量水平的次口即废品。一切企业，一切工作部门都应按这一条审查自己。

参考材料：

“质量圈产生于美国……现在几乎人人都承认，日本之所以享有在控制质量方面达到最高标准的声誉与质量圈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生产力能的优势悄悄地消逝。高质量的进口货在美国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而美国公司最后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们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加强工人参加的大门才打开了。在此以前搞的是老一套的社会变革。”

（美国人的《大趋势》书一八七页）

二、采取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有用东西。

例如关于泰罗制，在几十年列宁说过：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列宁选集》第三卷五一一页）

“泰罗制”或许已过时，但列宁的话，重点在学习。

三、注视并适当地实施世界上一切出现的技术。

电子技术问题已为大家注意，但国家应有集中的机构来制定进行的计划，以监督、帮助的方法，有步骤地把计划贯彻下去。像这样的变革，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机构，缺乏既谨慎又勇敢的精神，似乎办不成大事。

报载：“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正在联合研制世界上第一台光学计算机。科学家认为，光学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要经电子计算机快几百倍。”

欧洲各国在电子工业发展过程中原来比较落后，但现在正在振作，想变落后为先进，跃在美日的前面。英国皇家学会公布这事，很值得注意。

既然资本主义欧洲各国能够急起直追，而且有跃在更前面的气概，我们不妨拭目观之。这类技术是可能的。应向他们宣布这个更为先进的技术学习。

四、关于“特区”的事，我仅在报上看到一些消息。我想，或许这似乎类似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经提出过时“租让制”。关于这问题，列宁说过：

“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利益和损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上规定一有先期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实知道先期赎回的条件。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款’，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在租让制方面，任务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当订立租让合同时，一切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而订立之后还要善于临督该合同的执行 这里困难无颖是有的，而错误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选集》第四卷，五二一页）

不过，据我听说，苏联实行“租让制”似乎有过一些波折成就，但并没有很大的成就。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对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心存“警戒”。

我国已有的特区，如广东、福建几个地方，我想华侨的投资，或许是主要的。许多有钱的也可能有有限度的投资。

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特区”投资问题，似乎还在观察、试探，既在权衡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将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也在权衡国际间的重重矛盾。

似乎很可注意法国和我国之间的关系。法国离我们较远，对我们较少国际上的重要矛盾，关系较好，如果它在技术上有重大的突破，我们可能较便于向他学习。

五、发展我国的工业经济，归根到底，是自力更生，埋头苦干。发展大、中、小工业，避免过大地扩大大城市，发展小城镇，而在农村，实行农工业并举，发展社队的原有的工业，也利用利技术的限休回乡工人发展新工业，算是一种有计划的“百花齐放”。中小企业和社队企业的技术，依照经济规律，都可以逐步由低到高，由旧到新，有计划的推广适合于类工业发展的新技术，例如电子等等技术。

伟大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也将由我国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的结果来决定命运。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长　思

似乎在几年前，从报上读过这样的消息，即孙冶方同志说："曾有日本人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指工业），需要一百年"。当时讯了这个消息，有点感触，为之惆怅多日。

轻侮（蔑视）中国人，原是外国人一百几十年来的习惯。但是，过去有些中国官僚在侮辱自己民族方面，比那引进侮辱中国人的外国人，说得更加肆无忌惮。例如：清朝末年一个小说家叫李伯元的有部笔记描写清代那些黑暗透顶的官僚，其中写过当时一个略有名气的驻日本的官僚，他"尝谓人曰，外国人纵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然我中国作弊之法，彼仿效一千年，亦不能到这种精明地步"。（《南亭笔记》卷十三）这个老官僚从自己的角落，直率地吹嘘"中国作弊之法"为外国人一千年所莫及，大言不惭，"其然异其然乎?"但他的语句之间能否刺痛中国人的思想吗？或许该够刺痛的。

中国人在几十年前摧毁了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国人开辟了向前跃进的大道。当然，世界本来没有一条不是或多或少的曲折的路。作为一个备受过苦难的中国人，主观上总是希望这样的路不要过长。但是，事情也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试举如下列的一个例子：据日本《朝日新闻》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一篇文字写道：

"福建省厦门市是中国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但为特区最重视的'外资'却很难引进，步子很慢。……在湖里工业区，等待外资企业进去的五层标准厂房林立。

但这些厂房几乎全是空的，因为同外商的谈判没有最终达协议。

去年十一月同美国系统的华侨资本——王安电脑公司签订了在厦门建设生产个人电子计算机工厂的合同，已过去一年了，但还没有安装机械……

日本企业一定也没有进入厦门。……”

不知日本报刊是否故意夸大其词。但像这类消息，总使人不断发生“自力更生”的长思。于此可见，“引进”（特别是高级的、重大的、带骨干性的技术并不是可以轻得的。

《北京晚报》今年一月间连载“北京钢铁学院机器人研究室的成功之路”，所记同志们的热情和求实的态度，读了使人深为感激。

海外出版过一本小册子说了这件事：有人指出，“十九世纪是‘工业欧洲’的历史，二十世纪是‘工业美洲’的历史，而二十世纪将是‘工业亚洲’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或可能是这样。

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一九八三年九月间）

（一）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对待农民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合作化、集体化的过程，无产阶级要对农民提供社会的帮助。

马克思驳斥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时有过一段话："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有向集体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

无产阶级当权以后，应当怎样处理工农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这里给了很明白的启示。

恩格斯在《法德民间问题》上说"我们对于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

恩格斯又具体地说到援助的问题：

"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受它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只是限于金

钱，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工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在十月革命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列宁“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强烈地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这些思想：

“国家帮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如果国家不帮助各种集体农业企业，那我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就是不拥护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之所以不能不这样做，也因为这是同我们的整个任务符合的，我们深知这些协作社、劳动组合和集体组织都是新的创举，如果执政的工人阶级不支持这些创举，那它们就不会成长起来。……”

列宁在演说中说到了工人政权已拨出了十亿卢布 的基金来帮助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

但是，列宁也忧虑这种经济帮助——经济优待可能引起社员“靠公家养活”的错误想法。列宁认为，“必须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会在每个公社中，在每个劳动组合中看到国家政权所扶植的某种东西，在其中找到新的耕作方式，……在实际生活中表明它比旧方式优越。”

列宁要求的，是：“在实际上证明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都真正比所有旧企业强，证明工人政权在那里帮助农民。”

列宁要求的，是：“要很好检查，弄清楚这个新的社会制度真正表现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才能向农民证明按协作原则和组合原则新地比单干好并不是由于有了公家的帮助；要很好地向农民证明，没有公家帮助，这析制度实际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这样，列宁全面地论述了合作制、公社制的道路问题：无产

阶级国家必须支持合作制公社制的创举，包括无产阶级国家的各种经济上——物质上的帮助，同时，要向农民证明，“没有公家帮助，这种新缺席实际上也是能够实现的。”

（二）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当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时间不久，在没有“公家帮助’的条件下，在还没有机械化的条件下，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实现了农民的合作制、公社制，突出地证实了列宁的科学预见。

一个新制度的诞生，不能没有经历诞生时的各种不同的痛苦。尤其是母体本身具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痛苦时间较长，或犯剧痛，有的要施行不同的手术，甚至有流产的。

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诞生，有它的特别便利的条件，但也有其诞生的痛苦。

中国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获得解放，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的压迫下获得解放，便觉得如起死回生，希望充满大地。他们在各种的革命事实中受了教育，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对的，号召的对，做的对，错误也能改成正确，碰壁也能变成坦途。农民从无产阶级这里找开自己的眼界，农业合作化就进行得很顺利。原来像“一个个马铃薯”的各个农户，由互助到了合作。这个经历仅仅几个年头，不是勉强做到的。或许可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件非常伟大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的精神波及全社会的面貌，波及工业和商业，波及全社会的风俗和习惯。它在实际上提醒人们：凡事总要考虑左邻右舍，不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之间的共同利益。

惟其是历史上这样伟大的社会变革，所以，也就不能没有挫折，不能没有反复，不能没有发生大大小小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是正视错误的。不正视错误，结果就会走到反面，转而把正确变为错误。

（三）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遇到根本的困难，是“农业的落后性和分散性”。

按照农民的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本性，它是保守的，惯于坐井观天，怕火伤及手指。在农业合作制、公社制建立以后，农业生产由于“集体力”而有所前进，但还是限于手工的操作，事实上等于近似“工场手工业”的时代。工场手工业，对于手工业来说，是个大进步。在这历史面前，有待于机械化的出现，但这却需要时间。这需要有公家的物质帮助。

毛泽东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作中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先合作起来，经过近似“工场手工业”式的经营，而后逐步实行机械化历史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是正确的，是合乎历史规律的。但那时，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在农村工作部兼任过一名工作人员的人，却未能随着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的发展，而进行如何在农业合作化中作机械化的具体实施的研究。我作为农村工作部一个人员来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四）

小生产者——小农在内，而且在农民中占特大的数目。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分化逐步加剧。正如所说的：

“无论在工业中或者在农业中，中小型经济单位的比重都在降低，只有大型的比重在增加。

换句话说，无论在工业中或者在农业中，大生产都在排挤小生产”。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说：

“小块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这是小生产者的致弱点。

假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属于国有制，能否使小生产者避免分化的命运或者没落的命运呢？

一九一五年，列宁就美国的农业所作的分析，说：

“一个大国的某些区域没有土地私有制，不但不排斥资本主义……反而会扩大资本主义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又说：

“即使土地私有制不存在——事实上美国大多数地区直到现在还没有土地私有制——，只要个别业主保有土地，就会产生垄断。”

列宁说的，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思想。（列宁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曾经简单介绍过马克思关于土地国有问题的论点。）

“小农业日益遭受剥夺”。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的区域也同样。

“总的说来，把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同一时间、同样性质的材

料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尽管农业极端落后，然而工农业的进化规律是很一致的。工农业中的小生产者都受排挤。”

资本的网，把小农笼罩在自己的统治下，在美国非常突出，不论是或不是土地私有制。美国酱对农业的统治，列宁有如下的话：

“……上面引用的材料根本不能证明农业生产在现在的发展阶段上不能社会化。谁掌握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美国三分之一农户，也就间接统治着这些农户的全体群众。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能上能下的百万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经济结合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情况下是绝对办得到的。”

这里说的，是垄断资本的统治。很清楚，一旦无产阶级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就能够逐步把全部农民组织起来，开拓出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道路。

（五）

道路曲曲折折。小生产者本身的摇摆状态，在我们的活动中不会不有所反映。

或许可以把我们在走这条大道的过程中所犯过的错误，概括地说是在有些方面急于求成。我们在一些工作上忘记毛泽东同志平日关于“突破，取得经验”的教导，在一九五八年匆促办共食堂，没有根据地提高工农业的生产指标……等等。在乡下时，我听南一个老农的评语：“好心人，但做错了”。这是充分信任我们党的农民的好意批评。

没有条件而“大炼钢铁”一事，也是错误的。同志们的批评是对。

1973－1978年	1．8	1．6
1965－1973年	5．3	2．4
1950－1965年	5．2	3．0
	农业	制造业

但在人民公社中，主张农业和工业并举，却是合理的。根据相当一批材料看来，为着发展农业，可友这样做；为着发展工业，也可以这样做。好如恩格斯当年设想："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人民公社中出现的社队企业，它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当然，事情如做得粗率，也就不能成就。

只能循乎规律，逐步探索，逐步前进。

（六）

马克思说过，工业和农业的发史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时期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以后，生产率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增长起来，虽然速度不同。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历程，证实了马克思的分析。

例如，手头上有这样的材料，说明美国农业与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同一本书有另一种材料说明，由于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美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能够供应消费的人数：

一八三〇年，供应四点五人；

一九五〇年，供应一十五点五人；

一九六〇年，供应二十五点八人；

一九七〇年，供应四十七人；

一九七九年，供应五十九人。

同一本书作者引述了马克思这个意见：

“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愈多。”

对现在的我们说来，要向着这样的目标前进，必须从近似“工场手工业”的阶段逐步转到机械化，在无产阶级政权的帮助下，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经过试点，在可能条件下，逐步推广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业。

一九五八年，曾一度出现“一轰而起”的情况，其错误，“欲速则不达”。所以，必须反复说这一点：从试点开始，随之逐步而进。这样做好像慢，但农民群众从中不断取得经验，其实将是快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所提的帮助问题，是对集体生产的帮助，是对组织起来的集体农民，在遭受意外的困难或“天灾人祸”时，无产阶级国家是决不会坐视不救的。

（七）

世界上工业先进国在农业上使用的拖拉机、收割机、载重汽

车等等农业机器，我们当然都要逐步采用。但科学技术在不断前进。机械化正在走向同自动化的结合。

这或许将是我们农业技术发展的一种可能的趋势。

一本日本杂志的文章写到：

“利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作物生长环境，提高生产率的农业自动化浪潮正在给日本农业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

这篇文章引用一个经营温室的农民说：

“进行大规模改造和引进微型电算机的结果，使得栽培变得容易的，并且取得了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效果。”

一本英国杂志写到：

“目前的自行式农业机器将来可能被高架式固定机道装置所代替。农业机械装在高架上，可作横向移动，也可随高架作纵向移动……”

“高架机械操纵是从反映播种的种子数量、播种深度和土壤状况的显示器上，并记录在纸带上。工作日结束时把它输入电子计算机中。”

以上言论，在他们的国家，有的已见之事实，有的或许还是在试验中的假设。但电子自动化技术在世界许多国家使工业大大改变面貌，也迟早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多方面，卷进农业中来。

（八）

国家帮助农业的资金，应该有集中点，即集中用于发展集体的生产，帮助集体生产从类似“工场手工业”式过渡到集体生产的机械化……。但是看些材料，似乎现在有的地方把国家资金个体户或多或少雇一些人，而按情况看，只要他在经济上能够

步一步地获得，雇的人也会随这而增加，并成为他的私人经济的主要机成。

有人认为扶助个体，可快发展，集体太慢了。

若然，个体经济是多少千百年来的经济单位，那时，虽有很少很少的富人，而大多数人呢？

有的个体，为了发财，善于“经营”。集体是新事物，经验要逐步积累。因此，集体要善于学习，并且要向个体方面学习一些东西。

小生产者的家长和制习气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摇篮。集体向个体某些方面学习，也是为了克服个体习气，是为了杜塞从个体方面来的官僚主义侵袭。

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业小生产者，他们都是劳动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同盟军。他们的劳动通常是很刻苦的，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是小生产者，他们又有个人发财的癖好和欲望，而且有的为此不择手段。

顺便举如下一个地方的材料：

“社会员贷款，占发放农牧贷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五。”

就是说，给个人的贷款占国家放出贷款的主要部份。

“有二十户社员将四千多元的国家贷款转手存人信用社，获取利息。”

就是说，有的人不是把国家贷款用在生产上，而是作为个人获取集体利益的手段。

“有六户牧民用贷款卖回二十六匹马，却将十六匹转手倒卖，共牟利一千多元。”

就是说，有的人利用国家贷款去作转手倒卖的手段，而发了

财。

以上例子，只是随手举出。

当然，可以说，这些只是农民中的小数，对的，这些少数。循此发展下去，也还将是少数，历史的趋势亦可能发展为少数的更少数。但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避免的。

（九）

土地经营由散到集中，有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集中：土地从分散的小私有者手里，集中到大农户的手里，这是一种，土地从分散的小私有者手里，集中到集体群众的手里，成为集体生产的农场，这是另一种。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也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也罢，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上述两类土地信中，不管谁在意识上愿意或不愿意，谁在主观点是怎样想的，都是或这样那样的客观历史发展规律。

合作化把土地集中起来，从事集体生产，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群众的产物，是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阶段引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在它领导下的革命农民大众，就不会有合作制和公社制，这是很清楚的。但事物不会依人的一厢情愿。事物按照自己的规律，会有这样或那样、或大或小的反复，像开车的一样，有时向这边转，有时向那边转。

不久以前，土地分块承包到户，分散经营。但是，现在看来，有的地方，又开始出现一种土地集中。不是回到集体的集中，而集中的新的大户。当然这些现在开始出现的苗头，但是，这是会晤得加以探索的。

例如，不久以前，在报刊上看到一些材料：

一、“耕地的相对集中，是农村向专业化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有的一户经营的土地比过去一年生产队经营的土地还多。”

三、“转让承包地的农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无劳、缺劳的农户……二是从事多种经营或工商业业的专业”

四、“江西省南昌县南新公社大港大队有一户社员，去年除承包三十八亩责任田外，又投标承包原先亏本的八十九亩水田，全年共收粮共收粮食十二万多斤，交商品粮十万多斤……”

如此等等。

富裕的，挤贫困的；劳动力多的，挤劳动少的；问路多的，挤门路少的。各人顾各人、各户顾各户的个体者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可免地出现这种局面。

今年八月间，报载：湖北沔阳县四万多亩农田却发现无人耕种的问题。这是土地集中表现的反面，其实就是一种土地集中的产生。

《人民日报》评论称沔阳县这事件是“一个警号”。这是一个警号。

在我们这里的问题，农业劳动一般还是依靠手工的操作，还没有机械化，耕作许多还是粗放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大农户就可能藉一定机会，依靠“转让承包”，而集中或多或少的土地，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有的还能购卖小型拖拉机，可农可商。而小农户则逐渐处于劣势的经济地位。为什么在某一个县里竟有农民放弃四万亩土地不耕呢？这的确是提出了问题。

或者是大抵稳定和陆续改善三十看来互助合运动形成起来的集体式的土地集中，或者是利用“转让承包”从而扩大个人承包的土地信中。问题好像是这样。

当然，土地集中问题不是农业发展的唯一标志。

列宁说：

“在欧洲，农业发展主要靠集约经营，不是靠扩大耕地的数量，而中靠提高耕作的质量，增加原有土地的投资。这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路线。”

我们这里农业发展“要靠提高耕作的质量”的趋势，路线却和资本主义各国背道而驰。在那里，路线是资本主义，而我们这里的路线是社会主义。

（十）

农村中有能工巧匠。在解放前，一般指的，是某些手工业者或如畜牧之类的个体农民或半个体农民。或者说，是半工半农、半工半牧。

能否把能工巧匠组织起来呢？

现在说把它们组织起来，在现在条件下，一般地是还没有使用机器的合作，即近似“工场手工业”式的合作。

是否会伤害生产力呢？

前面已提到“工场手工业”是历史前进的一个阶梯，这里就这一问题再谈一下：

马克思引了古希腊的一个小故事：“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这个鞋匠或许是我们所说的一种“能工巧匠”。可是，马克思说：“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

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组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

在集体合作里面，无疑是会发生个人和集体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惟一历史道路。”正是在集体内，可以充分使用各种能工巧匠的本事，也正是在集体内，能够把现能工巧匠的技能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简单的协作形式和工场手工业在提高生产力上的材料。

马克思说：

“……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的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但是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马克思说过这样一个简单而且使人易于了解的例子：“……总体劳动者例如用二十四只双手传砖，比单个劳动者每人都用两只手般着砖上下脚手架更快。”

尽管我们在过去工作上犯过错误，经过不少波折，但在手工业现在没有发展到使用机器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从简单的协作，近似“工场手工业”这个阶梯爬上去呢？

我国很多手工艺在很久以来即闻名于世界。这是中国手艺人的骄傲。但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中。中国手工艺是否可以再上一层楼呢。？

当然，这是艺术，要用对待艺术的态度去对待它。这要依靠手工的自愿，同时，要工人政权给予能工巧匠以可能的帮助、特

别是有利于他们工作条件和物质上的帮助。

城市和农村的的手工业多种多样。人的行业，或城市有，农村不一定有。反之亦然。但工人政权这一点是一样的：对城乡一切能工巧匠，都不能得罪，都必须让能工巧匠遵循经济的道路，依据自愿、互利、等待的原则，逐步进行可能的合作。能工巧匠也将踏上一般农民的道路：由于工业的合作，变为“工场手工业”，再变为可能和必要的机械化。在当前，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似乎可以先组织成为各种专业组等等集体小组，经过国家的帮助，再扩充为较大的集体组织。

似乎有人说这些是“空想”，是全国解放前夜党中央所批评的：“农业社会主义”

是否空想呢？

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给倍倍尔的信，其中论述德国的农业和工业以及当时德国政治的情况，最后说道：“可以向他们（按：指农业工人）表明，以后他们将在目前属于地主老爷的地产上实行集体经营。”恩格斯和马克思同是反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这里说的，是属于德国的事；而且，恩格斯多次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我在这里引他的话，或许被算为“教条”。但究竟是否“教条”，终归要依靠实路的考验。

（十一）

农业互相合作以后尽管有些苦难，但一般地说，除了个别灾难的年份外，农业生产——按照公开的数字——不是逐年降低，而是逐年有些升的。解放以来，我国人口增加一倍，但主要仍然

要靠我们自己养活，不能不想起这件生大的事实。虽然也购买些外粮。

是回覆为一个个的“马铃薯”呢？还是由工人阶级政权给集体经济以必要的帮助，而由近似“工场手工业”式的农业逐步进到机械化，从而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呢？

农业机械化在美国特别著称主世界。所以，我们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在大农户的机械化的道路呢？还是集体农业的机械化的道路呢？

苏联早已在集体农庄实行机械化。过去道听途说的，不少。最近美国一年“专门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经济学教授”说了以下的事实，纠正了一些人的偏见。

“……要看到，一个在国民经济总产值和军事能力上都仅次于美国的国家，没有个成功的农业部门作为基础是难于想像的。约七十年前，俄国的人口是目前苏联人口的人一半，每年生产的粮食约六千万吨；现在粮食年产量是那时候的三倍，人口是过去的两倍。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前，历届以来沙皇府从来不顾国内的饥荒而将三分之一的粮食出口。而现在，苏联政府每年从国外进口上千万吨的粮食，这些粮食主要是作为饲料喂养牲畜，以供应更多的肉类来改善人民的食物构成。目前，苏联平均每人消费的肉类数量超过了挪威、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和以色列这些被称为‘自由世界’的国家。”

这个教授又：列举了下列数字说明苏联的农业成就”：

“牛奶产量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三年为年产一千二百一十万吨；一九八〇年则达到九千一百万吨，成为全世界牛奶产量最高的国家。与苏维埃政权成立前相比，苏联的蛋类产量增加了六

倍多，棉花增加了十二倍。这些成就，是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不断下降下取得的。现在苏联农业劳动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前，这个比重是百分之七十六。”

这个教授还说：

“美国每年也要进口大时的肉类和乳制品，农场主要于受灾而遭受严重损失是常事，然而这并不证明美国农业是失败的。又如西欧每年进口的粮食远远超过苏联的进口量。”

我想，苏联的情况，是可作参考的。如毛泽东同志说过，巩固集体、发展农业的出路，是农业的机械化。或者还可以说，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的机械化的发，也可能发展为机械化同自动化的结合。

（十二）

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这当然是关系我国命运的一件大事，是松散的农民在新条件下重新凝结成为擎天大柱的大事。

中国百年中受尽外来的欺侮，重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农民如一盘散沙，在工人阶级领导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农民形成了伟大的团结。解放后，土地改革后，又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合作制、公社制的新基础上，形成了又一次伟大的团结、伟大的联合。

前一次伟大的团结，在历史已成为定论；后一次伟大的团结，又将如何呢？

历史正在继续作考验。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不管在走集体化的道路的时候，在探索这条道路的时候，我

们犯过多少错误，甚至有的地方犯过灾难性的错误，但农民并没有提出散伙，没有散伙的企图，只希望对大小错误给以纠正。我家在农村，有一年正是犯特大错误的时候，我根据当地工作的同志的意见，乘过路之便，望一望自己的家乡。当天看了一个刚在兴建的水库，时间耽搁了，结果父老兄弟们在小学校中饿着肚子等了大半天。我一天，大家对当地一些错误做法的批评如火箭飞来，简直招架不住，我只好说，我在几十年，不算是这里的人，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大家对此又攻了一阵。结果，我同意留下，大家表示不再吵闹。第二天，我和几冬天同路的同志下地挖地瓜（番薯）看，一挖，东西小得可怜，自己冷了半截。又挖别的地，也有个别不同的情况，但是差不多。要求特大的指标，而相反地，事物回答却是小小的。这就是那时“瞎指挥”的结果。我对此也很惭愧！我还兼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呀！临走的那天，同去的人都下地捡粪。当时连那位在开会时吵闹最厉害的老太婆也来抢夺我们的粪筐。……这是当时我经历过的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可以说明：组织起来的农民对我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并不含糊；但对我们这类工作者却是很宽大的。农民唯一的要求，是纠正错误并不要求解散合作制和公社制。

我想，到现在，这已建立起来三十年左右（不是一年两年，更不是一月两月）的合作制和公社制，已成为农民、各种城乡小生产者、包括许多城市人口—这样多的人们估量全社会问题，估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大大的尺度。党纠正四人帮对农业生产上的妄作非为，是很必要的，有成绩的，当然需要由此逐步合理地转入党的正轨。不过，有的人或不是这样想。那些只管“各人顾各人”、“一切向钱看”“投机倒把”、“歪风邪气”…等等，都

有一定的社会缘故。不是“无风三尺浪”。

大家熟知马克思一段著名的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十年左右形成起来的，为众所周知的人民工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制度之一——合作制、公社制、一旦有所摆动，怎能不影响社会一定的风气呢？农村风气有所改变，怎能不影响城市风气发着有所改变呢？

已为众所公认的国家基本制度、社会制度、似不宜随便改动。当然，在一定时间，按照社会需要，可以作必要的修补，可以有所损益。

附材料一件：有关互相合作几个文件的事

根据回忆（回忆只能供参考，因为时日已久，就可能记错），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定，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介议，并经过他的修改的。但文件内容并不是个人主观专断写出的“决定”首先是以华北（主要的）以及东北的经验为基础形成的。当时华北局帮助中央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到下面去，重要的农业模范耿长锁提供了很有益的经验。这个决定是华北局的调查组回来以后，经过华北和东北派到中央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反复讨论商量的结果。“决定”前面一段提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有两种积极性，即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党的政策是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加上的。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是纲领性的，不论理论和政策，到现在还在起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第二个决定上，又作了带根本性的一次分析，阐明克服农民两重性的社会主义出路。

第二个农业问题的决定，也是有同志到下面调查提供材料，

而后做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党中央这个草案。那时已设立了农材工作部，由他子恢同志负责。起草这个决定时，他不在北京。虽然中央已经通过过个文件，但毛泽东同志认为，还是要等他。他回来表示同时，文件就定下来，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当时在中央决定问题时是很慎重的，很民主的。

第三个决定，记得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同一些有关农业合作社问题的重要省份的负责同志讨论后拟定的。记得当时同志们说了乡下的一个“流行语”，大意是：“横竖是共产；迟共产，不如早共产。”这个流行语，表现了一些农民的急燥情行绪，表现了一些农民不愿意多拖拖拉拉。但第三个决定发出、实施后，照我的记忆所及，并没有损害生产力。当时农业各种生产，如粮食、棉花、猪等还是上升的。

记得是那年冬天吧，我在解放后第一次回家乡，目的是要了解农业情况，跟各种农民谈过话，除了有一个儿时晓得他是富翁，谈话很冷淡外，一般是很好的光景。是否强迫入社呢？

（解放后第二次回乡，所遇不同，前面曾叙述过）

我们在农业问题上经历了严酷的考验。毛泽东同志勇敢接受新事物，而当事情走过头时，他又勇敢接受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意见，实际上即是实行自我批评。不管是谁提出的。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对的就是对。比如，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原来是广东一个省委同志（安平生）说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复员军人提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个复员军人谈话的简单记录，立即批交各省负责同志在广州开会时讨论，记得列为这一次会方讨论的第一号文件。随后，这次会方做出“六十条”的决议。一个普普通通的复员军人的意见，就这样解决了当时在全国已成为难题的问题。

工业问题

（一九六三年开始起草。修改稿，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写得比较烦琐。文字节约些就较清楚。可惜二十多来年就这样过去了。

起草人注

一九八九年，一月

一、问题的提起

二、三个方面

三、很快赶上和超过的根据何在

四、世界各国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五、应当及时地抓什么突出的新技术

六、要发采气掘业

七、不割断历史

八、一线/二线/三线

九、大/中/小

十、技术发展的两种相反的社会道路

十一、工业和农业

十二、重工业和轻工业

十三、国防工业和一般工业

十四、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

十五、中央和地方

十六、汉族和少数民族

十七、企业的联合形式工多种多样

十八、科学革命

十九、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一、问题的提起

中国解放以后，很快地出现了工业突飞猛进的局面，仅仅几年的时间，工业的发超过了解放前的近一百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不但在革命中表达出来，而且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达出来了。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解放前已经预见，中国工业将在解放后，以别国不能比拟的速度前进。这个的预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完全被证实了。建设初期，我们不可避免要抄一些外国的经验。但是，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农业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及时地、独立地了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问题，找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这十大关系就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国际关系。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正确处理这十大关系，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要把一切可用的力量都调动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把我国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随后毛泽东同志指出，为着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打破常规。这就是说，我们发展工业所走的道路，应当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也要与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不但不能因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常规，也不能因循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常规，而是要根据新的条件，闯开出我们一个独创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使工业的发展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毛泽东同志指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摆脱精神上的一种被动状态，破除迷信，独立思考，使人们从还受束缚的某种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自然界的斗争，同样地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问题。他说，我们所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纲领，“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科，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不苦战，就不能胜利。”

毛泽东同志是从实际出发，来这样提出发展工业的问题的。

后来居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发展论。

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种基本观点而确定的。

二、三个方面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就建立起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速度是快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不断完善中。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是生气勃勃的。但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们要更好地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使我国再大踏步在前进，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工业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社会主义强图，最后根除资本主义势力，就必须继续妥善地解决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多快好省地发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第二，逐步地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第三，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活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充实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生活。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它的内容，正是包括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现在，进一步具体地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对全党全国来说，都是很迫切的。

三、很快赶上和超过的根据何在

我们有可能用不平常的速度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据何在？

由于我国消灭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制度，关于在我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一系列的新问题就产生出来了。其中，有些问题，在旧社会是被看成老生常谈的，而现在，却具有全新的意义了。

以下，说几个问题。

第一，我国人民是勤劳的、英勇的人民。

我国农民是以精耕细作闻名于世界的。我国手工业者创造的

大量工艺品，它们的精巧，曾经是盖世无双的。我国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许多发明，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旧中国的一个长时期中，是被压抑的，或者是被摧残的。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潜藏创造性和积极性，又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显露出来了，再发扬光大起来了。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因素第一。人类最主要的生产力是劳动者。中国的解放，首先是劳动人民的解放。毫无疑问，解放了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坚韧性的努力，会不可避免地创造出现代化的第一流的各种工业品，并且可能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上划出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二，国内市场。

大家知道，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主要的，是由于它拥有一个没有封建土地制度所开关的广阔的国内市场。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是由于有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所开关的比美国更广阔的国内市场。在没有封建土地制度的情况下，美国工业依靠国内市场，

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在实行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曾经是比美国更快的。

但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论美国也罢，不论苏联也罢，都没有一个像我国解放后出现的这样广阔的国内市场。

我国的国内市场，是经过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而接着又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所开辟的七亿人口的国内市场。这个市场，存在着提供很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潜力，同时，又存在着容纳无限量的工业品的潜力。

第三，地大物博。

我国是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世界最大国家之一。在我们国家里，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源，就现在所知道的，差不多应有尽有。这些资源，在过去几千年中，很少被利用，一直被埋没。我国人民解放以后，这些资源也被解放了。

第四，落后的两面性。

一两百年来，中国是落后的。这种落后，使中国人民遭到沉重的打击，受尽帝国主义的欺侮。对中国人民说来，这当然是不幸。但是，要看到落后的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落后，我们没有大量的资本主义遗产的包袱：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在解放以后，可以利用当代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文明成果，来开始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因而能够事半功倍地前进。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说得很透彻。他说："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第五，解放以来已经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

经过十五年来的建设，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是相当可观的。过去没有的工业部门，现在有了；过去不能制造的设备，现在能制造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有可能更好更快他前进

第六，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

百年来的深重苦难，锻炼出了一个坚强的，具有战斗性的中国各民族，尤其是锻炼出了一个坚强的、善于战斗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向志领导下，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坚决斗争中，形成了各个

战线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这个正确路线，巩固了无产阶级在人民革命中的绝对领导权。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之后，当然，新中国建设的绝对领导权，也只能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一九〇五年曾经说过：革命后的中国，“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孙中山所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是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提出这个看法的。这是孙中山的一个伟大的设想。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领导下，不可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更不用说起了。孙中山当时的设想，只能是落空的。

谁能够使革命后的中国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并且超过他们呢？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只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才能够真正这样做到。解放后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子能方面的第一步成就，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四、世界各国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工业的发展，是不是一定要套着人家过去的格子，按照人家发展工业的次序，一步一步地爬过去呢？

曾经有过这么一种说法，我们现在的工业技术还只是相当于外国的什么年代的水平，我们只能先赶多少年代，然后再赶多少年代。这种说法妥当不妥当呢？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要从我国的具体条件来看，还要

从世界各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来看。

大家知道，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时候，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

例如，德国工业的发展，在时间上落后于英国差不多近百年。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就是说，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德国的工业有好几个方面已经成为英国的劲敌，有的甚至超过了英国。一八七五年，德国的钢只有英国的一半；但是，经过了二十五年，在一九〇〇年，德国钢产量就跳到英国的前面。那时，德国还在化学工业方面处于特别领先的地位。

又例如美国，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北战争以前，工业的发展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经过南北战争以后，不过二十年时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国和欧洲各国。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曾经说过，美国工业的发展，“很快就会打倒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几年以后，恩格斯这个预言被证实了。

一些工业落后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一跃而为工业先进国，各有这样或那样的条件。

就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说，例如，德国推翻了封建割据而形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后，又经过南北战争，而形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国家，这都是他们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还有其它的重要条件。按照安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它们总是要掠夺别的国家，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等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加快自己工业发展的速度的。除了这些以外，它们的发展，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共同因素，就是采用外国的新技术，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有新的现象，新的发展。例如，法国、意大利、西德、日本，它们的工业发展，从速度方面来说，都显著地超过了美国。

它们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尽量采用二次大战期间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资本主义社会采用新技术，发展新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了阶级两极化的发展，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发展，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发展，总之，加剧了社会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生产关怀的矛盾，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危机。

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同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根本不同。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产生出自己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不平衡规律，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新的跃进式的规律。

社会主义各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它们的发展速度不可能都是一样的，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平衡的现象。在它们之间，落后的国家可能跃进为先进的国家，先进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落后的国家。但是，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和它的规律，这种不平衡现象，不是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平等的互相合作，互相促进，而得到适当的改变。当然，如果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地位，那又是另一回事。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觉地、有计划地利用社会主义的新的跃进式的规律，可以很快地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落后面貌，而其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做到的。例如，在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时间并不长，按照斯大林所说，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也正如斯大林所说，苏联实现这种高速度发展的可能，原因之一，是采用当时的新技术来武装自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也都在不同规模上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其中，有的国家比较注意采用新技术，因而较迅速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也有些国家，因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使那里的生产力的发展，陷于停滞和倒退的状态。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这样，就使那在旧社会不可设想的许多新技术，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战线上涌现出来了。这些新技术，有许多是采用他人之长，有许多是独创性的。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过程中，我国人民不愧为天才的人民。

在经历解放十五年、获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之后，我们现在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更进一步地具体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的指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这就是说，我们要按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要求，找出一条发展新技术的具体道路，逐步地、分别地、有次序地、有条理地实现我国的新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

民族的长处。

我们就是要把世界各国的一切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都接过来，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我国人民的独创性劳动结合起来，这样就会更快他发展我国的工业，更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各国工业的最先进水平。

马克思讲过，“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说来，总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这种考察与分析，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我们发展新工业、新技术的道路，也应当类似这样。

五、应当及时地抓些什么突出的新技术

我们要“赶上”和“超过”，要有的放矢，这就需要知道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在修正主义者控制下的国家的工业、技术状况。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二次大战后，世界出现的新技术和新兴工业，尖端技术和尖端工业，大都是发源自军工技术和军事工业。由于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利用，十几年来，许多原有工业部门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有了很大革新，同时，也形成了一些庞大的新兴工业部门。这些新技术和新兴工业部门，使得世界工业的面貌大为改观了。现在要迅速发展我国的工业，就是要尽量地利用这类新事物、新经验。

根据二次大战以后世界新技术和新兴工业发展的情况，根据我国工业发展的现状，我们所要进行的社会主义的新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应当及时地抓些什么突出的新技术？

党中央认为，要及时抓的，主要的是：

新冶金技术；

新机械制造技术；

新化工技术；

新电子技术。

（一）新冶金技术

同二次大战前比较，在冶金技术方面，氧气转炉炼钢、真空冶炼、连续铸锭等等，这些都是新发展起来的技术。

氧气转炉同平炉比较，具有生产能力大、投资省、建设快、成本低、质量好、劳动生产率高等优点。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他或者大量地采用这种炼钢方法。就是原来钢产量比较高的国家，也在积极地采用氧气炼钢技术。有些原来钢铁生产不很发展或者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采用氧气炼钢技术，钢铁生产就发展起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在全世界的钢产量中，氧气转炉炼钢大约是六千万吨，等于一九一〇年全世界钢产量的总和。

今后，我们要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无疑的，应当积极采用氧气转炉的技术。

这种新技术，在我国某些地方（例如在石景山）试点，是很成功的。还有的地方，利用老转炉加以改造，变成为氧气转炉，效果同样很好。

采用氧气转炉炼钢的技术，是不是要完全否定过去的平炉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对待平炉的政策是：

第一，积极改造。平炉要逐步他采用加氧的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鞍钢正在进行的这样的试点，就很有希望。

第二，充分利用。在炼钢的新技术还没有代替旧技术以前，太平炉没有技术改造以前，对现有平炉，必须充分利用，充分发

挥它们的生产能力，很好地注意安排。

采用氧气转炉和平炉加氧的炼钢技术，又充分利用现有的平炉，能够给我们较迅速他提供大量的普通钢。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足需要数量变多的普通钢的。但是，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追求数量。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六月的上海会议上指出："我们的钢，都是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是很重要的指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夺得钢产品的世界高水平。

氧气转炉和氧气平炉炼钢技术，比普通平炉能够提供更多的特殊钢和合金钢。我们应该注意发挥它们的这种作用。还要发展电炉炼钢技术，来提高钢的质量，增加钢的品种。但是，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的发展，要求有各种高温合金、精密合金和特种金属材料等新型金属材料，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发展家真空冷炼这一类更新的技术。

所以，发展黑色冶金，同发展有色冶金是密切联系的。存进行黑色冶金变革的时候，也必须进行有色冶金的变革。只有把这两种冶金工业的变革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建立起现代化的、完整的冶金工业体系，从而也就有可能把整个机械制造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新机械制造技术

机械制造就是生产工具的生产，按照马克思说，这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筋肉系统"。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早已经由党的政策定下

来了。在重工业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机械制造业，就是生产工具的生产。社会扩大再生产要有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主要的，就是机械制造业——生产工具生产的优先增长。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这个原理，我们不但在现在，而且存将来，都必须坚持。

生产工具总是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或多或少地，或渐进或跃进地，变化它的面貌。

就是存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是这样。

我国机械制造业在解放前是很少的，技术水平是很低的。作为机械制造业的系统来说，可以说没有。解放以后，我们迅速地建立了这样的制造业系统。我们已经能够开始自己制造许多重型机械和精密机械，开始自己制造汽车、飞机、拖拉机，以及冶金、电力、化工、石油等工业的成套设备，等等。

我们还必须掌握一切新技术，来发展我们的机械制造业。

我们要掌握什么主要的新技术，来实现我们现在所应当进行的机械制造业的革命呢？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逐步实现机械制造的自动化。

自动化的发展，是经过一些不同的阶段的，有它的低级阶段，也有它的现在比较高级的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小说过："自工作机不要人力帮助，只要有人在旁照管，已经可以做原料加工上必要的一切运动以来，我们就有了一个自动的机器体系"。马克思当时所说的这种自动的机器体系，是由蒸汽机去推动的。可以这样看，蒸汽机时代的"自动化"，就是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机械化。技术发展到现在阶段，所谓自动化，存大多数场合，就是要尽量利用电力和电子技术，来建立新的"自动

的机器体系”。

从工业发展的历史上看，最早的机器，是由手工制造业生产的，以后才发展到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看来，现在自动化的机器，开始也不是由现代自动化的机器生产的，而它的发展趋势，也必然要由自动化的机器来生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种发展。具体地说，就是：

一、要求机械制造业在自己的生产中，逐步实现自动化或半自动化。

二、要求机械制造业能够逐步他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装备。

实现这些要求，机械制造业应当积极采用各种新的技术装备，例如精密机床、数字程序控制机床、粗密仪器仪表，同时，还要积极采用新的加工工艺，例如电腐蚀加工、电化学加工、电子束加工、等离子体射流加工、激射光加工、超声波加工、高能成形和特种的铸锻、焊接、喷镀、热处理等等这类新工艺。像高温合金、精密合金和其他各种新型的、特殊的金属材料，机械制造业如果不采用各种新技术、新工艺，就很难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

由此可见，新冶金技术同新机械制造技术是互为联系的，是互为作用的。新机械制造技术促进新冶金技术的发展，反过来，新冶金技术的发展，又促进新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

就机械制造业本身来说，新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不但能够迅速他提高机械制造的劳动生产率，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机械产品的质量，增加机械产品的品种，生产越来越多的高级的、精密的、尖端的机械产品。上海机械制造业这几年来采用新技术所得

到的显著成就，就是一个范例。

党的总路线，告诉我们要力争上游。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机械制造业的技术，登上世界的高峰吗？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机械制造业的产品，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产品吗？那就必须认真地看待机械制造的各种新技术，经过研究，经过实验，而逐步地、随后广泛他用到我们的工业中来。

（三）新化工技术

现代化学工业是工业同农业相结合，重工业同轻工业相结合、民用工业同军事工业相结合的重要标记。

在历史上，各种金属的和非金属的冶炼工艺，都是化学的应用，由化学的发展所影响和决定。人类开始采用的金属生产工具，从青铜器时代起，就是应用化学（化分和化合）的方法来制造的。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采用的陶器生活用具，也是应用化学的方法来制造的。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化学就越来越扩大了自己的领域。而在现代，化学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作用和影响，几乎是无孔不入了。

我们发展化学工业的方针，是有机化工和无机化工并举，是煤炭化工和石油、天然气化工并举，是专业发展和综合利用并举。

而在现在，我们主要是：一方面，要抓合成氨工业，发展农业化肥，来促进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要抓有机合成化工，来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各种新型化工材料，特别是耐高温、耐高压、耐腐蚀的化工材料，来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防的技术装备的现代化。

化学工业的原料是无限的。没有那一个工业部门，像化学工

业那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是到处都有的极其丰富的资源。

石油和化工是分不开的。在国外，早已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石油化工。这是一个崭新的很重要的工业部门。我们今后要急起直追，特别注意发展它。

煤的用途很宽。我们已经部份地作为化工的原料来利用。今后要更广泛地注意煤的综合利用，使化工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

现在，许多生产单一品种的企业，都可以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变为生产多种类产品的联合企业。例如，一个年产一百万吨钢的氧气转炉车间，如果充分利用转炉气中的一氧化碳，就可以同时生产四万吨合成氨。等等。

总之，采用新化工技术来大力发展化学工业，会引起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这三大物质生产部门的变革，大量曾加工业产品，并且会促使工业品在许多方面的质量跃进。

（四）新电子技术

二次大战后，电子技术的发展，非常突出。

电子技术主要是利用电磁波来发挥作用的。电磁波的波段很多。在本世纪初，人们只能利用长波来进行通讯。从二十年代起，开始利用短波进行较远距离的通讯和广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掌握了微波，就出现像雷达这样的新型的观测和导航设备。战后，人们能够更多地掌握电磁波的波段，来探索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现在，电子技术已经扩展到光波的领域，这就是电子和光学结合起来而出现的光激射技术（译音叫做“莱塞”）。

电子技术的发展，逐步地改善了电子器件的性能，提高了它

们的可靠性、稳定性，缩小了电子设备的体积。人们说，电子器件的历史，如果包括光激射器件，到现在已经有了四代。第一代，就是从本世纪以来通用的电子管。一九四八年开始出现的半导体的晶体管，这是第二代。这种晶体管比老电子管的性能要优越得多，并且体积只有老电子管的几十分之子。第三代是固体电路，它的性能比晶体管电路更好，体积只有品体管电路的几十分子甚至几百分之一。光激射器件的出现才只有几年，方与未艾，可以算是第四代。

电子技术的这种发展，不断地扩大了它的极其广阔应用的范围，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阶段。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却积极利用电子技术作为反对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手段。

十多年来，在一些工业国家中，电子技术已经逐步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电子工业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工业部门要高。目前，在美国、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这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电子工业已经成为少数几个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

在不长的时间内，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所占的地位所以这样突出，主要是因为，现在发展起来的新电子技术，有以下的特点：

一、它使人们的眼界，从观察广阔的宇宙空间到观察微小的粒子，都扩大了。

二、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的主要手段，成为能够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新的产品质量和品种的重要技术基础。现在，还没有具它技术能够像电子技术可生存样广泛地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不论是现代冶金工业、现代机械制造工业、现

代化学工业，或者是现代动力工业，等等，如果撇开电子技术，都是不行的。

三、电子计算机使一个人可以迅速完成原来要由千百人做的计算工作，这样就大大加快了科学技术工作的进展速度。

四、电子技术在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上，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例如，一个重型轰炸机要用几千个电子元件，一个导弹要用几万以至几十万个电子元件。再如，利用光激射技术，有可能制造出新的反导弹武器。

我国的电子工业，是解放以后建立起来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新电子技术，能够生产一部份比较高级的电子设备，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狠抓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发展优良的电子元件，生产各种先进的电子技术设备，特别是要注意发展半导体和固体电路的器件，空间电子技术，雷达、水声技术以及光激射技术，以利于推动我国各工业部门的自动化和国防的现代化。

毫无疑问，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过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中，必须充分估计、利用、发挥新电子技术的重大作用。忽视这种作用，是不对的。

以上所说的当代世界新技术，新冶金技术，新机械制造技术，新化工技术，新电子技术，还有其它新技术，例如，生产新型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的技术，它们都是互相联系的，互相影响的，互相促进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发展现代新兴工业部门，不能不采用这些新技术，要利用原子能，发展原子能工

业，更不能不采用这些新技术。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工业革命，就是要迅速地消化当代世界各种新技术的成果，从全局出发，抓住要点，有计划地、有系统地、独创他采用最新的技术，力求避免再走资本主义各国走过的许多路程，也要避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一些我们可以避免的路程。

难道这是不可能的吗？难道我们已经开始的对于一些新技术的创造性的利用和取得的成就，不恰是证明这种可能性吗？难道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恰是指出这样一条伟大的、正确的道路吗？

六、要发展采掘业

如上所说，我们要积极采用新技术，来促进我国的新工业革命。而制造业的革命，必须有采掘业的革命来相适应。

现在我国的采掘业，在黑色金属方面，有色金属方面，煤炭和其他非金属方面，用的技术还是比较落后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采掘的效率较低或者很低。就铁矿来说，同有的工业先进国家比较，我们的掘进效率只相当于他们的九分之一，采矿效率只相当于他们的十一分之一，装卸和运输效率还不到他们的六分这一。

二，对矿山资源的成份缺乏全面分析和利用，丢失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单就出口的损失来说，例如，我们在一九六四年向日本以生铁价格出口了包钢生铁十五万七千吨，经初步查明，这批生铁中除含有稀土金属外，还含有千分之上以上的铌（是制造喷

气飞机燃烧室、火箭喷火。以及原子能工业中不可缺少的高温合金战略物资，按这个比例计算，等于无偿地送给日本一百五十七吨铌，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铌矿山。

我们必须努力来迅速改变这两种情况，使我们的采掘业能够给制造业提供数量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多的原料。

我们现在的对策，应当是：

第一，改善矿山的技术装备，积极试制和发展新型的、高效率的采掘设备、金属巷道支架、工程机械和起重运输设备，逐步他，但是要尽可能快地，实现矿山的机械化以至自动化。

第一，把全面利用资源作为矿山建设和生产的最重要的技术政策。令后，各种矿山和冶炼厂，绝不能“单打”，不能只要矿物中的一种成份，而丢掉其他成份。必须看到，这样做，一个矿山的作用，有可能等于几个矿山，而投资又省，生产成本又低。

这就是说，我们要实行采掘业的技术革命，而这种采掘业的革命，反过来又必然对制造业提出新的要求，促进制造业的技术革命。

七、不割断历史

进行我国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必须正确他处理继承旧技术、发展新技术、利用旧企业、建设新企业的问题。

（一）旧企业要有计划地、逐步地进行技术改造。在旧企业中进行技术改造，花钱少，收效快，作用大。这是毛泽东同志老早就提出的。可是，过去我们存实际工作中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这是很吃亏的。以后，对于这件事应当采取必要的积极态度。

在旧企业的技术改造过程中，对原有的技术，并不是都抛在一边，置之不理，或者一风吹，相反地，对于绝大量的旧技术装备，还要继续充分利用，并且使它们适当他和新技术结合起来，这样，就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存提高产品质量方面，在增加产品品钟方面，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等等，发挥很大的作用。

（二）新企业要尽可能他采用全新的技术。我们过去建设的许多新企业，花钱不少，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过一定的作用，可是，这些新企业采用的技术，基本上还是老的。这也吃了相当大的亏。今后，新建的企业都应当尽可能他用新技术武装起来，当然，在新企业中，旧技术的合理因素也应当保留下来。

总之，工业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那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两重性。旧企业经过技术改造，会不断有新技术的因素；新企业采用全新的技术，也会有旧技术的全理因素。我们就是要根据工业发展本身的各种两重性，来规定具体的政策。任何判断历史和片面性的做法，对我们事业都是有害的。

八、一线/二线/三线

在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问题上，要注意到全国的合理布局。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时候，把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就是说为，全国工业应当有计划地全面发展，而沿海工业担负的任务，就是要采取积极的、妥善的办法，促使内地工业的发展，逐步改变全国工业分布的不合理状况，使之变为合理的、或者比较合理的状况。近年来，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地指出，全国工业要有一

线、二线、三线的部署，而重要的，是要加快三线的建设，要求一线、二线大力加强援助三线的建设。这是一个具有伟大远见的战略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党中央认为，三线的建设，必须注意；

（一）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大力探索资源情况，使交通运输业先行一步，分期分批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二）新建企业的布点，必须注意适当分散，同时注意安排企业之间的协作，注意安排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动力工业同制造工业之间的关怀，还必须注意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尽可能地同工业的建设相适应。

（三）在技术上，新建的企业部要尽可能地求高，求新。

把建设的重点故在三线，是不是就可以放松对一线、二线上业的注意呢？这是绝对不可以

的。党中央认为，为着搞好第三线，在建设第三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充分发挥一线、二

线原有企业的潜力，加强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这样，就可以让第一线和第二线能够对第三线

投进更大更多的力量，就可以更加多快好省地建设第三线。

一线、二线同三线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不但一线、二线对三线的建设会起积极的作

用，而且三线的建设也会促进一线、二线原有企业的生产发展和技术革新，给一线、二线提供

更多的、或者原来没有过的资源。

这样，可以看出，全国合理布局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是调动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的积极性的问题，是充分地、更快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问题，是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各民族经济的畸形发展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一、二、三线的关系，是就全国大范围来说的，是大一线、大二线、大三线的

关怀。而在实际上，大一线、大二线、大三线的内部，也有一个一、二、三线的关怀问题。我

们在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同时，也要认真注意小三线的建设。这样，我们的工业布局就可以进一

步地合理化，而且在国家一旦有事时，能够为我们提供许多可靠的大小工业基地，增强我们支

援战争、保障供给的力量，使我们有更宽广的回旋余地，以利于打击敌人，取得胜利。

九、大/中/小

要有计划地发展全国的工业，要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不断提高，不断前进，还要适当地解决工业企业规模的问题，解决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这就是党中央所制定的关于工业企业大、中、小结合的方

针。

在确定企业规模大小的时候，不能千篇一律，而足必须区别制造业和采掘业，必须考虑资源条件，工艺特点，同时还要考虑经济上是否合算。

我们已经建立的许多大型企业，是必要的，有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人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的工业部门，过去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现代化中小型工厂这个重要的指示，没有存具体政策上充分表现出来，这是有缺点的。

一般说来，许多行业的中小型工厂，有以下一些优点：

第一，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快。

第二，机动灵活，适应性强，便于根据需要，不断革新技术，改变产品品种。

第三，利于吸取和掌握新技术，采用新工艺。

第四，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

第五，利于专业化，又利于协作。

第六，管理层次少，管理人员少，经营管理比较方便。

第七，领导干部易于熟悉业务，易于接近群众，易于克服官僚主义。

第八，多建中小型企业，可以比较快地实现工业的合理分，一旦有事，便于转移。

从这些角度看来，更多他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足使我们能够尽快地掌握新技术、发展新技术的一种重要办法，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一种重要办法。可惜，有些同志过去办起工厂来，总是想搞一个什么“万事不求人”的工厂，要在一个工厂里建立“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因此，越搞越大。

有些工厂，因为规模太大，下达计划很慢，甚至一、两个月还落实不到工段；如果要改变产品品种，就要牵一发动全身，花很长时间。

党中央认为：对于现有的老的中小厂，应当很好他加以保护，适当地加以改造，不要任意合并。在发展新工业部门的时候，宜于建设中小型工厂的，就不要建成大型工厂。有些必须建设大型工厂的，也可以考虑先建中小型厂，通过这些中小工厂，摸索新工艺，掌握新的生产技术，这种做法，可以避免浪费

十、技术发展的两种相反的社会道路

单纯技术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从社会制度出发，来看待技术发展的问题的。

很显然，技术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社会道路：一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一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那种技术奴役劳动者、而不是劳动者驾驭技术的荒诞现象。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就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有根本的区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那里，技术的发展，只是依靠一批少数专家，不可能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而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生产，都是要依靠群众路线，实行领导人员、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从而就有可能把群众的智慧充分发动起来。做好这一点，我们技术的发展，就会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得更好，更快，更多样性。

新技术的广泛采用，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征服自然界的斗争，

另一方面，更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我们把政治挂帅和新技术的广泛采用结合起来，更可以进一步地削弱旧剥削者遗留下来的影响，而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各种劳动者互助合作的关系，即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切的生产，都只能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就是说，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生产。于是，在我们这里，一谈到生产力发展问题，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就跑出来了。

那么，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有些什么要进一步他弄清楚的呢？还有些什么要进一步他加以解决的呢？

根据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提示，这类问题，就是：

（一）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二）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三）国防工业和一般工业的关系；

（四）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的关怀；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等等。

以下，分别来谈这些问题。

十一、工业和农业

大家知道，生产关家的问题，首先是所有制的问题。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我国社会现在的所有制，基本上是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

（一）社会主义的国有制；

（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在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以外，还残留着某些小生产者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存公私合营以后，实际上已经转到无产阶级国家手里。但是，他们还拿相当数量的定息，他们比普通劳动者还有多得多的存款和消费资料。

由上看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所说的："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就是说，社会主义所有制虽然已经占有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消灭别本主义因素的斗争，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旧社会残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矛盾。

无座阶级国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这类矛盾是新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同前一类矛盾，性质完全不同。这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内部的矛盾。

马克思说，人们如果不用相当形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那他们就不能生产。当然，所有制的形式不一样，人们的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也就不会一样。同旧社会比较，我国的所有制是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因而，工人已经是全新的工人，农民已经是全新的农民。这些全新的工人、全新的农民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也就跟旧社会完全不同了。所以，工农联盟内部的矛盾，乃是两类劳动者、

两个不同的劳动阶级存社会主义建设中互助合作过程中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所讲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工人和农民这两大劳动阶级的新社会关系，新经济关怀。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业和农业依然是最基本的两大生产部门。谁在这两大生产部门进行劳动呢？在工业上不就是工人吗？在农业上不就是集体农民吗？正确处理这两大部门的关怀，不就是止确处理工人和农民的关怀吗？

毛择东同志历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处理这两大劳动阶级在这种新关家中的矛盾，逐步地，不断地，妥善地解决这种矛盾。他指出，只要这两个基本生产部叫的关系处理好了，只要这两大社会劳动集团、两大劳动阶级的关怀处理好了，就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生产不断前进，就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大大巩固，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战胜的。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论文中指出，“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择东同志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中国革命始终是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作为同盟军，这个阶级不能解放，不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毛泽东同志反对那种只要求发展工业而不发展农业的观点。他认为，不同时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也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即使有一些发展，也将是畸形的，而且会过份地把发展工业的负担压在农民的肩上，使工人阶级脱离农民群众。

毛泽东同志也反对那种只要求发展农业而不发展工业的观点。他认为，不逐步地、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就不可能使农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武装起来，就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国家利用社会主义工业来支持、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在客观上等于鼓励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驳斥上面那两种片面性观点的时候，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论点，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论点。解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经验，证明了这些论点的全部正确性。在各个时期，只要我们认真他按照毛泽东同志这些论点做去，我们的工业也繁荣起来了，我们的农业也繁荣起来了。如果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点有些违反，在实际工作中跟这些论点有些背离，就不利于工业，也不利于农业。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的学说，同时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学说。这个学说的要点，就是要使我们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中，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正确他保持这两大劳动阶级的互助合作关怀。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非常重要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新发展。

我们怎样把毛泽东同志这个学说，体现在党的政策中，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呢？

第一，在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上，必须要安排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说来，工农业的比例关怀是最主要的。

第二，这样，就必须妥善解决积累工业建设资金和适当改善

人民生活这两方面的关系。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根据地就告诉同志们，要着重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根据地又提出，我们应当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种极端重要的原则性的指示，不但在革命战争时期是正确的，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完全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对农民的正确的税收政策，同时，也必须坚持国家同农民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的正确的价格政策，实行适当的工业品薄利多销政策。而只要这样做，我们工业建设资金的积累就不会患少，就会稳定地、可靠他增长。

第三，工业的分布，不应当过份地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而是要适当地平衡分布在全国，大量地接近农村，使工业的生产同工业的原料地和市场接近起来，以利于城乡的结合。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有步骤他缩小现在过分庞大的城市。这样做，最能够适合工业本身的发展，当然，也适合农业本身的发展，能够使农村从古老的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同时，也为未来亦工亦农的社会开拓了前景。

第四，工业的生产，要力求能够逐步地充分供应农村所为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第五，在实行工业技术改革的同时，必须适应各地方的不同条件，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他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现代化。

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实行上述这些措施，就是具体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最主要问题，是促进工农业新高涨和新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十二、重工业和轻工业

在我国的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同工人农民这两大劳动阶级的联盟相联系的。但是，这两个工业部门的关系，不止是牵连到工农之间的关怀，还有工人阶级内部这一部份工人同那一部份工人的关怀。

应当把这种不同的关怀分别清楚。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重工业和轻工业这两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关系，也是同工农联盟有关的呢？

正确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如何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关系的时候*，对于发展重工业，有一个真想和假想的问题。

他说：

“当然，真想假想在我们来说不适当。谁不真想？就是想得厉害不厉害。你真正想重工业想得厉害，你对轻工业就应该多投一点资，不然，你想得就不十分真，只有九分真，你想得就不厉害，那就是你对重工业不十分注重。你如果十分注重，你就要注重轻工业，因为，第一是它能满足人民的生活，第二是积累得更多更快。满足人民生活，这是一。由于满足人民生活，积累就可以更多更快，这是二。我们为重工业积累资金，不是要采取使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的扩大剪刀差的政策，而是要使农产品同工业产品大体上等价交换。”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正是从工农联盟这一个最基本的社会

主义生产关怀出发，来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的。

为什么存社会主义制度中，重工业和轻工业这两个部门的生产资料都是无产阶级的国有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呢？

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劳动阶级内部这一部份工人同那一部份工人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生产的条件不同、劳动对象不同、而在社会生产中互相交换其活动的关怀。

大家知道，在社会再生产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部门，要为自己这个部门提供生产资料，也要为轻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同样，制造消费资料的轻工业部门，要为自己这个部门提供消费资料，也必须为重工业部门提供消费资料。只有这样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有社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这两个生产部门之间，重工业是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说，不优先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就不能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发展轻工业，也不可能逐步地、充分地援助集体农业发展生产所为要的各种机械、动力、化肥、农药等等。

同样的，毛泽东同志也反复指出，不同时发展轻工业，就不能逐步地、充分地促进集体农业的多种经营，为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原料；也不能逐步地、充分地供应国内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日用消费品，为国家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积累更多的资金。

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这种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同所阐明

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一样，都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都是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

为着实现毛择东同志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关系这个问题上的指示，我们应当有以下一些措施：

第一，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所说的，“要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列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第二，在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的同时，必须妥善处理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制造工业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采掘工业的建设时间较长，应当先行一步。

第三，重工业部门要努力绍自己部门和轻工业部门提供质量高、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同时，轻工业部门也要努力给重工业部门提供质量高的各种材料和辅助用品。

第四，重工业和轻工业各部门要根据资源情况，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发展联合企业，发展多品种的生产。以后，厂矿企业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全面利用的问题，否则，就不批准。有必要把这一点定为法律。

第五，重工业和轻工业各部门应当把自己生产中所馀下的所谓废料，看作一种宝贵财富，不许随便扔掉。除了自己可以利用的以外，要尽可能他供给其他工业部门和手工业在生产上使用。就是说，要尽可能他变无用的东西为有用，化腐朽为神奇。现在不少企业的工人提出的“黄金遍地”的批评，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第六，充分发挥我国原有的、丰富多彩的广大手工业和手工

工场制造业的作用，帮助他们继承和提高传统的优秀工艺，发展它们的生产，使它们能够更好地为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服务，更好地为市场服务，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

十三、国防工业和一般工业

国防工业和一般工业的关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关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那个讲话中说，“经济发展了，我们的国防就会发展，那个时候不仅是什么炮、什么飞机这一套，原子弹也可以造，假如要造的话。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还是真正想要加强国防呢？还是《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真正想要，十分想要加强国防，那就应该在经济这一方面着手。”

实践不正是这样吗？由于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我们的国防也加强了。我们已经开始爆炸了原子弹。我们相信，世界上一切现有军事技术的高峰，我们都能够攀登，并且经过继续努力，还会超过它们。

从历史上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军队对于经济发展一般都很重要”。在前面，我们曾经叙述过，世界的新技术和新工业在二次大战后的发展，同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这件事，也说明了马克思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就是说，在一定历史场合，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能够先行一步，能够对其它技术、其它工业，以及其它经济部门，起促进的作用。

但是，不能把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独立于经济之外。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近代军事技术装备的起源，“是

经济的力量以及拥有大工业的威力手段。”他举例说，近代的战舰，就是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是大工业的样本，浮在水上的工厂。它的生产，要花费大量金钱。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写作于八十多年前，这几十年来，由于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比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更大的军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由于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在一些国家里所形成的探索空间的新工业部门，实际上就是新军事工业部门。这种新军事工业部门，是建立在比较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上的，是取决于比较高度发展的新冶金工业、新机械制造工业、新化学工业、新燃料工业、新电子工业等等。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辩证地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两者的关原。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注意国防建设，因为我们面前还有像美帝国主义这样凶恶的敌人。而在现代，只要我们认真他、全面地抓军事工业，一系列的工业都要被牵动起来，都要进步起来。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另一方面，如果本事工业的发展，不是故存整个国民经济健全发展的轨道上，如果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脱节，像有的国家那样，那就会损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反过来，军事工业的发展也会陷于停滞以至遭到挫折。不警惕这一点，不从发展国民经济着手来加强国防，我们也会犯错误。

我们的结论，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经济强大起来了，国防就会更加强大。”

我们讲的国防，是包括发展常规武器在内的。一个觉悟起来的民族，即使没有现代新武器的装备，也可以战胜敌人。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特别是越南南方的解放战争，更进一步地证明了，用普通的常规武器，完全可以战胜用最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美国强盗。

我们是已经解放了的国家。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发展现代的国防技术。另一方面，也还是要积极地发展常规武器，以便把人民最广泛地武装起来。但是，不论是发展现代的国防技术，不论是发展普通的常规武器，都必须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把强大的国民经济力量作为后盾。

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这是民力同兵力的适当比例关系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从广义上说，是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问题，也是工人阶级内部这一部份工人同另一部份工人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同样那属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十四、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

党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国家同生产单位（包括工厂和集体经济各级组织）、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到国家的积累、集体经济的积累、个人的收入，都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这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老历来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同时，分配也一定会反转过来影响生产。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进一步地发展

毛泽东同志认为，国家的统一性，同生产单位的主动性，是互相依存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新事物。我们要学会把统一经济计划的严格性同留有余他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积极发展生产同合理进行分配结合起来，把增加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积累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而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更好地、更全面地体现在我们的经济计划中。

十五、中央和地方

在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主要的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同发展生产力的相互关怀。

多年的经验证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妥当，那就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反之，如果处理得不妥当，对于生产的发展就是不利的。

毛泽东同志说："重工业要发展，就要发展轻工业，就要有市场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利益。

"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像高岗闹独立王国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必须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

"可以统一的，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

应该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

“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总之，要给地方一种自治权力，使它能够办事，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力缩得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有全国的整体利益（即全局利益）同地方的特殊利益（即局部利益）的关家问题。这种关系，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大量的现象。党处理这个问题，不是从一个部门、一个地方出发，而是要从全国的经济关怀的总和出发。

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只能大致地包括各地方的特殊利益。同时，各地方的特殊利益，并不完全就等于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这二者是一致的，又是有矛盾的。

我们所说的中央，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中央，这个中央，集中他代表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体利益，集中地体现我们党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主张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央必须无条件地集中的内容，就是：

第一，政策的统一；

第二，财政的统一；

第三，国家经济计划的统一。

我们的经验证明，这三项统一，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的保证，是我们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迅速地发展工业的保护，是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保证。

政策的统一，财政的统一，国家经济计划的统一，这些并不是意味着抹煞地方的特点，否认地方之间的差别，忽视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相反，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反复阐明的，“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以上这些统一，应当充分估计到地方的特点，照顾地方之间的差别，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不论计划，不论财政，都要给地方留有必要的余地，给予适当的机动权。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集中，有效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种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和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关怀，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央和地方的关怀。

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中央统一调节和地方主动性这两个方面和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结，而避免片面性。

为甚么中央对全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统一调节是绝对必要的呢？

第一，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也像工人阶级本身一样，如果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为一个整体，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像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国防工业和一般工业，等等，都有上下左右的关系，如果不是有计划地互相配合，那末，社会主义整个国民经济也就不可能前进。

所以，由中央按照实际情况来做出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有了这样符合或者大致接近客观规律要求的国屏经济计划，来实行统一领导，就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若网在网，有条而不紊”。

为什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呢？

第一，全局是由局部组成的。只有充分发挥局部的积极性，才能有全局的积极性。

第二，“多新事物的创举，经常是由下面首先发动，由个别地方开始的，然后才逐步推广，变成为普遍的东西。

第三，各地方、各部门都有从它们的实际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差别性、多样性，不可能千篇一律，不可能一个格子到处去套。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我们要不断地做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就正是要研充各地方、各部门的特殊性。否则，这个统一的计划就变成无源之水，

无根之木。

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个群众路线，就是要我们正确地处理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个性和共性的关系。这是我们过去干革命的方法，也是我们现在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只有掌握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够在计划工作上，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客观规律，而避免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那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就我们已有的经验看来，在工业发展问题上，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采取以下的步骤，可能是适当的：

第一，特大的或者某些特殊的冶金企业，特大的或者某些特殊的矿山（包括铁矿、有色金属矿、煤矿、油田、盐田等），特大的或者某些特殊的动力企业，特大的或者某些特殊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特大的或者某些特殊的化工企业，还有，航空、空间工业企业，大的造船企业，铁道，远洋航运业等，这些，都由中央直辖。

现代化的国防大工业，一律由中央直辖。

第二，一些综合性的大工业城市，约为十个左右（例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西安、广州等等），逐步改为中央直辖市，使它们成为全国工业的新工艺、新技术和科学实验的重要基地。在这些市里面，除了第一条所列的某些中央直辖的特大和特殊的企业外，全市的工业企业，一律归市统一管理。国家计划的各种指标，财政拨款，都直接下达到市，由市统一安排。

第三，除了上述中央直辖市以外，省也有多少不等的直辖

市。国家计划对于这些省直辖市的各种指标以及财政拨款，都经过省下达到市，也由市统一安排，统一管理。

第四，省的其他中小城市和县、镇的工业，由省根据国家统一计划统筹安排，决定分级管理的适当办法。

第五，在中央一级，要适当地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管理日常经济工作的权力。

以上这些规定，有利于使我们在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问题上，实现由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化领导，同时，可以使工业的管理系统和管理办法大大简化，而为全国工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这样一来，中央和省这两级的行政管理机构，就有缩减的可能了，并且非缩减不可。

这样一来，不论是中央直辖市，或者省直辖市，由于免去多头领导，减少层次，也有进一步缩小行政管理机构的可能。

这样一来，那些同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也就有逐步克服的可能。

这样一来，中央和省这两级的行政管理机构，就有逐步抽调大批较强的干部去充实和加强基层领导的可能。

这样一来，中央和省等的行政管理机构，就更能够用自己的主要精力去考虑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在工作上取得更大的主动。

总之，以上所说的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种种好处，是克服管理机构臃肿，减少行政开支，增加国家积累，同时又会减轻人民负担。这既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而也就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有利于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

十六、汉族和少数民族

我国早已在历史上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解放以后，我国各民族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各民族都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大家庭一员了。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还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看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国内各民族还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发展的许多不同差别性。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废除了人剥削人、民族压迫民族的旧制度，建立了各民族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性。自从在各民族中出现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共同性，逐步克服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差别性的条件，就存在了。在各民族地区，就是说，不但在汉族地区，而且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普遍高涨，就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的情况，还是毛择东同志所指出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汉族地区是人口众多。因此，要进一步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地为各民族人民造福，就必须注意这种差别，就必须进一步地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呢？

党中央认为：

第一，我们的统一经济计划，要考虑分批分期地发展全国的铁路网，使铁路运输在全国范围内四通八达，以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应当力求适应这种需要。

第二，要分批分期地充分利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力资源，发展电力网，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电气化，以利于当地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第三，有计划地开发西南、西北地区的矿山资源，逐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以利于全团工业的合理分布，同时，也有利于国防的巩固。

第四，畜牧业是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份。必须保护草原，不许损害草原，并且要提供为各少数民族所欢迎的建设草原的必要条件，以利于当地畜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为当地人民和全国人民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生活资料。

第五，在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要努力提高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同时，积极培养各少数民族的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人、技术女员和干部。

等等。

实现上述这些措施，要依靠全国各民族的互相支援。汉民族的经济发展要靠各少数田族支援，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也要靠汉族支援。在这种互相支援的情况下，从汉族说来，必须尊重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反对大汉族主义；从各少数民族说来，必须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强调全国各民族的共向性。

十七、企业的联合形式要多种多样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出现了资本垄断组织的许多形式，其中比较普遍的是所谓“托拉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利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联合形式，来合理他组织生产和交换，使资本主义的垄

断组织形式，变成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已经开始按照企业联合形式试办了一批“托拉斯”。初步的经验证明，这个办法是很对的，起了良好作用。

我们企业的联合，实际上要经过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由现有的企业联合起来。一个途径是企业本身“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等等，而发展为联合企业。我们目前试办的“托拉斯”基本上还是前一种，也就是由分散的、多头领导的企业，联合成为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企业。

我们创办“托拉斯”这种联合企业，还只是开头，必须继续积累经验，注意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企业的联合，要有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二者相结合。过去组成的一些全国性的托拉斯，成绩必须肯定。但根据实际情况看来，我们今后组织“托拉斯”的方法，一般的应当是：

第一，先从一个市或者一个地方的范围内做起，把同一行业、同一部门的企业联合起来，然后再看看，是否要成立省的“托拉斯”、大区的“托拉斯”或者全国性的“托拉斯”。这样的顺序比较妥当。

第二，成立“托拉斯”，主要的，应当是采取联合的办法，在联合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且尽可能地保持原来厂矿的特点和它们的长处。各种“托拉斯”可以合理地并一些厂、收一些厂，但主要的办法不是并厂、收厂，不是把许多中小厂简单他合并起来，成为臃肿的大厂。

第三，同一行业的厂矿，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可以分别组成为几个“托拉斯”，基本上还是前一种，也就

是由分散的、多头领导的企业，联合成为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企业。

我们创办“托拉斯”这种联合企业，还只是开头，必须继续积累经验，注意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企业的联合，要有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二音相绍合。过去组成的一些全国性的托拉斯，成绩必须肯定。但根据实际情况看来，我们今后组织“托拉斯”的方法，一般的应当是：

第一，先从一个市或者一个地方的范围内做起，把同一行业、同一部门的企业联合起来，然后再看看，是否要成立省的“托拉斯”、大区的“托拉斯”或者全国性的“托拉斯”。这样的顺序比较妥当。

第二，成立“托拉斯”，主要的，应当是采取联合的办法，在联合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且尽可能地保持原来厂矿的特点和它们的长处。各种“托拉斯”可以合理地并一些厂、收一些厂，但主要的办法不是并厂、收厂，不是把许多中小厂简单他合并起来，成为臃肿的大厂。

第三，同一行业的厂矿，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可以分别组成为几个“托拉斯”，不一定只是一个“托拉斯。”

第四，各种“托拉斯”，在有利于专业化和协作、有利于资源全面利用的条件下，可以有大、中、小的不等规模。“托拉斯”

，不一定只是一个“托拉斯。”

第四，各种“托拉斯”，在有利于专业化和协作、有利于资源全面利用的条件下，可以有大、中、小的不等规模。

第五，今后特别注意资源的全面利用。目前许多生产单一品

种的企业，可以采取“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等等的方法，逐步变成为生产多种类产品的联合企业。可以把钢铁企业，变成钢铁、化工联合企业，或者是变成钢铁、有色金属、化工联合企业。把煤炭企业、炼焦企业，变成煤炭、化工联合企业，变成炼焦、化工联合企业。把石油企业，变成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把食盐企业，变成食盐、化工联合企业。把电力企业，变成电力、化工联合企业。

把森林企业，变成森林、化工联合企业。把水产企业，变成水产、化工联合企业。杷畜产品加工企业，变成畜产品加工、化工联合企业。等等。

第六，组织在联合企业内的一切工厂和矿山，一方面，要执行联合企业的统一计划，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一定独立性，要有必要的经济核算。

第七，不适宜于参加联合企业的厂矿，就不要组织到联合企业中去，只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同联合企业建立供、产、销的合同，实行联合企业和独立企业的协作。

第八，一切联合企业，从总公司到分公司的政治工作机构，都要力求精干，提高效率，人要少，事情又要办得好，反对讲究排场。

总之，创办“托拉斯”，即联合企业，必须认真具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各项工作中（例如，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历来提倡的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党中央认为，成立“托拉斯”以后，要大力来抓技术革新。组织“托拉斯”，如果不同采用新技术联系起来，作用可能不大。

要有革新的空气，没有这种空气不成。当然，革新要脚踏实地，不能浮夸。

“托拉斯”，可能办成真正实行经济核算、精简节约、技术革新、生产突飞猛进的“托拉斯”；也可能办成机构庞大、重床迭架、技术保守、工作和生产拖拖沓沓、行政手续繁多、文牍主义增加的“托拉斯”。要办就要办好，要树立起信誉。中央部门中管工业的同志要全力以赴，要选派得力的、有才干的干部去办。

组织“托拉斯”，还必须同精简中央各部的机构联系起来，否则，又会增加一批非生产人员。这件事，要从全局考虑、部署，包括革新和大大压缩中央分合的机构问题在内。

应当继续总结试办“托拉斯”的经验，逐步地凝出各种“托拉斯”的管理章程或者工作条例。

十八、科学革命

我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需要一个伟大的科学革命。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科学革命的强大推动力。

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就预言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的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新高潮，包括科学发展的新高潮，已经出现了。

我们这个时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

伟大性，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所不可能比拟的。资产阶级革命，总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于根本消灭剥削阶级。这样，就给人们开拓了前所未有的、极其宽广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视线，使科学发展的前途无边无际。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发展的道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也像前面所有的技术发展的道路一样，就是把科学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变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我们的口号是：领导人员、科学研先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这种三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办不到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成为事实。

毛泽江同志历来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而反对理论和实际分离。现在，我们发展科学的工作，就是要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这个原则，而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一个脚踏实地的伟大科学革命。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口——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他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情况。而在我们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我们的欣欣向荣、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必然会产生远远过那个时代的、一批又一批的、大量的、多才多艺的灿烂“明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

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党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这里所指出的文艺家应当走的道路，不但对文艺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社会科学家也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在不同岗位上进行活动的自然科学家，也是完全适用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科学家，不论是社会科学家或者自然科学家，都要力求站在人民生活中间，站在工人阶级生活中间，站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生活中间，去进行观察、体验、研充和分析一切事物，包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掌握大量的材料，概括大量的实际经验，这样，就没有不可攻克的科学技术堡垒。

我们党的方针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举，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又是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同时并举。

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同，我们的这一切科学都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辩证法唯物论为向导。

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家，把事物看成是孤立的现象，把事物看成是没有内部联系的现象，把事物看成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现象，他们的这种观点，都站不住脚了。

原子的分裂、原子内部微粒子的发现，早就推翻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成就，被应用到技术上，应用到工业上，就大大促进了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例如，现代原子能技术和原子能工业，电子技术和电子工

业，化工技术和化学工业，光学技术和光学仪器工业，等等。这些反转过来，又提出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

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只能求助于辩证法唯物论。这样，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自然科学普遍革命的问题，它再也不能在形而上学的狭窄范围内绕圈子了。自然科学家应该自觉地把辩证法唯物论运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里，才能适应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是像面追样提出问题的。现代化学和其他科学的新发展，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现代化学的发展，大大地发展了化分和化合的辩证观点。这一发展，在实际上，不但引起化工技术本身的革命，而且它的趋势，也是促进整个工业的新的革命。事实证明，一个工业部门，只局限在自己老范围内的做法，已经成为过时的了。

由于化学本身的发展，使工业各部门的大量原料、材料和各种废料，出现了可以实行“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技术上的可能。又由于有这样的全面利用资源、综合利用资源的新技术，一种工业部门就可以变成两种或者更多种的工业部门。

毛泽东同志多年以来就提倡要普遍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现在看来，这对于自然科学的革命，同样是很迫切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学说，关于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的学说，关于一切事物都会一分为二和不断分裂的学说，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学说，同样地越来越被自然科学的发现证实了。把毛泽东同志这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学说，引进到我们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引进到我们科学革命和

技术革命的领域中，就会使这些领域的面貌迅速变化。

恩格斯承认，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科学状况，同时他指出："科学状况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枝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

事实上，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的圆圈：

生产，技术，科学—科学，技术，生产。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地位，而科学的繁荣，又会促进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去达到新的高峰。这是历史的规律。只要我们紧紧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紧紧地掌握辩证法唯物论，我们就会不断地使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发挥这种作用的可能性，迅速变为现实性。

党中央认为，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指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一九六六年起，我国工业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最前列。

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这个伟大计划任务相适应，党中央认为，各个科学研究部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问题，要展开讨论，总结经验，抓住要害，提出一个战略性方案，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跃进的十年——二十年规划，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参考。

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可以是：第一个十年，大体上是"赶上"，有的是超过；第二个十年，大能上是"超过"，有的是

赶上。第一步的规划，要具体一些，第二步，可以是展望性质的。

这个方案，要有实际根据，有科学根据，要可靠，要包括适当的具体措施、具体办法。就是说，它是大踏进，但又是稳步前进的。

十九、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我们工业发展的道路，必须是自力更生。解决我国发展工业的问题，必须依靠我们的独立思考。

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以美国以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者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想要把我国当成他们的附庸，把我国人民当成他们的奴隶。他们想要卡死我们，孤立我们。这只能更进一步地唤起我国人民发愤图强的自觉。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依靠自力更生，已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也必将继续赢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伟大的中国，经过人民自己的不断努力，艰苦奋斗，必将在不远的将来，以社会主义的工业先进国的地位，屹立于世界。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切卑鄙企图，已经破产，已经失败，并且一定会继续破产下去，失败下去。

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以摹仿为满足，总是抬不起头来，就不可能放出自己的光彩。一个国家人民的伟大，在于他们能够用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过去和外来的事物，善于总结国内外经验，

摆脱老格式，探索新事物，实事求是地、勇敢地走上独创的道路。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推陈出新。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破除迷信。

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独立思考。

甚么叫做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要求在实践中学习，要求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向科学家学习，向一切群众学习。

独立思考，要求善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集中群众的意见。

这就是说，全党同志，不论职位高低，都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对于追求知识这一问题，毛泽东志在《农村调查》序言中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说明了独立思考的基础。对农村的问题是这样，对工业的问题，也是这样。

当然，除了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以外，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外国人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具理："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只要我们同群众保相结合，持有顽强的探索新事物的决心和态度，那末，要独立地解决工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就不难了。要独立地解决科学技术的重大问题，就不难了。毛泽东同志

倡议的设计革命所已经取得的成效，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党中央认为，可以把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写的以下两段话，作为这个文件的结束语。

毛泽东同志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兴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同志还说：

“向六十年代和将来的七十年代赶上去，并且可能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超过世界水平，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穷二日的基地工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甚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

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今日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一九〇工年就说过，中国将要超过西主（见《民报》第一号）。他的这种预见，心将在本世纪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陈晓夫按：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同时也是着者建国后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件从一九六三年开始起草，其后，四易其稿，一九六五年八月定稿，前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费力颇多。著者在定稿、工后即将、文件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开始十分赞同，曾为此特邀请著者一起吃饭，席高兴地说道：“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一条办工业的路子。”但在中央常委开会讨论这一文件时，有位领导同志为这个文件抛开了“以钢为纲”办工业的方针，表示不赞成这一文，主张“还是一切照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未再表态，文件因而未获通过。著者晚年曾多次说：“这一文件被否决，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

著者晚年重读了这一文件，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即去世前八个月）写下了“起草八注”，并

将原来标题《工业问题》改为《试探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为保存历史真实材料，现依据“批陈整风”时有关部门作为批判材料内部印发的铅印原件，仍用过去《工业问题》的标题，将这一未曾公开发表的著者遗著收入本书。

被誉为著名理论家的陈伯达，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为《毛泽东选集》的主要编辑者，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曾官至党中央第四位人物。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受批判，指其赞成「天才论」，在中共「十大」上被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永远开除出党。自1970年10月起即被关押，10年后又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判18年徒刑。本书汇集他在生命最后10年所写的文稿，包括狱中自述及所撰写未曾面世的文章，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革」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责任编辑：吕超文
封面设计：王伶俐

ISBN 7-204-04044-9

9 787204 040448 >

ISBN 7-204-04044-9/I·729
定价：22.00元